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一百个国耻纪念日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前　言

“国耻”是个古老的词，在我国古籍中屡有出现。不过古代所谓“国耻”，多以君统为重心，由是曰：“国耻君耻也”。就是说，国耻即君耻，其涵义极为狭隘。近代所谓“国耻”与古代所谓“国耻”虽有继承关系，但其涵义却有很大不同。近代所谓“国耻”是以国家、民族至上为重心的，其涵义较广泛，其影响更深远。近代所谓“国耻”大体上是指，从 1840 年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遭到资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被迫签订种种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丧失大量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等等，而所蒙受的奇耻大辱。

中国是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长期以来以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居于世界各国前列，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古代中国无比辉煌灿烂的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尤其受到世人的称道。据世界自然科学统计资料报道中国历代重大科技成就（项目），在世界重大科技中所占的比例是：公元前 6 世纪前，为 57.4%；从公元前 6 世纪到公元前 1 年，为 50%；公元 1 年到公元 400 年，为 62%；公元 401 年到 1000 年，为 71%公元 1001 年至 1500 年，为 58%。第三世界科学院一位领导人断言：“中国领导世界的技术，直到大约公元 1600 年。”其实，在 1644 年清朝取代明朝后在清朝开国的 100 多年里，中国仍不失东方大国的体面，有过一番兴旺气象。赫赫有名的康熙皇帝在位时（1662—1723 年），对内维护国家统一，对外维护民族尊严，竭力抵抗侵略，遏制来自海上和陆路的西方殖民扩张，使中国免于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时间推后了大约 200 年。直到乾隆年间（1736-1796 年）的前半期，中国仍处于盛世。

但是，也正是在明朝和清朝的前半期这一历史时期，世界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西欧各国率先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急剧演变，封闭而古老的封建社会的中国却停滞不前，开始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差距越拉越大。特别是到了 19 世纪，世界工业革命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了全球。最早经历工业革命的英国，在这个世纪中叶，已成为一个工业发达、科学昌盛的头等资本主义强国。这个在当时被称为“海上霸王”、称雄于世界的殖民主义英国，正是看清了清王朝的“积弱无能”和防务废弛的腐败本质，乘虚而入，发动了臭名昭著的鸦片战争，闯进古老中国的大门。从此，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中国逐步地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起，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从根本上来说，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各自所拥有的经济、科学技术实力的较量。然而当时的中国，则是个没落的封建帝国，没有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在封建主义桎梏下，经济极端落后，社会停滞不前。在满汉地主贵族统治下的中国，政治极端反动腐朽，对外闭关自守，文化科技被严重窒息，其国势若与当时先进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相比，整整落后了一个历史时代。落后就要挨打，这就是中华民族之所以长期蒙受耻辱、挨打受气，以及导致近代中国贫穷衰弱的根源所在。

100 多年来，中国曾进行过六次规模较大的民族抵抗战争，除了 1937—1945 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内外多种原因，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外，其余像 1840 年反对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1856—1860 年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第二次鸦片

战争，1883—1885 年反对法国侵略的中法战争，1894—1895 年反对日本侵略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 年反对英、法、德、意、俄、美、日、奥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遭失败了。随着民族抵抗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接踵而来。1842 年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马克思当时愤怒指出：这个条约“是在炮口威逼下订立的”。从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的炮口威逼下，中国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协定、章程、合同足有 1000 多个。仅在 1842—1919 年 80 年中，与英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有 163 个，与日本签订 153 个，与沙俄签订 104 个，就是与小国比利时也签订了 26 个，总共与各侵略国家签订了 709 个不平等条约，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些不平等条约如同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个个枷锁，使得中国人民长期处于任人侮辱、践踏、宰割的悲惨地位，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中华民族的尊严丧失殆尽，成了一个任人嘲弄、歧视、污辱的民族。西方列强、外国侵略者随意摧残中国人权，疯狂屠杀中国人民，蔑视中国国格，大肆进行军事侵略、经济和文化掠夺。在中国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以割地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割占我国领土香港，开创了外国侵略者割占中国领土的恶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又侵占中国面积为 11.1 平方公里的九龙半岛界街以南地区。1898 年通过《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进一步强租面积 975.l 平方公里的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地区及附近岛屿。这样,英国割占和强租了今天的香港地区总面积为 1061.8 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接踵而来的是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通过 1858 年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割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中国领土 60 多万平方公里。又通过 1860 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割去乌苏里江以东约 4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后又通过 1864 年签订的《勘分西北界约记》以及其他一系列《界约》，割占中国西部 44 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此后，通过 1884 年中俄《伊犁条约》及其它《界约》，又把中国的 7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己有。

1900 年在大肆屠杀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以后,又强占了 1450 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914 年，又出兵唐努乌梁海，强占 17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在 50 多年间，沙俄共强占中国领土约 168.1467 万平方公里，其面积相当大约三个法国。沙俄是帝国主义列强中吞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葡萄牙在 1557 年武装占领我国澳门（面积 16 平方公里）后，又于 1887 年通过中葡签订的《中葡会议草约》，取得“永远管理”澳门的特权。中国从此丧失了对澳门的主权。1895 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去台湾和澎湖列岛及其附近各岛屿，面积约为 3.6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914 年，通过英国与西藏卖国分子签订的非法《西姆拉条约》和英印政府炮制的非法“麦克马洪线”，又把 9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仅据以上粗略统计，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 80 年间，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各种手段，就强占了中国的 181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就是说，中国原有的约 7%的领土被帝国主义各国所侵占，它的面积等于 3 个法国、5 个德国、7 个英国的版图。

除此之外，侵略者还在我国重要商埠、口岸强索租界，建立“国中之国”，甚至上海租界公园门口，尽然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种侮辱中国人的牌子。租界，实为罪恶的渊薮。从 1897 年 11 月德国强占胶州湾起，主要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展开了一场掠夺海港，划分势力范围的激烈斗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大好河山被列强分割得支离破碎，东北乃至长城以北

的辽阔地区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山东乃至黄河中下游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富饶的长江流域的一部分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广西全省及广东、云南的一部分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福建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中国大好河山陷入严重的被瓜分之中。”

以赔款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的《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 2100 万元，如果加上广州、上海、扬州等地赎城费等，则达 2800 多万元。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北京条约》规定赔偿英、法两国各 800 万两，如加上对英、法侵略军的抚恤金，则达 1670 万两。甲午中日战争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赔款 2 亿两，再加“赎辽”费 3000 万两，则达 2.3000 亿两。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赔款 4.5000 亿两，如加上利息则达 9.8000 亿两。从鸦片战争至清王朝被推翻为止，总计赔款达近 13 亿两。从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清政府年财政收入，大致出现 4000 万两、6000 万两、1 亿两三个档次。如以年收入 4000 万两计算，得用 30 多年的财政收入支付赔款；如以年收入 6000 万两计算，得用 20 多年的财政收入支付赔款；如以年收入 1 亿两计算，也得用 10 多年的财政收入支付赔款。

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攫取的特权来说，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除在中国取得领事裁判、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内河航运、军队驻扎、设银行及工矿投资这些主要特权以外，尚有开商埠权、租借领土权、铁路修筑和管理权、海关权、警察权、文化教育权，以及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司法权、国家秘密权、军权、财权、内政“最后决定权”，外交指挥权等等。总之，从天上到地下，从大陆到海洋，从政治到经济，从物质到文化，无所不包，应有尽有。

帝国主义对中国输入过剩资本，迫使举借巨额奴役性的债款，是其重要侵略方式之一。据统计，自 1865—1948 年，中国历届政府共向帝国主义国家举借外债高达 30.1950 亿美元。其利息、回扣、经理费等相当实际借款的 166.6%。这就是说，帝国主义每借给中国 100 元，即可获得纯利 166 元。由此说明，举借外债给中国带来多么沉重的经济负担！

帝国主义公开掠夺中国的财富，更是无计其数。他们通过可耻的鸦片贸易、猎取超额利润直到明火执杖地公开抢劫。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对华贸易逆差通常在二三百万两以上。为了弥补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强盗竟丧心病狂地采用海盗掠夺手段向中国大肆倾销鸦片，攫取血腥暴利。从 1813 年起，英国就是用比成本高出 9 倍利润的鸦片毒品走私，而一下子使中国由 200 年来出超国变成入超国的。以 1827 年为例，这年英对华输入总值为 2036.46 万元，其中鸦片价值占 1124.3496 万元，中国对英输出总值为 1204.1406 万元，结果英国入超 832.3194 万元。这说明，中国对英的输入几乎被英国可耻的鸦片走私所抵销了。否则，这年中国仍可出超 292.0302 万元。

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遂之合法化了。于是，英国从中国劫走的白银猛增。仅 1843—1846 年三年间，中国的白银就被劫走相当于 3500 万元。此外，帝国主义还大量对中国进行企业投资，牟取暴利，企业盈余一年可达 2 亿元。在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每一次侵略战争中，都不例外地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震惊中外的残虐暴行就有：1860 年英法联军将举世无双的大型皇家园林圆明园洗劫一空，而后又付之一炬；1900 年八国联军在京津地区大劫掠、大血洗；1837 年日本侵略者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等等。

特别要提出的，中国近邻沙俄和日本在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争夺中，

扮演了更为凶恶贪婪的角色。他们对中国怀有更大的野心，对中国人民更加暴虐残忍，制造了数不尽的大血案，强占中国无数领土，罪恶昭著。从 19 世纪末叶起，日本军国主义就成为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列强在欧洲拼杀不能东顾之机，加紧了侵夺中国的步伐，强迫窃国大盗袁世凯签定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31 年 7 月 7 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从此把中国人民拖入艰苦的八年抗战的战火之中。而且，中国人民付出 2000 余万人的生命、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上 1000 亿美元的军费，所换来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立即取代日本成为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新的霸主。卖国贼蒋介石甘愿充当美帝走狗，空前出卖中国主权，使中国人民陷入了美蒋的黑暗统治之下，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蒙受耻辱的历史，又是一部抗争、雪耻的历史。在中国人民的“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意识不断增强的同时，“誓报国仇”、“誓雪国耻”的意识也在深化，并激励着中国人民，为了维护民族尊严、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独立，同帝国主义进行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一刻也未间断。在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派和民主革命派、广大工农群众和爱国知识分子，都曾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给予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以沉重打击。正是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的斗争，才使得帝国主义没有能够灭亡中国。但是，由于外国侵略势力的强大、本国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以及其它种种原因，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胜利，没能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因而也就没有达到雪洗国耻的目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伟大的中华民族才重获新生，从而永远结束了任人宰割、受尽欺凌屈辱的历史，百年国耻才得以彻底雪洗。为此，毛泽东同志代表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 1/4 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中国人民才真正享有了应有的人格尊严，中华民族才真正重新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并赢得全世界广泛的尊敬。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铭记百年国耻，振奋民族精神，这是历史，也是现实所赋于我们的神圣任务。江泽民总书记不止一次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都要认真学习和了解祖国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这是让我们都能深刻了解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是怎样遭受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蹂躏和压迫的；要永远记住这段血和泪、仇和恨的悲惨历史。更要知道，无数爱国青年和革命志士，为了中国的独立富强，雪洗百年国耻，历经磨难、流血牺牲，才为我们争取到今天的幸福生活。真正懂得，我们之所以有今天，实在来之不易。同时，也是让我们都能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仍不太平，民族压迫、强权政治仍在肆虐横行。而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经济技术还远远落后发达国家，国势的增涨还未达到足以制止霸权势力的扩张，落后挨打的局面还未根本改变。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我们必须重温历史，牢记历史上发生的每个国耻纪念日的悲惨史实，用以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树立高度的民族自爱、自尊、自信心，宏扬自强不息的传统民族精神，投身到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行列中去，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强大，使“落后挨打”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总之，要把“勿忘国耻”永远作为我们建设祖国的强大动力。

梁义群

一百个国耻纪念日

1840 年 7 月 6 日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首陷定海城

1839 年 3 月至 6 月，中国人民禁烟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给英国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英国资产阶级出于维护其“鸦片贸易”侵略中国的目的，在 1840 年 6 月，开始发动蓄谋已久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英国侵略军到达中国海面后，对广州实行了封锁。广州军民在林则徐的带领下，对入侵者早已严加戒备。侵华英军总司令乔治·懿律见无隙可乘，便按原订计划，掉转船头，率军北窜。7 月，英军进犯福建厦门，新任闽浙总督邓廷桢也作了防备。英国侵略者在厦门受挫后，即派伯麦率领军舰 5 艘、武装轮船 3 艘，运输舰 21 艘，于 1840 年 7 月 4 日闯进定海水域。定海位于舟山岛南部，地形险要，物产富庶，有良好的天然条件。清军在定海设有水师镇守，共有水陆兵勇 2800 余名。当英国舰船闯入定海时，“清军水师竟毫无戒备，不仅未予拦截，知县姚怀祥还登舰询问来意。伯麦当即向姚交出照会，限次日下午 2 时前投降，将所属海岛、炮台统统交出，否则开炮轰城。姚怀祥返回后，即与文武官员商讨对策。针对英军拥有船炮的长处，多数人主张将一半水陆部队撤至城内防守，一半水陆部队撤至城外附近堵击。姚怀祥则主张撤兵进城，坚守待援。但水师总兵张朝发却认为守城不属水师的责任。由于意见不一，只好水陆分守，并相约：在外者主战，战虽败不得入；在内者主守，守虽溃不得出。5 日下午，伯麦见清军无献城投降迹象；便下令发起进攻。张朝发虽率水师迎战，但因英舰大炮多，射程较远，清军船小炮少，射程又近，故交战不久，清军便损失严重，张朝发也受了伤，遂率部向镇海方向退却。英军在舰炮掩护下登陆，攻占了定海县城东南的关山炮台，并连夜炮击走海县城。6 日凌晨，英军攻破东门，知县姚怀祥出北门投河自尽，守城兵勇溃散，定海失陷。

英国侵略军入城后，即对定海人民大肆屠杀和掠夺。他们闯入每一幢房子，打开每一只箱筐，劫掠一空。满街躺着受伤的清军士兵和百姓，有的只有一只脚，有的两只脚都没了，有的血肉模糊，或身首异处，惨不忍睹。本来非常美丽富庶的舟山岛，经此浩劫，变得一片荒芜。原来聚集在港口的数万只打渔船，一只也见不到了。英军虽诱使当地百姓返回家园，但无一人响应。景象之惨，可见一斑。

由于舟山岛占有重要战略地位，因此素为英国侵略者所垂涎。英国侵略者占据定海之后，便妄图长期霸占。当时侵略军头目纷纷来到定海县城。7 月 6、7 日，懿律、商务监督查理·义律和披着传教士外衣的侵略分子马礼逊、郭士力等相继麇集定海，策划建立殖民统治机构，决定以陆军司令布尔利上校管理定海军务，以郭士力治理定海民政。英国侵略者为了巩固在定海的殖民统治和准备第二步侵略布署，分头派出舰船严密封锁宁波的河流、港口，并探查、测量、封锁长江口，还到处进行劫掠。

舟山定海之战，是英国侵略者第一次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的战争，也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丧师失地蒙受耻辱的败仗。它一开始就深刻地暴露出侵略者的残暴凶恶和清王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极端腐朽的真实面目。

1841 年 1 月 26 日　英军强占香港，建立侵华基地

从 1840 年 8 月至 1841 年 1 月，清政府委派直隶总督倚善为钦差大臣，先后在天津大沽和广东穿鼻与英国侵略者的代表义律进行过谈判。1841 年 1 月 21 日，义律宣称已与琦善签订了停战协定即所谓《穿鼻草约》。但近年我国有关学者，经查阅英国档案馆所藏琦善与义津当时在中英交涉期间的逐日往来照会证实，所谓《穿鼻草约》纯系义律捏造出来的。义律之所以无耻地捏造出所谓《穿鼻草约》，实为英国侵占香港编造理由。事实正是如此。1841 年 1 月 26 日，义律公然派兵强占了香港。

香港是我国南海上的一颗名珠，位于广东省珠江口东南方，是九龙尖沙嘴南边的一个岛屿。全岛面积为 75.6 平方公里。香港之东为鲤鱼门，西为急星门，南为南了岛，担杆列岛，西南有外伶仃岛和老万山列岛；急星门以西为大屿岛，大屿岛以西为磨石洋，以北为铜鼓洋。香港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早年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东方的日本都曾对香港进行过多次侵扰。由于我国军民英勇抗击，一次次地打退了侵略者的进犯。

英国殖民主义者早就有霸占香港的野心，从 1637 年起，就开始筹谋夺取香港了。随着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1825 年爆发了由于“ 生产过剩 ”引起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英国开始大肆向外扩张，开辟新的更为广阔的市场。在这样情况下，1833 年曾任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鸦片战争前，广州外国商船或行商的首脑）的侵略分子斯当东，向英国下院提出侵占中国沿海岛屿的主张。1834 年受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指使来华进行侵略活动的律劳卑，认为香港在战略上和商业上对英国侵略者有利，主张英国政府加以劫夺。但是，当时英国侵略者内部对占领中国哪几个岛屿尚有争议，主要目标为台湾、舟山、香港三个岛屿。经过反复斟酌，最后侵略者的目标才集中在香港。他们认为香港除了拥有非常安全广阔的停泊港，给水方便之外，而且还容易防守。如果中国停止广州贸易，因香港接近广州，贸易还可以移到香港进行。因此，义律极力捏造并公布了《穿鼻草约》，以作为其侵占香港的“ 口实 ”。义律捏造的所谓《穿鼻草约》的主要内容为：

一、香港本岛及港口割让与英王；

二、赔偿英国政府烟价 600 万元；

三、开放广州海口贸易等。

据此，义律通知琦善：英军即将开赴“ 香港岛驻扎 ”。接着，英舰“ 硫磺号 ”便于 26 日进占香港岛。在英军占领香港后第三天即 29 日，伯麦便照会驻香港的有关中国官员，再次谎称：根据所谓《穿鼻草约》，香港已属英国主治，强令中国驻香港的官兵必须撤走。英国占领香港的目的，鸦片战争发动者巴麦尊直言不讳的供认，就是为了给中国领土插入一个“ 楔子 ”，使其成为英国侵略中国的“ 军事和商务基地 ”，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控制中国。事实上，100 多年来，香港就成了英国侵略者进攻中国的基地。

1841 年 5 月 27 日　败将奕山求和，签订《广州和约》

1841 年 1 月 27 日，当英军攻破大角、沙角炮台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使道光帝的态度发生了极大转变。他由主和一变而为主战，立即下诏对英宣战，并作出将琦善交刑部议处的决定，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从各省调集军队 1700 人开赴广东。义律获悉清政府调兵遣将，准备反击的消息后，决定先发制人，于 2 月下旬，抢先对虎门炮

台发起了进攻。62 岁的水师提督关天培亲登炮台，率军英勇抵抗。在战斗中，他受伤多处，血染衣甲，仍坚守炮台，誓死不撤。而琦善在这危急时刻，竟拒绝派兵增援。关天培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与守军数百人一起壮烈牺牲。虎门失陷后，英国侵略军又连续攻占乌涌、定功台，攻破了广州的前道大门，兵临广州城下。义律发出布告，扬言要以武力强迫通商，中国军队如对英军有任何危害，就要把广州城毁掉。虽然清政府官员立即给各国商船颁发通商许可证，但义律并未停止侵略行动，率英军继续攻陷并毁坏了广州城附近各要塞。在英国侵略者武力威逼之下，奉旨前来“剿办”的参赞大臣杨芳，对敌妥协退让，于 3 月 20 日被迫签订了中英《停战贸易协定》。

中英《停战贸易协定》的签订，使英国侵略者得以在中国倾销大量鸦片并从中国运回英国所急需的茶叶，同时调兵遣将，为进攻广州及进一步扩大战争作准备。为此，英国侵略军一方面请求印度总督增加援军，另一方面义津经过侦探暂时放弃北上计划，命令海陆军进攻广州。随之，英国舰队便向广州进发。5 月 21 日，英国侵略军已作好进攻广州的一切准备。正在此时，靖逆将军奕山命令清军于当天夜里分三路发起反攻，希图侥幸取胜，邀功求赏。由于奕山是在没有切实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对英船发起夜袭的，结果溃败逃回广州。清军三路反攻失利，英军乘势反扑，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轻易占领了城郊的泥城、四方等炮台，包围了广州城，并发炮轰击城内。奕山等人慌作一团，在城上高悬起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求和。27 日，奕山与义律订立了屈辱的《广州和约》。和约规定：清军在 6 日内撤驻广州城外 60 里；7 天内交出“赎城费”600 万元；赔偿英国商馆损失 30 万元。和约并未涉及香港的地位问题，但义律却于 6 日 7 日单方面宣布香港为“自由港”。

奕山等不敢将战败乞和的协定如实上奏，谎报英军“投伏于地，向城作礼，乞还商款”欺骗清廷，得到道光帝“准令通商”的许可。从此，英国侵略者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向中国倾销鸦片了。

1842 年 6 月 19 日　英军侵占上海，大行勒索抢掠

1841 年 4 月，英国政府接到义律炮制的所谓《穿鼻草约》后，认为这个条约中所获得的侵略权益太少，大为不满。因此，决定撤回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同时还更换了司令官，增派了侵略军。并给璞鼎查一个详细训令。特别指出，只有清政府无条件的允诺英国索取的各项特权，才能停止军事行动。

从 8 月下旬至 10 月中旬，璞鼎查率领侵略军先后攻占了厦门、定海、镇江三城，使得清廷大为震动，道光帝下令重新迎战。10 月 18 日，道光帝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并从江西、甘肃等省调集军队 20 万人赴浙江前线。奕经同奕山一样昏庸无能，终日游山玩水，寻欢作乐，对战事不做认真准备，一味听信假情报并愚蠢地迷信梦寐。1842 年 3 月下旬的一天，他忽然决定从绍兴分兵三路袭取镇海、定海、宁波三城。因作战消息早已走露，英军做好了准备，清军一出师就败下阵来，奕经等人逃回杭州，不敢再战。

清军在浙江战场上的惨败，促使道光帝从忽战忽和转为一意求和，下令沿海各省不许进兵，并任命盛京将军营英为钦差大臣，会同被革职的两江总督伊里布赶往浙江前线，办理议和停战事宜，但是遭到英国侵略者的拒绝。

英军按照原订计划，开始大举入侵长江流域。

1842 年 6 月 16 日凌晨，英国海军司令巴加率军舰 70 余艘进入长江口，先后侵占了吴淞和宝山。当晚，英舰“戴窦”号载着从印度前来增援的英军 2500 人到达吴淞口外，使英军兵力又有增加。于是，英军派出第 18 团和第 49 团以及炮兵、工兵分队约 1000 人，于 6 月 19 日由吴淞南下，另以“北极星”号等八九艘舰船，载着水兵和海军陆战队溯黄浦江而上，水陆两路向上海进犯。由于清军事先已经撤离，所以英军在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便侵占上海。

当英国侵略军侵占上海这座富裕的东方大城市后，便疯狂地进行奸淫掳掠。清军的 171 门铜炮和 9 吨重的火药及大批存粮，均落入敌人之手。英军在上海城内及四郊到处翻箱倒柜，抢掠财物及鸡鸭，逼索银元，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英国侵略军还用出卖“护照”的办法向人民征集物资，索要牛、羊、鸡、鸭等。又到处杀人放火，城内外的房屋大多被英军焚毁。同时还蛮横地向上海政府当局勒索赎城费 100 万元，然后才于 6 月 23 日退出。在退出上海时，又搜捕百姓作劳役，搬运物资、大炮和火药，日夜不停，还将他们绑在船上不许回家。英军在吴淞口集结，待援军到齐后便沿江北犯，以进一步实现其罪恶目的。

1842 年 7 月 21 日　英军攻占镇江，屠戮爱国官兵

英国侵略军撤出上海后，除留下 2 艘军舰封锁长江口以保证后路安全外，其余 11 艘军舰、9 艘轮船、4 艘运兵船和 48 艘运输船均驶离吴淞口，然后溯江而上。7 月 17 日，英舰在没有受到清军多少抵抗的情况下，进入镇江江面，随即封锁瓜洲运河北口，切断漕运。

镇江城位于长江南岸的长江与大运河交汇处，西北有金山，东北有北固山、焦山、象山，是运河的咽喉。江宁（南京）的屏障。因此，清政府派由副都统海龄率旗兵 1600 名、绿营兵 400 名驻守镇江，并调四川提督齐慎、湖北提督刘允孝分别带江西和湖北兵勇各 1000 余名前来援助，在城外驻扎。在侵略军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清军却不能齐心合力，一致对敌，而是各自为战；副都统海龄又未派兵控制金山与北固山等制高点，却将全部旗兵调至城内，紧闭四门，不准百姓出城。英国侵略军经过侦察，以为清军主力驻扎在城外，进攻镇江城将不会受到大的抵抗，因此决定由陆军负责攻城计划，将 6915 名陆军士兵分别组成第一、二、三旅和炮兵旅，以大部分兵力担任主攻，少部分兵力牵制和分散清军兵力。

21 日晨，英军发起攻击。主力部队登陆后直扑清军城外兵营。齐慎，刘允孝难以应付，率队伍退保新丰镇，英军直趋城下。然后，英军蜂拥爬梯登城，守城旗兵起而抵抗，将英军推下城去，有的与敌军扭打在一起滚到城下。上午 10 时许，北门被攻破。当英国侵略者进攻西门时，又遇到旗兵更加顽强的抵抗，英军久攻不下，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便用火药包将城门炸开，大队英军进入城内，守城爱国官兵与英军展开激烈巷战和肉搏战。许多旗兵宁死不屈，有的甚至将自己的妻儿杀死，或者投入井里淹死，然后与英军拼死决斗，直到牺牲。海龄始终是身先士卒，督率旗兵堵击。在他身受重伤的情况下，仍鼓励将士作最后努力，争取胜利。并大声疾呼：宁可战死疆场，也不在野蛮侵略者面前苟延残喘。直到因寡不敌众，无法挽回大局的最后时

刻，他还向旗兵发出：“宁可自杀，决不投降”的号召。最后他将自己的房子烧毁，自缢而死。在海龄的影响下，旗兵全部战死，而无一人投降。为此，恩格斯专门写文章赞扬这一壮举，并断言：“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英国侵略军）绝对到不了南京。”虽然镇江最后失守，但英军受到清军爱国官兵的沉重打击，死伤达 180 余人之多。

英军受到打击之后，就以极残忍的手段施行报复，在镇江又一次大发强盗的兽性，对镇江爱国官兵进行大肆屠戮。英国侵略军在镇江逐户劫掠，无家不破。大火连日不熄，全市焚毁一空。满街都是妇女尸体，无不散发赤身，惨不忍睹。英军还掠取和破坏城中清军的武器和军用物资，抢走价值 6 万元纹银。镇江经英国侵略者蹂躏之后，变成一片废墟。就连侵略分子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心肠最硬、长期干着杀人越货勾当的人，见此悲惨景象，也不能无动于衷。”

镇江保卫战是鸦片战争中清军以劣势的兵力，落后的武器装备，打得最为英勇悲壮的一战。英军投入此役的兵力，是鸦片战争开始以来最多的一次，而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最大的一次。

1842 年 8 月 29 日　英军逼签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在英国侵略军步步威逼和清军连连失利的情况下，清朝统治者中投降派占了上风。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公然表示，投降而交出的赔款同作战所花费用差不多，所以不如趁早投降。于是，1842 年 8 月 4 日，英国侵略舰队在未遇清军丝毫抵抗的情况下，驶抵南京城下。被侵略者的炮舰政策吓破了胆的道光帝，立即派钦差大臣耆英、两江总督牛鉴、署浦副都统伊里布为代表向侵略者乞和。从 8 月 8 日至 29 日，进行长达 3 个星期的谈判。起初，耆英等人以为只要表示投降，允许通商，好像问题即可解决。哪知侵略者的胃口大得很，竟提出要中国皇帝认错，赔偿赎城费、烟价、战费、还商欠、开商埠、割让香港等一系列无理要求。清政府代表未立即答应。11 日，英国侵略军令各舰船的官兵登陆，摆出要攻城的架式。清政府的代表慌了手脚，立即派出官员带着照会赴英舰向敌求和。随之，清政府谈判代表才服服贴贴地继续坐下来与英国侵略者的代表正式谈判。为此，耆英、伊里布、牛鉴亲赴“皋华丽”号军舰。但根本未进行谈判，英方却别有用心地安排耆英等人参观英舰，借以炫耀其武力的精良。耆英等果然被其“船坚炮猛”所慑服，所以在决定条约内容的正式会议上，耆英等人只是“一揽即了”。1842 年 8 月 29 日，他们正式与英国侵略者的代表璞鼎查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兵船“康华利”号上，签订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同耻条约——《南京条约》。

中英《南京条约》共 13 款，其主要内容为：

一、五口通商。条约的第 2 款规定：“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

二、割让香港。条约的第 3 款规定：清朝“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君主及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就是说，清政府答应将香港割让给英国。

三、清政府向英国赔款 2100 万元。条约第 7 款规定：“清政府须向英国赔偿款项 2100 万元，分 4 年交清。”其中鸦片费 600 万元，商欠费 300 万元，水陆军费 1200 万元。此中还不包括广州所付赎城费 600 万元，以及其它赔偿

和英军在各地劫掠款项。据有人统计，加上这些赔偿或劫掠的款项，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从中国实际上共掠夺 2836.6921 万元。

四、协定关税。条约第 10 款规定：“英商在五口按定例交纳进出口货税、饷费，如有增减，需经中英双方协商议定。”

五、条约还规定，英国在通商口岸派设领事等官，英国官员与中国官员平行往来；废除广东公行制度，先交赔款 600 万元，英军始从南京、镇江、镇海之招宝山等地退出，舟山、厦门鼓浪屿等地的英军待赔款全部交清和五口都开埠后，方才退出，等等。

接着，英国侵略者又利用耆英于 1843 年 6 月 26 日在香港与璞鼎查互换《南京条约》批准书之机，议定了中英《过境税声明》，目的是要控制中国内地的关税。7 月 22 日，英国侵略者又在香港公布了《五日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其主要内容：一是领事裁判权。准许英国在 5 个通商口岸派设领事，领事可以在中国行使司法权，英国侨民和商人不受中国法律约束；二是规定出值百抽五的进出口货物税率，使中国丧失了关税自决的权利。

总之，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等主权遭到严重破坏，使中国开始丧失了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逐步变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而且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各国资产阶级对英国所取得的侵略利益十分眼红，纷纷接踵而来，对中国发动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的侵略战争。

1843 年 10 月 8 日　英国逼签《虎门条约》，攫取片面最惠国待遇

1843 年 10 月 8 日，耆英与璞鼎查代表中英双方在虎门签订了《虎门条约》。在此之前，7 月 22 日于香港公布的《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也被看作是《虎门条约》的一部分，因此一般人也就把《虎门条约》的签字日期作为该章程及税则的签订日期。

《虎门条约》共计 16 条，后附“小船定例”3 条，其中有关丧权辱国的主要条款有：

一、片面最惠国待遇。条约第 8 条规定：“将来（中国）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这一条款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在中外关系史上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是因为它是片面的而不是互惠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只有给侵略者以优惠待遇，却不能使中国受益。所谓“一体均沾”，反映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过程中的一种“利益均沾”的野心，使此后任何一个侵略国家从中国攫取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时，其它有约国都可无条件地同享。这样就使各侵略国单单为这个目的，便会直接或间接支持任何一个国家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从而造成了侵略者联合向中国攫夺特权的严重局面。

二、外国军舰常驻中国港口的特权。条约第 10 条规定：“凡通商五港口必须有英国官船（指军舰）一只在彼湾停泊，……凡有此等官船到中国时，中国兵船不得拦阻，至于英国官船既不载货，又不贸易，自可免纳船钞。”其结果，这些常泊中国港口的外国军舰，就成为侵略者向中国挑衅和勒索的工具，同时也为其武装干涉中国内政、镇压中国人民提供了方便条件。

三。允许英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居住。《南京条约》第 2 条规定了英人可携眷在五口寄居的条文。《虎门条约》第 7 条进一步规定：“中华地方

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英国管事官每年以英人或建屋若干间，或租屋若干所，通报地方官，转报立案。”这样，允许外国人在口岸居住和租地，便直接导致了日后允许各通商口岸外国租界地的建立，其危害是极大的。

《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和《虎门条约》是《南京条约》的重要补充，使英国侵略者进一步取得关税协定、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军舰驻中国港口以及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居住等特权，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破坏。由于这些条约的签订，使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商品得到很大便利，本国手工业生产因敌不过外国工业品的竞争而日趋破产，封建自然经济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步一步地从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44 年 7 月 3 日　美国逼签《望厦条约》，确立“利益均沾”原则

在林则徐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广州禁烟运动中，美国鸦片烟贩同样受到应有的打击。因此，正当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千方百计阻挠、甚至不惜挑起战争来破坏中国禁烟运动的时候，在广州的美国鸦片烟贩，也于 1839 年 5 月联合上书美国国会，要求美国与英、法、荷等国联合起来，迫使中国政府接受不平等条约，打开中国的大门，以从中渔利。1840 年 1 月，这份请愿书送到美国国会后，引起美国官方的重视。但美国国内有一部分对华贸易商人不赞成直接参加英国的侵略战争，他们认为采取趁火打劫的方式对美国会更加有利。于是，美国政府派加尼率东印度舰队来中国，以便乘机捞取好处。加尼来华后，在战争中为英军声援，战后又逼迫清政府赔偿美商“损失”数十万银元。

当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和法国，都跟着英国要求清政府与其签订类似中英《南京条约》的不平等条约。英国侵略者对此是允许的，认为它已向中国索取到最惠国的待遇，所以它不怕其它国家在对华商品贸易和鸦片走私上与其竞争。如果它国取得新的特权，英国也能够得到“利益均沾”。于是，1843 年 5 月，美国即派以顾盛为专使的使团来华。美国政府在给顾盛的训令中指出，美国必须获得与英国相同的通商条件。1844 年 7 月 3 日，耆英经不起顾盛所施加的压力，便在澳门界栅外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

中美《望厦条约》共 34 款。美国通过该条约，除依据“利益均沾”的原则取得英国在《南京条约》及附约中所取得的各种特权外，还获得了中英条约中所没有，或虽有而尚未明确规定的权利。主要是：

一、对领事裁判权的特殊规定。与中英五口贸易章程相比较，领事裁判权在《望厦条约》里有了更明确、更具体的规定。不仅美侨与中国人或美侨之间的民事刑事案件，甚至美侨与任何外籍侨民在中国发生诉讼，都得由美国领事审讯，使中国的主权遭到更大的破坏。

二、进一步破坏关税自主权。条约第 2 款规定：“倘中国以后欲将税率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

三、进一步侵犯中国领海权的规定。1.美国商船如果不卸货，可以在五个通商口岸的任何一个口岸停留两天，不必交税。2.美国已纳吨税的船舶，前往另一个口岸时，不必重纳。3.美国已经起岸并交纳关税的货物，可以转

装另一个口岸，进口时可以凭海关证件免税通过。在条约第 32 款特别规定：美国兵船不仅可以任意到中国各港口“巡查贸易”，而且各港口官员还得负责接待。第 26 款又规定：“合众国贸易船只进中国五港口停泊……，中国无以统辖。”这就是外国船只可以自由出入中国领海的权利，中国无权干涉。

此外，条约第 17 款还规定，美国人可在五口自行建造礼拜堂，这成为后来法国要求弛禁天主教的前导。条约最末一款规定 12 年后修约，这又为列强日后进一步向中国进行勒索埋下祸根，引起了无穷的修约纠纷。

中美《望厦条约》是比中英条约更加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它成为此后中法《黄埔条约》及其它列强与中国所订不平等条约的范本。

1844 年 10 月 24 日　法国仿效英美，逼签《黄埔条约》

在鸦片战争之前，法国虽为欧洲大陆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对中国的贸易却落在英美之后。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后，法国开始注意中国情况，企图乘机渔利。1841 年，法国派真盛意来华刺探情况，以提供法国侵略者制定侵略中国的决策的根据。1842 年 6 月，当英军进攻吴淞口之际，法国侵略者就派出两艘军舰，并配有数十门大炮，同时开进吴淞口，另一只军舰曾上驶到南京草鞋峡江面，为英国侵略军助威。为了效法英国侵略者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经验，法军一舰长特意赶到南京，参加中英《南京条约》的签字仪式。中英《南京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先后签订，对法国侵略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使他们决心援照英美先例，迫使清政府与其签订不平等条约。1844 年 8 月 14 日，法国政府急忙派出大使拉萼尼来到澳门，并带着 8 艘兵船，以显示实力。10 月 l 日，耆英接见拉萼尼，但拉萼尼不吐露来意，使得耆英左探右测，仍然莫名其妙，如堕五里雾中。其实，拉萼尼也是模仿美国专使顾盛的做法，对耆英施行威胁讹诈，扬言要带着军舰进京朝见中国皇帝，甚至要呆在京城赖着不走。拉萼尼在研究了中英、中美条约的基础上，提出援引英美先例订立商约的要求。耆英无法抗拒法国侵略者的压力，很快答应了拉萼尼的要求。并与拉萼尼于 1844 年 10 月 24 日，在广州黄埔的法国“阿吉默特”号军舰上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

中法《黄埔条约》共有 36 款，附有《海关税则》，基本上以中美《望厦条约》为蓝本。法国除享有英美从中国攫取的诸如协定关税、五口通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权利外，还取得了一些新的特权。如第 22 款规定，法国人在五口地方租赁房屋行栈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时，其“房屋间数，地段宽广，不必议立限制”。这就给日后法国扩大租界提供了口实。特别是在同款中，又规定了给予法国人在五口建造礼拜堂及坟地的特权，而中国不能“触犯毁坏”的条文，这又给中国政府强加了保护教堂的“义务”，为外国侵略者利用传教权利进行公开侵华活动铺平了道路。

1844 年 11 月 11 日　开弛天主教禁令，又添侵略方式

法国虽然通过中法《黄埔条约》取得在五口建造教堂传教之权，但是清政府自 1724 年（雍正元年）初宣布的禁教令仍未废除，这对一向利用天主教作为对外重要侵略工具的法国是个巨大障碍。所以法国公使拉萼尼决意于条约之外，力争迫使清政府取消禁教令，允许外国传教上在中国自由传教。耆

英在拉萼尼坚决要求之下，十分惧怕法国“别生枝节”，准备对法妥协，但又不敢公开违背清廷的旨意。于是他上奏道光帝谎称与拉萼尼经过多次交涉，辩论长达数日之久，竭尽全力，据理力争。然后又以法国兵船很多，要航海远来中国相恫吓，建议道光帝最好答应拉萼尼提出的开弛天主教的要求。果然，道光帝听信了耆英的一番劝说，于 1844 年 11 月 11 日，正式批准天主教弛禁。

道光帝本来想借此做法应付一下拉萼尼，所以表面上虽答应弛禁，但却不公开宣布弛禁令。当然，这对决心要迫使中国取消禁教令的拉萼尼来说，是不能接受的。1845 年 8 月初，拉萼尼利用《黄埔条约》即将换约的时机，向耆英提出公布弛禁令的要求。换约以后，拉萼尼亲自到上海、宁波、厦门各口岸实地了解，然后以各地实行弛禁令“有名无实”为理由，要挟清政府必须切实实行天主教弛禁令，否则“两国之事，正未可知”。在其蛮横威胁下，道光帝被迫于 1846 年 2 月 20 日正式下令，不许各地官吏再查禁天主教。对于康熙年间所建造的天主教堂，除了已经改成庙宇或者民房的以外，其余一律发还教徒，满足了拉萼尼的全部侵略要求。

拉萼尼逼迫清政府开放教禁，是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从此以后，法国对华侵略又添了一种新的方式，即借传教之名，进行政治、文化侵略。由于资本主义列强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这个新的侵略特权同样也被其他各国所获得。后来传教特权经一再扩充，外国传教士便伴随着鸦片和商品，源源不断地侵入中国。在外国侵略者操纵下，教会逐渐发展成为干涉行政、包揽词讼、搜集情报、霸占田产、欺压人民的活动场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1845 年 11 月 29 日　英国强索租界，《上海租地章程》出笼

所谓“租界”，就是资本主义列强侵入中国后，在我国重要商埠、口岸强占的一定地区，以此作为对我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据点。外国侵略者在我国强迫划设“租界”，开始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在 1842 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中，曾做了准许英人“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的规定。接着，又在《虎门条约》中进一步规定：“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列强据此为口实，开始在五口不断地划设和扩展“租界”。

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强占的第一个“租界”是上海。上海开埠后，英国第一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胁迫上海道台宫慕久与其签订《上海租地章程》，并于 1845 年 11 月 29 日，以上海道台告示的形式加以公布。该章程中文本已无从查考，现存者系从 1852 年 1 月 17 日《北华捷报》所载英译章程全文转译而来的。该章程未经清政府批准，是由宫慕久当作单纯地方事件而自行处理的。1845 年底，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苏松太道吴健彰，与上海英、法、美三国领事又签订了《海英法美租界地章程》，这就成为外国侵略者在我国划设“租界”的第一个正式文件。

《上海租地章程》共 23 条，“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东边黄浦江，成为自然边界，只有西界尚未确定。《章程》的许多条款都反映了英国的侵略意向，其中最明显

的是：

一、第 9 条规定：“承租人可以退租”，“但原业主却不得退租或增租”。就是说，承租人一旦租得土地或房屋，只要愿意继续租用，并逐年缴纳一定数额的年租后，便可无限期地一直租用下去。这实质上是一种片面的“永租”制。

二、第 15 条规定，界内土地，华民不得互相租让；也不得建造房屋租与华商。第 16 条又规定，外商于租界内租得土地后，不得建造房屋租与华民，或供华民使用。这表明，一旦被划设“租界”以后，中国人民就完全失去租地租房使用居住的权利。

三、第 21 条还做了特别规定，其他各国商人，只要遵照土地章程中的各种规定，就可以与英人一样在租界内建房、赁房居住、租栈房囤货，或暂时居住。不过，在 14 条又做了在手续上须同英人一样，应先得到英国领事馆的批准的规定。这就暴露出英国侵略者一开始就想将各国“租界”地置于英国领事专管之下，并要在中国大陆上建立一个巩固的侵略堡垒的野心。

在《上海租地章程》公布以后，英国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在上海的租界地，于 1846 年 9 月又胁迫上海道台宫慕久答应以边路为租地之西界。这样，周边面积约 830 亩的地段便成了英国人占用的居留地，即后来所称的“英租界”。英国侵略者在上海勒索土地的目的如愿以偿。

上海英租界是资本主义侵略者在中国大陆上所勒索到的第一块租界地。继英国之后，法、美等国也同时在上海强行勒索租界。此后，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在所有的通商口岸城市强行划设“租界”。帝国主义在“租界”内建立自己的统治机构，完全享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警察权和财政权。实际上“租界”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也就等于“国中之国”。“租界”是帝国主义用来控制中国经济和财政命脉的堡垒，也是帝国主义在文化思想上麻痹和毒害中国人民的重要据点，帝国主义在“租界”里，可以任意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总之“租界”是中国被侮辱、被侵害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象征，是一所人间活地狱。

1853 年 10 月 4 日　沙俄向黑龙江下游扩张，首占库页岛

沙皇俄国是一个掠夺成性的殖民国家。虽然在清代康熙年间，即 1689 年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除乌第河地区外的中俄东段边界，但它从未放弃吞并中国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的野心。到了 19 世纪中叶，由于俄国内部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开始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现实，沙俄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直到 19 世纪前半叶，俄国人对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仍缺乏了解，甚至对库页岛是岛还是半岛都搞不清楚。从 19 世纪中叶起，沙俄为了实现其侵略中国的野心，特别重视对黑龙江及库页岛的考察。而这种考察也就成了沙俄对中国黑龙江地区及库页岛进行侵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先导。

1849 年 2 月，沙俄政府决定：由海军派遣以涅维尔斯科依为队长的海上“考察队”（实际上已派出），勘察黑龙江口及库页岛；由陆军派遣以阿赫杰中校为队长的陆上“考察队”，到外兴安岭南麓的中国领土上去“考察”涅维尔斯科依率领的“考察队”，经过几个月的“考察”。弄清了从海峡南北方向都可以进入黑龙江，库页岛是一个海岛等情况，为沙俄搜集了有关黑

龙江口一带及库页岛沿岸极其重要的情报。

1850 年夏，涅维尔斯科依受沙皇政府的派遣，再次由海上到达黑龙江口，占领海湾，在海岸建立侵略据点——彼得冬营，并用手枪威胁向他提出抗议的清朝官员和村民，狂妄叫嚣：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全部滨海地区及库页岛都是俄国属地。接着窜入庙街，在明朝建立的水宁寺碑所在地特林建立了哨所。1852 年，阿赫杰率须的陆上“考察队”也完成“勘察”任务，向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呈交了关于黑龙江的重要情报资料和地图。穆拉维约夫认为，要占领黑龙江以北及沿海地区的大片中国领土，现在就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为此他上书沙皇，力主马上批准俄美公司占领库页岛。这年的 4 月 23 日，尼古拉一世接受了穆拉维约夫的建议，悍然授权俄美公司占据库页岛。穆拉维约夫立即将这一决定通知当时正在黑龙江口从事侵略活动的涅维尔斯科依，命令他在库页岛南部先占据两三个据点，架设大炮，构筑工事，升起俄美公司的旗帜。并悍然叫嚣：“俄国国旗不论在哪里一经升起，就不应当再降下来。”6 月，沙俄派兵进入哈吉湾。8 月，建立康斯坦丁哨所。10 月 4 日，又侵入库页岛南端优良港湾，强行登陆，建立穆拉维约夫哨所，并宣称：“库页岛作为黑龙江下游的延续地区，属俄国所有。”至此，沙俄已把黑龙江下游地区大片中国领土，置于它的军事控制之下，为侵吞整个黑龙江流域创造了条件。

1856 年 10 月 23 日　英法联合侵华，中国再陷深渊

在中美《望厦条约》最后一款，写有“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 12 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的条文。从条文来看，显然是指在具体执行中对原约的有关枝节问题，12 年后可“稍有变通”。英、法、美为了从中国攫取更多的特权，便以此为“修约”的借口，以达到全面修约的目的。

1854 年，中英《南京条约》届满 12 年，英国援引“最惠国条款”，提出修约要求，美、法两国表示支持。这一年 4 月，英、法、美三国公使到达广州，向办理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叶名琛要求“修约”。英国提出 18 条要求，主要是：中国全境开放通商，至少长江自由通航；承认鸦片贸易为全法贸易；废除进出口货物的内地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美国提出 11 条要求，主要内容是：开放长江，允许美国人到中国内地贸易、传教、居住，在中国沿海捕鱼、开矿。法国除提出类似要求外，还要求释放非法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的传教士。为此，英、美、法公使曾两次与叶名琛交涉“修约”。叶名琛先是避而不答，后复文明确表示要“谨守成约”。列强又向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提出“修约”要求。他们不敢贸然应允，经奏请道光帝，遭到拒绝，英、美、法公使一无所获。到 1856 年，美国借《望厦条约》届满 12 年之机，第二次向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主要内容为：外国公使驻京，中国全境开放，通商贸易不受限制，外国人在华传教自由，改造中国司法机关等。英法公使也先后照会叶名琛，表示支持美国要求，但这次要求依然毫无结果。

英法侵略者以和平“修约”达到扩大侵略特权的目的未能达到，便决定寻找借口发动军事进攻。1856 年 2 月 29 日，广西南林县依照中国法律判处经常潜入中国内地进行非法活动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马赖死刑，法国侵略者

便抓住所谓“马神甫事件”，以保护教会作为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与此同时，英国也制造了所谓“亚罗”号事件，作为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1856 年 10 月 8 日，中国广东水师官兵，逮捕了停泊在广州黄埔港中国划艇“亚罗”号上的海盗和有海盗嫌疑的水手。本来这纯系中国内政，但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复礼却硬说“亚罗”号归英国“保护”，中国水师无权上船捕人。他还造谣说，中国士兵扯下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侮辱了英国，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立即送回全部人犯，赔偿损失，并向英国道歉。英国驻华公使包令指示巴夏礼，说“亚罗”号的船籍登记已期满失效，“无权接受保护”，“不过中国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应当抗议中国当局违反了中英条约，要求他们 48 小时内赔偿损大，进行道歉，事则就要出动海军，“强迫要求赔偿”。

叶名琛最初不对巴夏礼的无理要求加以驳斥，不久因担心事情闹大，逐渐向英国侵略者屈服。10 月 10 日，叶名深派人将 9 名水手送回“亚罗”号巴夏礼拒绝接收。后来叶名琛派人将人犯全部送回时，巴夏礼仍蛮不讲道理，不予接收，并公然挑衅要求交出带队搜查“亚罗”号的水师军官。叶名琛置之不理。10 月 21 日，巴夏礼发出最后通碟，扬言 24 小时内如“不允所请，即进兵攻城”。叶名琛再一次将全部人犯送去，巴夏礼还是拒不接收，连叶名琛给他的信件也拒绝拆阅。23 日，英国出动军舰 3 艘、划艇 10 多只，海军陆战队约 2000 人进攻广州，挑起了一场新的侵华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恶果比第一次鸦片战争还要严重：由于大批新口岸的开辟，外国侵略势力不仅扩展到沿海各省，而且深入到长江中游地区；由于改定关税，中国经济处于无法与外国抗争的地位。总之，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1857 年 12 月 29 日　英法联军洗劫广州，建立傀儡地方政权

1857 年，英国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军扩大侵华战争。法国任命葛罗为修约全权专使，率军参加对中国的武装侵略。英法对中国的侵略行动得到了美国与沙俄的支持。

10 月，先后抵达香港的英法特使及双方海军司令等经过多次协商，确定英法组成联军，以攻占广州作为发动这次侵略战争的第一个军事行动。12 月上旬，英法联军 5600 多人（其中法军 1000 人）集结在香港、澳门地区，加紧进行战争准备。12 月 12 日，英法公使分别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进入广州城，谈判修改条约，赔偿“损失”，并限 10 天内做出答复。与此同时，英法联军舰队集结在珠江主航道上，掩护其海军陆战队占领与广州城隔江相望的河南地方。12 月 24 日，英法公使再次照会叶名琛等人，要求在 48 小时内交出广州城，并将全部军队撤到城外 30 华里的地方，否则将向广州进攻。

叶名琛轻信所谓英国女王已命令其在华官员与中国“永久相安”的假情报，认为英国不会再行开战。英法公使的两次照会，他都以为是虚张声势而已，不加理睬也不做任何战守准备。直到 12 月 26 日，其部属感到形势危急，建议添调兵勇加强广州防务时，他仍拒不采纳。广州一些绅民请求自备粮饷军械，守城杀敌，他也一概不准。

1857 年 12 月 28 日晨，英法联军 32 艘舰艇 100 多门大口径火炮同时炮

击广州城。随后，4000 多名侵略军分左、中、右三路，分别从二沙尾以及猎德炮台与东固炮台之间登陆。中路约 2000 人主攻东固炮台。驻防在广州东门外的清军千总邓安邦率领乡勇 1000 多人奋勇抵御，防守东固炮台的清军（约 70 名）也发炮轰击登陆的侵略军。在邓安邦统一指挥下，1000 多兵勇同超过自己一倍的敌军鏖战，直到弹药耗尽才被迫于黄昏时放弃东固炮台。当晚，英法联军继续发炮轰击广州城。

29 日晨，占领广州城东一带的英法侵略军向城北发起进攻。防守城北 5 座炮台的总指挥、乍浦副都统来存率旗兵一部，坚守四方炮台。守炮台的官兵居高临下，沉着发炮抵御，毙伤敌兵数百人。侵略军进攻炮台受挫，便转而攻城。广州守军依靠城上工事进行抵抗。不久，侵略军攻入小北门，迅速占领了大北门和东门。退入城内的清军与敌兵展开巷战。下午 2 时，全城战斗停了下来。

30 日，广东巡抚柏贵急忙派人与侵略军“议和”。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在广州西北城墙上竖起白旗，命令城内兵勇撤到城外。几天后，叶名琛当了联军的俘虏，被押往印度加尔各答，于 1859 年 4 月在囚禁中死去。

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指派英国巴夏礼和一名英国军官、一名法国军官 3 人组成所谓“联军委员会”，对广州实行“军事管制”达 3 年之久。卖国贼柏贵、穆克德讷在“联军委员会”严密监督下，照旧担任原职，为外国侵略者维持殖民统治。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由外国侵略者用大炮制造的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

1858 年 5 月 20 日　英法联军攻占大沽，逼签《天津条约》

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额尔金、葛罗决定率联军舰队北犯，计划先在上海威逼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如达不到目的，便进犯大沽口，迫使清政府屈服。美俄公使完全赞同这个侵略汁划，表示愿意在外交上与英法一致行动。1858 年 2 月，英、法、美、俄公使派员前往苏州向江苏巡抚递交照会，要求清政府在 3 月底以前派钦差大臣赴上海谈判，否则将举兵北上。清政府指示两江总督分别照会四国，要求英、法、美公使到广州商办，俄国公使到黑龙江交涉。英、法、美、俄公使的要求遭到拒绝后，相继乘船北上，由香港集中到上海的英、法、美兵舰也分批北犯。

4 月 20 日，四国公使在大沽口会齐，24 日即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出全权大臣前往天津海口进行谈判。他们互相配合，演出了一幕双簧戏：英法公使的口气十分强硬，扬言若不满足所提要求必定采取军事行动；美俄公使则以“调停”的面目出现，劝告清政府尽快会谈。与此同时，英法等国兵舰陆续驶抵大沽口，并派出侦察船探测水道、地形和大沽炮台的军事设施，做好进攻大沽口的各种准备。

大沽口是天津的门户，口外 30 余里有拦江沙一道，大船不便航行。海口两岸建有炮台四座，但守兵只有 700 人。英法联军从上海北犯后，直隶总督谭廷襄等人奉命率军携炮，仓促前往大沽口设防，南、北岸炮台守兵增至 3000 人，大炮增加列 200 多门；炮台后路也驻扎军队数千人，作为后援。

5 月 18 日，英法联军完成了进攻大沽炮台的一切准备。19 日傍晚，联军 16 艘舰艇和 20 多只舢板，载海军陆战队约 2000 人，驶入拦江沙内，占据了有利地形，待命行动。 20 日上午 8 时，英法联军向谭廷襄发出最后通牒，

限令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炮台。两小时后，联军舰艇同时轰击南北两岸炮台，悍然发起进攻。各炮台守军发炮还击，击沉击伤侵略军舢板、舰船多艘，毙伤敌军 100 多人。但在敌人舰炮的接连轰击下，北炮台被击毁，南炮台的炮墙被轰塌，守军伤亡惨重。 11 时，联军派陆战队强行登陆，向炮台进攻。守军冲出炮台，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但炮台后路清军不仅没有前往增援，反而向后溃逃，守军孤立无援，不少将士奋战身亡。当天中午，各炮台相继失守，联军攻陷大沽。

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后，随即溯白河而上，向大津进犯。5 月 26 日，英法联军侵入津郊。同一天，英法公使通知清政府派出大臣，迅速前往议和，否则立即攻击天津城，并带兵进入北京。5 月 28 日，咸丰帝派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代表赶往天津议和，企图与侵略者妥协以缓解北方的军事压力。6 月上旬开始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英法代表十分蛮横，要清政府的代表在他们事先拟就的条款上签字，不准更改一字。咸丰帝认为英法提出的条件太苛刻，一再讨价还价。桂良、花沙纳认为英法侵略者“ 枪炮迅利 ”，难以战胜，极力主张对侵略者让步，集中力量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咸丰帝在英法联军压境、门户洞开的情况下，最后接受桂良等人的主张。6 月 26 日和 27 日，桂良、花沙纳先后与英法代表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

中英《天津条约》56 款，附约 1 款；中法《天津条约》42 款，附约 6 款。其主要内容为：

一、允许英法公使进驻北京，与清政府外交往来，一律使用平等礼节。

二、增开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台湾（后改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为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 10 处为通商口岸，英国人和法国人可在各口岸租地盖屋，设立栈房、礼拜堂、医院等。

三、英国人、法国人可到中国内地各处游历、通商、传教。

四、英法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往来，英法军舰可以驶入中国各个通商口岸。

五、修改税则，减轻英法商船吨税。

六、赔偿英法战费银各 200 万两，赔偿英国“ 商欠 ”银 200 万两；赔偿付清后，英法联军退还广州城。

不久，俄美两国也分别逼清政府与其签订《天津条约》，俄国比英法美从中国攫取的侵略权益更多。《天津条约 7》是外国侵略者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又一副沉重枷锁，它的签订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

1858 年 5 月 28 日　沙俄趁火打劫，逼签《瑷珲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沙俄认为趁火打劫的时机已到，于 1857 年 2 月任命普提雅廷为使华全权代表来天津，向清政府勒索其它列强已经取得的各种侵略权益，并解决所谓的黑龙江“ 未定界址 ”问题，即重新划分中俄两国东段边界。普提雅廷的无理要求遭到清政府的驳斥后，知道呆在天津无法达到目的，便决定南下，于同年 11 月中旬到达香港，与英法美三国公使共谋侵华之计。至此，英法俄美四国的侵华联合战线正式形成。1858 年 4 月，四国公使陆续北上，到达大沽口外。5 月，正当英法联军炮口指向大沽口时，沙俄政府指示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要利用清政府陷入困境的机会，与

中国谈判所谓东段边界问题。5 月 20 日，英法联联军攻占大沽口，沙俄认为机会难得，即对清政府采取南北胁迫之势。穆拉维约夫于 22 日率领军舰到达瑷珲。23 日，穆拉维约夫与奕山谈判，提出中俄东段必须沿黑龙江、乌苏里江划界的无理要求；在大沽，普提雅廷利用清政府担心英法攻打京津的心理进行敲诈勒索，表示可以从中“调停”，代向英法说合，条件是从速接受俄国提出的要求。但是，在穆拉维约夫与奕山谈判中，奕山表示中俄东段边界在《尼布楚条约》中已经明确划定、不应更改。而俄方扬言如果不接受要求就要联合英法联军进攻中国，并出动军舰在黑龙江上示威，鸣枪放炮炫耀武力。当时，中国东北地区边防空虚，沙俄已在黑龙江和蒙古边境集结 2 万多人的兵力。奕山在沙俄的武力威胁下，于 5 月 28 日与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

《瑷珲条约》共 3 条，即：

一、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 60 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只有“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江东六十四屯地区）的中国人，照旧在原地“水远居住”，仍由中国官员管理，俄国人“不得侵犯”。

二、原属中国的乌苏里江以东约 4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为中俄“共管之地”。

三、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此后只准中国、俄国行船，个别外国船只不准由此江河行走”。与此同时，沙俄又于 6 月 13 日诱骗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从而取得了通商口岸，扩大陆路通商以及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内地传教权等侵略权益。

由此可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夺取了比英法美更多的侵略权益，并为以后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埋下伏笔。

1858 年 11 月 8 日　逼签《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列强攫取我国海关权

在清政府与英法美俄先后签订了《天津条约》之后，根据中英《天津条约》第 26 款应尽快于上海举行关税谈判的规定，7 月 14 日，咸丰帝派桂良、花沙纳前往上海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与英法美谈判通商税则。行前，咸丰帝密谕桂良等，务必设法使英法放弃《天津条约》中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以及赔缴兵费后才交还广州等项条款，并准许桂良提出以今后全免关税作为交换条件。

1858 年 10 月 3 日，桂良一行到达上海，次日即照会四国公使，约期会谈通商税则事宜。此时，英国专使额尔金却蛮横要求清廷撤掉支持广东人民抗英的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的职务，解散广东人民抗英组织，并以此作为议决税则的先决条件。桂良因惧怕与英法决裂而再起战火，便屈服答应奏请撤换黄宗汉并解散团练。正式举行谈判以后，清廷派出江苏市政使王有龄、按察使薛焕与英方代表威妥玛和俄理范会商有关税率和通商章程的细节问题。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也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经过反复辩沦，草成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虽桂良等奉有咸丰密谕，但都不愿以全免关税来换取英法在前述几项条款上的让步。因为，首先英国不会答应这一条件，即便答应也不能保证今后不会重提这些要求；其次是当时清廷财政极度困难、倘若全免了关税，军费便更加无从措办。所以，全免关税也并非一劳水逸之策。桂良、

何桂清为此先后上奏请求咸丰帝重新考虑。因此，直至谈判进行到最后阶段，桂良等才将公使驻京的问题提出。英国专使额尔金允诺英国公使可以暂不驻京，但要求能够定期进京，或是在有紧急需要时随时进京，同时英国保留以后两次提出公使驻京要求的权利；作为交换条件，桂良等须准许额尔金率英舰溯长江上驶至汉口进行勘察。桂良等对此表示同意。11 月 8 日和 24 日，清政府先与英国、美国，继与法国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

中英、中美、中法三个《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内容、文字基本相同，均为 10 款，后附《海关税则》。条约开列了禁止与限制进出口及进出口免税的货物种类，对 14 类 177 种进口货物和 12 类 174 种出口货物确定了新的关税额；未纳入《海关税则》的各种货物，规定仍按“值百抽五”税则征收，并规定所有进出口货物经由内地只纳“子口税”一次，税率 2.5%。新的海关税则主要有利于外国商人。比如当时中国生产而英国需求量很大的茶叶，订约前其“子口税”约达 100%，订约后猛跌至 2.5%，连同出口税合算只及英国政府所征收的茶叶进口税的 1/7。条约对原来一些不利于外国商人的限制的取消及长江对外国商船的开放、使外国商人得以从事中国国内贸易，这对中国的沙船运输业和中国商人的打击特别沉重。而关于“子口税”的规定，不仅使中国商人货物纳税远远高出外国商人，而且由于在实行中弊端百出，更将中国商人置于不利地位。条约第 10 款还规定聘请外人帮办税务，并将已被外国人把持的上海海关作为蓝本推行全国。自此中国海关全为外国人所把持，关税行政权被彻底断送。此外，条约还免除了外国商人纳税时应交的 1.2%的火耗银，并公然将鸦片列入税则，使鸦片贸易合法化。

总之，外国侵略者控制了中国海关，大大便利了资本主义各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当时海关税收是清政府的一项很重要的财政收入，也是此后清政府借外债和偿付赔款的重要抵押。外国侵略者控制了中国海关，也就等于掌握了清政府的经济命脉。

1860 年 10 月 13 日　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大肆烧杀劫掠

英法侵略者在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及《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以后，并不满足已经攫取的权益，极力想利用换约的机会进行新的勒索。另外，他们也明白，条约是在武力压迫下签订的，也只有在武力压迫下才能实行。1859 年 6 月，英法公使普鲁斯和布尔布隆相继到达上海。但他们拒绝清政府提出的在上海换约的要求，与先已到来的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北上到大沽口，准备进京换约。面对严重的军事威胁，清政府被迫妥协，但指定各国公使由北塘登陆进京，随行人员不得超过 20 人，也不准携带武器。英法凭借武力断然拒绝清政府的安排，坚持以舰队护送公使由白河经天津进京换约，重新挑起战争。

6 月 25 日，英国侵略军司令何伯率联军舰队突然袭击大沽炮台。守卫炮台的爱国官兵奋起还击。直隶总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亲自点燃巨炮，轰击敌舰。经过一昼夜激战，清军击沉击毁英法兵舰 10 余艘，打死打伤登陆的侵略军近 500 人，英军司令何伯负重伤。史荣椿等爱国官兵 36 人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激战中，美国舰队司令达底拿一再叫嚣“血浓于水”（意即同族亲于异族），指挥美舰帮助英法侵略军进攻。进攻失败后，又掩护英法军舰逃跑。

中国军队在大沽痛击侵略者，是保卫祖国的正义行动。可是，清政府在大沽保卫战胜利后，希望“安抚局面得以保全”，不仅不加强防御，反而下令撤除北塘防务，使英法公使登陆换约。英法资产阶级对联军在大沽口的惨败，深感震惊和恼怒，决心进行报复，并叫嚣要攻占北京。1860 年春，英法政府再次分别任命额尔金、葛罗为全权专使，率新组成的联军侵华。这支联军共有舰船 200 余艘，英军 l.8 万余人，法军 7000 余人，陆续开到中国。美国公使华若翰、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也赶到上海，仍以“调停人”身份配合英法行动，并从中取利。7 月，英法联军窜到大沽口外。清政府派直隶总督恒福与英法谈判。清军统帅僧格林沁集中兵力专守大沽，尽撤北塘防务。俄使伊格那提耶夫曾到北塘窥探，并把这些情报密告英法联军。8 月 1 日，英法联军 1 万多人兵分两路进攻新河与军粮城。驻防的中国蒙古族骑兵冒着猛烈的炮火，与侵略者展开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致使新河、军粮城失守。14 日，塘沽失守。英法军舰集结大沽口外，又从陆路攻打大沽炮台后面。大沽炮台守军腹背受敌，但仍英勇抗击敌人的进攻。咸丰帝面对危急形势，竟然谕令前敌主帅僧格林沁撤离海口力保京师。8 月 21 日，英法联军猛攻大沽口北岸炮台，守将直隶提督乐善率兵拼死抵御，全部牺牲，北岸炮台失守。原守南岸炮台的僧格林沁撤至通州，直隶总督恒福轻易地将南岸炮台放弃，大沽失陷。接着，侵略军又占领天津。咸丰帝急忙派桂良、恒福向英法侵略者求和。英法公使提出，除全部承认《天津条约》外，还要接受增加赔款、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等新的条款。清政府则坚持先退兵，后换约。英法侵略者并无意认真谈判，便于 9 月初中断谈判，决定自天津向北京大举进犯。咸丰帝命令僧格林沁率部防堵，并改派怡亲王载垣和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前往通州与英法侵略者议和。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中止。21 日，联军对通往北京的战略要地通州城西的八里桥发起进攻。广大爱国官兵奋力抵抗，但主帅僧格林沁却撤军逃跑，致使全军动摇，八里桥失守，北京危在旦夕。咸丰帝改派恭亲王奕䜣为钦差大臣负责向英法侵略者求和，而自己则于 22 日率后妃、皇子及一些王公大臣仓皇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京城内外 10 多万清军溃散十之八九，所余官兵皆无斗志。英法联军迅速进抵北京城下。这时，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又向联军提供了有关北京防务的情报，英法联军于 10 月 5 日，再次开始军事行动。联军由北京城东绕至城北，僧格林沁等所率清军不战自溃，联军进至海淀，在圆明园等处大肆烧掠。8 日，奕䜣的代表恒祺将巴夏礼等俘虏全部交还，但英法使节仍不签约，也不换文。10 日，联军照会北京清朝官员，提出将安定门交联军驻守，否则进攻北京，并限 13 日中午以前必须做出答复。10 月 13 门，恒祺带领清朝官员打开安定门，迎接英法侵略军入城。联军入城后，立即登上城楼挂起英法旗帜，在安定门城楼上及附近城墙架设大炮，炮口朝向城里，控制了北京城。

英法侵略军自北塘至北京所过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进入北京城后，英法侵略军不时下城闯入民宅，强行住宿，侮辱妇女。号啼之声，不绝于耳。英法专使额尔金、葛罗各带兵 1000 余人，分住，怡亲王府和冰盏胡同。侵略军或百十成群，或三五结伴，在街市横冲直撞，追逐妇女，杀害市民。英法联军撤出北京时，又从京郊大兴、宛平两县所备大车 300 余辆，满载劫掠赃物而去。

1860 年 10 月 18 日　英军火烧圆明园，犯下滔天罪行

英法侵略军攻占北京后，洗劫烧毁了世界文化艺术宝库——圆明园，对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犯下了滔天罪行。

圆明园，是个曾经驰名中外、举世无双的大型皇家园林。它位于北京西北郊，占地 5000 余亩，周长 20 华里。这里与西山峰峦接应，绿水青山，风景优美。圆明园的规模之宏大、园景之秀美、建筑之雄伟、陈设之富丽，在中外园林史上，都是屈指可数的。它集中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之精华，显示了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和伟大创造力，被世人誉为“万园之园”。

圆明园在明代就是园林荟萃之区，但在明清之际，这一带的园林大多废弃。清康熙年间，圆明园开始重新兴建。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中国正处于末代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清王朝才得以修建这座雄伟、瑰丽、豪华、多彩的大型皇家园林。

康熙皇帝在 6 次南巡时，就曾为南方优美的自然景色所陶醉，因此，从圆明园开始兴建时起，就力求带有南方湖光山色的特点。到了乾隆时期，经济更加发展，国库更加充盈，圆明园的建设规模也更大了。乾隆皇帝要把江南著名的园林建筑移植过来，于是浙江海宁的“安澜院”、苏州涉园的“狮子林”、江宁司藩署的“瞻园”、无锡惠山的“秦园”，以及杭州西湖的“曲院风荷”、“雷峰夕照”、“三潭映月”、“西峰秀色”等十景，都再现于圆明园。帝王后妃为了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园苑里生活得不寂寞，还在园内建起“买卖街”，制造出一种闹市景象。在一片中国园苑的林海中，还加入了一组西方风格的欧式宫殿——西洋楼，中西两种截然不同的建筑风格，在一个园苑里竟然结合得如此协调，这真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杰出创造。在圆明园里，还设有规模宏伟的图书馆、艺术馆和博物馆。不仅有选自全国各地的奇花异草、珍木古树，而且有反映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特色的金、银、铜、瓷、木等多种器皿；不仅有珍珠、玛瑙、珐琅、景泰兰等大钟、大瓶、大盆、大瓮以及各种工艺美术制品，还有各藩进贡的珍宝，各邦赠送的珍贵礼品。有人估计，当年的中、南、北三海内珍藏的宝物加在一起，也无法同圆明园中的珍宝相比。总之，圆明园是中国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其价值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

但是，这个举世无双的大型皇家园林，在 1860 年英法联军进占北京时，却被洗劫一空，而后又被付之一炬；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时再遭破坏，变成一片瓦砾废墟，它的遭遇就是近代中国历史命运的缩影。

1860 年 9 月下旬，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10 月 5 日，联军自北京东郊绕到北郊，开始了新的军事行动。10 月 6 日，联军占领海淀，到达圆明园附近。管理圆明园的大臣文丰在万般无奈中投福海自杀。当天，法国侵略者闯入了圆明园。他们发现园中每间屋子都装满了价值连城的物品，每间大厅都摆设着价值巨昂的瓶缸，每座库房都堆满了精美的绸缎和珍贵的毛皮，于是他们像野兽一般贪婪地饱掠而归。英军得知后，也于次日扑向这堆无价之宝，加入洗劫圆明园的行列。除了疯狂抢劫外，粗俗野蛮的联军士兵还撕毁珍贵的古籍并用来点火吸烟；用刺刀戮破墙上的名画；遇到珍贵而又难以携带的瓷器便用棒棍击毁，必至粉碎而后快。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给中国所造成的损失，曾在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笔下，作出了“我们教堂的所有财富加起来也无法和这一东方巨大的且又漂亮的博

物馆相比较”的断言。

10 月 18 日，联军司令部下令焚烧圆明园。顷刻间，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园林成为一片火海，无数珍贵文物、历史典籍，在烈焰中化为灰烬。侵略者记述当时焚烧的情景说：“顷刻功夫，几十处地方，都冒出一缕缕的浓烟密雾来，……”“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轮奂辉煌，举国仰为神圣庄严之物，和其中历代收藏，富有皇家风味，精美华丽、足资纪念的物品，都一齐付之一炬，化为劫灰了。……从今以往，数千百年为人所爱慕的崇构杰制，不复能触到人类的眼帘了。这些建筑，都是以表彰往日的技术和风格，惟一无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和它们比拟。你们曾经看过一次，就永远不能重睹……”。这就是世界上自称是最“文明”的人所干下的最残暴的毁灭人类优秀文化的罪恶勾当！侵略者还记述说：“一百码外就可以感到那种炎热的气息火声噼噼啪啪响着，足以使人震惊，随后，一声巨响，屋顶倒塌，真是惊心动魄。”“圆明园上空的烟雾笼罩了整个北京城，终日不散，就像有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即将来临。”“两日中，天光暗淡，就像日蚀一样。”英军焚烧圆明园的行动，一直持续到 19 日下午。在英军撤出圆明园之前，最后烧毁了正大光明殿。据 1873 年冬进行的查勘表明，圆明园 100 余景中，只剩下“杏花村”、“紫碧山房”、“庄严法界”等 13 景，其余近百景都化为一片焦土。与圆明园一起被焚毁的，还有圆明园附近的翰林园以及清漪园、静宜园、静明园。侵略者如此毁灭人类文化的罪行，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1860 年 10 月 24 日　列强逼签《北京条约》，我国大片领土沦丧

清王朝的钦差大臣奕䜣，按照咸丰皇帝的“委曲将就”的谕旨，于 1860 年 10 月 24 日，代表清政府分别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交换了中英《天津条约》文本并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除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外，又规定了以下几项主要内容：

一、开放天津为商埠，英国人到天津“居住贸易”，可享受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各种特权。

二、准许华工到英国或外洋各地做工。

三、中国将广东九龙司割让给英国，归英属香港界内。

四、赔偿英国兵费银增至 800 万两，赔款全部付清后，英军才能从大沽、登州、北海、广州等处撤退。

次日，清朝政府又与法国全权代表葛罗交换了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了中法《北京条约》。其主要内容除开放天津为商埠、赔款增至 800 万两之外，又规定了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教堂财产。充当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还偷偷在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上，加上准许“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

11 月，沙俄也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后，沙俄于 1858 年冬派伊格纳切夫出使中国，诱逼清政府签订新的割地条约。1859 年 6 月，伊格纳切夫到达北京，要求中国割让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领土。清政府大臣肃顺断然拒绝俄方的要求，表示中俄东段边界《尼布楚条约》早已明确划定，不应更改。于是，伊格纳切夫根据沙俄外交部训令，设法利用英法联军威胁清政府，造成有利于俄国的形势，借以从中渔利。1860

年 10 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趁清政府陷入困境之机，充任“调令”。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订立后，伊格纳切夫便以“调停”有“功”为名，威逼清政府答应俄国的全部侵略要求。扬言所提条款“一字不能更易”，只能签字画押，否则把英法联军召回北京。1860 年 11 月 14 日，奕䜣被迫与伊格纳切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俄两国东段边界，从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汇合处起，沿黑龙江顺流而下，到该江与乌苏里江汇流处，黑龙江以北之地归俄国，黑龙江以南到乌苏里江口之地归中国；从乌苏里江口往南至兴凯湖，顺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而行，河东之地归俄国，河西之地归中国；又从松阿察河河源跨兴凯湖到白棱河河口，沿着山脊到瑚布图河口，再从此沿珲春河及海之间诸山到图门江口，其东归俄国，其西归中国，两国边界线的终点，在图门江入海处以北 20 华里紧靠图们江的地方。上述划归俄国的地方，如遇有中国人居住之处和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旧渔猎”，留住原地。

二、中俄西段未经划定的边界，今后应顺山岭的走向、大河的流向和中国常驻卡伦（清代建立的军事哨所）路线而行，即从沙宾达巴哈界碑起，往西直到斋桑湖，再由此往西南到特穆尔淖尔（伊塞克湖），南到浩罕边界。

三、重申俄国人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并规定两国边民免税自由贸易，中国增开陆路商埠喀什噶尔，准许俄商在库伦、张家口零星贸易，俄国可在库伦、喀什噶尔等处增设领事等。

通过中俄《北京条约》，沙俄不仅迫使清政府事实上认可了它一直拒绝批准的中俄《瑷珲条约》，还吞并了《瑷珲条约》规定的所谓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约 4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把它擅自拟定的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强加给中国。此外，这个条约还使沙俄获得了更广泛的陆路通商特权，并得以进一步向中国蒙古地区和新疆南部扩张势力。

总之，通过《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英法美俄列强从中国掠取了更多的特权，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自此以后资本主义各国更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

1864 年 10 月 7 日　逼签《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又占我国大片领土

沙俄通过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不仅割占了中国东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而且强行规定了中俄西部边界走向，为其进一步侵略中国西北大片领土埋下伏笔。

1861 年 7 月，俄国公使巴留捷克与清廷总理衙门，商定两国“勘界”大臣，于次年在塔城开始谈判中国西北地区与俄接壤地段的边界问题。沙俄为了达到侵占中国西北边疆领土的目的，事先就进行密谋策划，并派员调查编制划分中俄边界的方案，确定边界走向，准备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辽阔的中国土地，连同伊塞克湖、阿拉湖在内，一概划归俄国所有。1862 年 1 月，俄皇亚历山大二世亲自主持特别会议，讨论通过俄国划界全权委员的训令草案（3 月经沙皇批准）。其中规定：“必须把中国常驻卡伦线作为划界的依据”，这就完全暴露出沙俄欲鲸吞中国大片国土的野心。因为当时沙俄虽侵占了中国巴尔喀什湖东南大片土地，但尚未占领斋桑湖、伊塞克湖及其周围地区，故其实际控制线尚远离中国常驻卡伦。沙俄“以常驻卡伦线划界”，就意味着它图谋将其“国界”向中国伊犁、塔城方向推进数百里以至千余里，

从而又要把一片幅员广大的中国土地划归俄有。

1862 年 8 月 3 日，中俄在塔城谈判中，中方代表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对俄方所提出的“以常驻卡伦线划界”的无理要求据理驳斥，致使谈判中断。沙俄利用当时陕甘两省爆发回民起义和新疆局势不稳的机会，于 1863 年 4 月中旬，陆续侵入塔城、斋桑湖、伊塞克湖、伊犁地区，并不断与中国守军发生武装冲突。到 8 月间，沙俄在中国西北边疆的军事挑衅急剧升级。清政府在俄方武力威逼之下，终于被迫妥协，接受了按沙俄提出的方案划界的要求。1864 年初，明谊在内有朝廷催逼，外有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不得已在俄方“议单”上签字画押。尽管如此，沙俄仍不断给清政府谈判代表施加压力，百般威胁。10 月 7 日，明谊等与俄方代表札哈罗夫、巴布科夫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同时在由俄方一手绘制的分界地图上签字画押。至此，历时 3 年之久的塔城“勘界”谈判才告结束。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共 10 条，主要内容为：

一、划分边界。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自沙宾达巴哈至“浩罕边界”为止的共同边界，将新界以西原属中国的大片土地划归俄国。

二、边境地区人民以往在何处住牧，仍留何处住牧；划界后，地面分在何国，其人民随地归为何国管辖。

三、换约后满 240 天，两国立界大臣会同议定界址，建立界碑。并拟定国界碑文，互换为凭。

四、立界后，位于新界俄国一侧的原有中国卡伦，应于一个月内迁往中国一侧；塔尔巴哈台所属巴克图卡外的农户，限 10 年内内迁；且强令中方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伊犁等地凡位于“边界”之外的驻兵卡伦，向内挪移。

此后，清政府又陆续与沙俄签订了《科布多界约》、《乌里雅苏台界约》、《塔尔巴哈台界约》，并派出官员按约记实勘分界。沙俄通过武力胁迫所签订的勘界议定书，不仅使此前由中俄《北京条约》第 2 款而割让给沙俄的中国西部领土再一次被确认，而且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东向南扩展，使沙俄鲸吞了中国西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 44 万余平方公里的领土。

1867 年 11 月 21 日　贻羞天下奇闻，洋人率“中国使团”出访欧美

在鸦片战争之前，当时的中国与西方国家没有外交往来，也未设专门从事外交事务的机构。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签订，五口通商，使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已不可免。但是，有关外交事务仍由五口通商大臣负责办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公使驻京，交涉事务日繁，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清政府设立了第一个专掌外交的机构，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奕䜣、桂良、文祥三人任大臣。但当时中国还没有正式向各国派出驻外使臣。1868 年清政府派的出访欧美各国“使团”，却是由美国人蒲安臣充当中国全权特使所率领的。

蒲安臣，1861 年至 1867 年任美国驻华公使，一向伪装对中国“友好”，主张外国支持清政府，因而博得奕䜣等人的好感和信任。1867 年底，蒲安臣卸任准备回国，行前到总理衙门辞行时，表示愿意为中国“出力”。清政府听信他的花言巧语，加上总税务司赫德对总理衙门的授意，终于决定聘请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1868 年 2 月，蒲安臣以“大清国钦

差大臣”的身份率领中国“使团”，出访了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欧美各国。这个中国“使团”由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翻译官柏卓安和海关法国官员德善充当左右“协理”。此外，随员还有中国的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

蒲安臣率“使团”出访前，奕䜣同他约定：凡于中国有损的事，必须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的事，不可马上应允，必须请示总理衙门复准，方可照行。蒲安臣到达美国后，不遵守总理衙门的训令，在华盛顿擅自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所谓《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这个条约共 8 款。主要内容有：

一、两国人民“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

二、两国侨民不得因信仰宗教的不同，受到“欺悔凌虐”、“屈抑苛待”。

三、两国人民可以互相往来留学，并在对方指定地点设立学堂。

这个条约使美国在招骗华工和扩大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等方面，得到合法依据。《中美续增条约》完全是为美国侵华服务的不平等条约。

此后，蒲安臣“使团”又先后到英国、法国、普鲁士、俄国等国访问，目的是说服英国等在修改中英《天津条约》时不要动用武力。按照中英《天津条约》的规定，10 年后双方对条约再行修订。1868 年 10 年期满，总理衙门担心英国利用修约乘机讹诈，十分惶恐。英国外交大臣时蒲安臣表示，如果英国在华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英国仍将使用武力。蒲安臣对此表示完全同意。法、普两国政府也做了类似的声明。1872 年 2 月，浦安臣在俄国访问时，病死于彼得堡。随行人员经意大利回国。所谓蒲安臣“使团”宣告解散。其结果，清政府希望通过蒲安臣游说西方列强在修约时不要动用武力的愿望落空，侵略者根本就拒绝做出这种保证。

外国派驻中国的外交官，一变而为受中国正式派遣，代表中国办理外交的使节，并与美国订立所谓《续增条约》，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也是清政府外交史上的一件丑闻。

1870 年 9 月 25 日　奴才媚外卖国，民众惨遭杀戮

鸦片战争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会和传教士就妄图用“十字架征服中国”。鸦片战争后，欧美的天主教、耶稣教和沙俄的东正教，依靠不平等条约和大炮的保护，先后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到 19 世纪末，已达 3300 多人。他们在中国建造教堂，网罗教徒，收集情报，干涉词讼，挑拨民族关系，进行文化侵略，并为本国政府窃夺中国利权出谋划策，起了侵略者的大炮所不能起的作用。中国人民对其极为痛恨，不断进行反抗。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反洋教的斗争便此起彼伏。1870 年，爆发了震动中外的天津教案，亦称“火烧望海楼事件”，或“火烧河楼教堂事件”。这是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最大的一次教案。

1870 年入夏以来，天津大旱异常，人心不定，加上各地教案传闻的流传，谣言四起。恰在此时，于 6 月 6 日，天津官府捉拿了迷拐幼童的匪徒张栓、郭拐，两人供认拐骗了幼童送到仁慈堂，修女付给了赏金。天津士绅和民众闻听后，群情大哗，纷纷上书府县官员要求严惩指使张、郭二人的主犯。同时，民众成群结队前往墓地察看，果然发现有腐烂尸体，胸腹皆烂，肠肚外泄，显然不属正常死亡，这就更加引起民众的警觉和愤慨。6 月 18 日，桃花

口地区居民捉拿了又一名迷拐幼童的罪犯武兰珍。此人供认受教民王三主使，也与教堂有关。在民众强烈要求下，第二天，天津道周家勋拿着受害家属的控告呈文到法国领事馆进行交涉，要求引渡拐犯王三。但法国领事丰大业态度蛮横，矢口否认。20 日，崇厚出面交涉，约定 21 日由府县押带武兰珍赴教堂查看对质。但教堂预先隐匿罪证，因此查无实据。当时教堂里的人出来对围观民众大打出手，双方发生冲突。丰大业要崇厚派兵弹压，并亲至通商署，对崇厚出言不逊，还拔枪向崇厚射击，子弹擦肩而过。随行人员将其家具什物毁坏以后，在丰大业的率领下扬长而去。途中，这伙人正遇押带犯人赴教堂查看的天津知县刘杰及随行家人，丰大业又举枪射击打死刘杰随行家人。丰大业的秘书也向人群开枪。众百姓忍无可忍，一拥而上将丰大业及其秘书殴毙。然后他们鸣锣召集各处民众，将领事馆和望海楼（昔日为皇帝行宫，后改为河楼教堂）的洋人杀死，放火焚毁教堂。傍晚，天津民众齐集东门外，焚毁仁慈堂，殴毙修女，救出幼童。途中又先后拆毁英、美教堂 4 所，在天津教案中，愤怒民众杀死教堂及孤儿院所雇佣的 34 名中国人、10 名修女、2 名神甫及丰大业和秘书、职员等法国人，其中也误伤了一些俄国商人。

教案发生后，西方列强乘机向中国政府捞取利益。6 月 22 日，俄、英、法、美、日等 7 国公使联衔照会清政府总理衙门，要求惩办天津教案有关人员。法国兵舰还驶进大沽，鸣炮示威。

在帝国主义军事、外交的压力下，清政府屈膝妥协，于 6 月 23 日，派曾国藩赴天津办理教案。曾国藩屈服于列强的讹诈要求，答应严惩“办理下善”的官员，查拿惩办凶手。25 日，崇厚、周家勋、张光藻、刘杰等被交刑部议处，严议革职。28 日，崇厚被派去向法国赔礼道歉。

但是，法国侵略者毫不满足，仍无理纠缠。7 月 17 日，法国署理公使罗淑亚来天津面晤曾国藩，扬言如不将天津府、县官及提督陈国瑞正法，法国将采取行动。随即法国兵舰驶入海河，并以撤退在华法人相威胁。吓破了胆的清政府，便于 9 月 25 日匆匆做出了令人痛心而耻辱的判决：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发配黑龙江；判处无辜民众 15 人死刑，21 人流军。接着，又判处无辜民众 5 人死刑，4 人发配。后又杀害无辜百姓 20 人，并决定赔偿法国财产“损失”银 21 万两，抚恤银 25 万两（包括英、意、比人恤银），赔偿俄人恤银 3 万两，才算了结此案。

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反侵略斗争，就这样被反动卖国的清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1871 年 7 月 14 日　沙俄侵占伊犁，逼签《伊犁条约》

沙俄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吞并我国西部 44 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后，还企图进一步侵吞我国新疆。60 年代中期，新疆爆发了各少数民族的反清起义。沙俄认为有机可乘，便立即开始了新的扩张活动。除了图谋控制南疆外，还计划对伊犁地区和乌鲁木齐实行军事占领。而伊犁地区就成为它首先猎取的侵略目标。1871 年初，沙俄政府连续召开特别会议，做出了强占伊犁的决定。5 月，俄国侵略军兵分两路，开始向伊犁进犯。虽伊犁地区各族人民英勇抵抗，但俄军还是先后占领了绥定、惠宁、宁远（今伊宁市）等城，伊犁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归于失败。7 月 14 日，伊犁被俄军

占领并由此向周边渗透。当时沙俄曾向清政府表示：因“中国回乱未清，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实则是它估计清政府永远无法收复新疆，这样做会使伊犁永远旧俄国所有。俄军占领伊犁后，废弃了原伊犁割据政权，直接对当地十几万居民实行野蛮的军事殖民统治及残酷的经济掠夺。

清政府一直十分关注收复伊犁的问题，9 月 l 日，命署理伊犁将军荣全速从乌里雅苏台前往伊犁，同俄方商谈交还伊犁的问题。但俄方百般推托、阻挠，直到 1872 年 5 目中旬，中俄代表才在塔城西北举行谈判。俄方代表不但避而不谈交还伊犁问题，反而节外生枝提出许多无理要求，致使谈判破裂。沙俄企图永远霸占伊犁的野心显而易见。

1876 年，清政府命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很快就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北疆所有国土。次年，又向南疆挺进，不久便摧毁了浩罕汗国的阿古柏侵入南疆建立的伪“哲德沙尔国”反动政权。到 1878 年初，便收复了南疆。至此，除伊犁地区尚被沙俄占领外，新疆全部收复。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完全符合中华民族利益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愿望。

在这个形势下，清政府于 1878 年派出使俄国大臣崇厚赴俄交涉归还伊犁。次年 10 月 2 日，崇厚在沙俄胁迫下，在克里米亚半岛里瓦几亚擅自与沙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主要内容有：伊犁归还中国，但伊犁以南的特克斯河流域及斋桑湖以东的土地割给俄国；允许沙俄在蒙古及新疆免税贸易，增辟两条到津、汉的陆路商路；允许沙俄在嘉峪关等七地设领事馆；中国赔偿兵费 500 万卢布。在国内外反对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拒绝批准这个条约并将崇厚革职问罪，改派出使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公使，赴俄谈判改约。曾纪泽以“待凭口舌巩河山”的爱国精神，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等据理力争，反复辩论。经过半年多艰苦交涉，1881 年 2 月 24 日，曾纪泽与俄方代表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虽争回一部分主权，但签订的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破坏了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条约主要内容为：

一、中国收回伊犁，部分取消原约的割地规定。

二、只许俄国在嘉峪关、吐鲁番设领事馆。

三、俄商在蒙古等地贸易改免税为“暂不纳税”。

四、沙俄割占霍尔果斯河以西及斋桑湖以东 1 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上。通过此约及以后的勘界议定，总共有 7 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俄国。

五、“兵费”由原来赔偿 500 万卢布增为赔偿 900 万卢布。

1874 年 10 月 31 日　日本入侵台湾，逼签《北京专约》

伴随着沙俄对我国西北边疆的大肆进犯，日本和美国也对我国东南边疆联合发起了进攻。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了资本主义列强对我国边疆侵略的新危机。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本岛、澎湖列岛以及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若干附属岛屿，历来就是中国人民休养生息，开垦种植的地方。那里物产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因此，中国富饶的宝岛台湾很早以来就为列强所觊觎。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就企图攻占台湾，但未得逞。此后，美国两次派军舰驶往台湾进行调查。一些美国的军政官员甚至提出占领台湾的行动计划，只是因为力所不及才没有付诸实施。1867 年，美国终于抑制不住侵

略野心，借口其“罗佛”号船水手被台湾高山族人杀害，派海军陆战队进犯台湾。当地高山族人民击退了美军的进犯。此后，美国转而与日本勾结共同策划侵台。

日本原先是一个封建领主割据、闭关自守的国家。1868 年，新兴的日本资产阶级联合一批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方军用发动了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明治维新”，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力图向外扩张。1871 年，琉球岛的渔船遇风飘流到台湾，与当地高山族居民发生冲突，50 多人被劫杀。日本企图利用这一事件吞并琉球，侵略台湾，便于 1873 年派代表到北京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交涉。总理衙门回答说：二岛均属中国，理应由中国裁决，与日本无关。日使无言以对，但却否认高山族居住的台湾东部地区在中国版图之内，蓄谋以武力侵占。

1874 年 5 月，日本出兵 3000 人入侵台湾。当时日本的实力有限，之所以敢于贸然用兵，主要是认为清政府软弱可欺；此外也是因为得到美国的怂恿和支持。美国向日本提供军火船只，指派军官在侵台日军中任职。日本侵略军在琅■（今恒春）港口登陆后，被我高山族人民击败，被迫退踞龟山。接着，日本在台湾设都督府，修桥筑路，妄图永占台湾。清政府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海陆军增援台湾，全面布防，兵力远胜日军。日本进退维谷，转而谋求通过外交讹诈达到侵略目的。美、英、法三国公使也出面“调停”，诱迫清政府妥协。1874 年 10 月 31 日，恭亲王奕䜣与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在北京签订《北京专条》（又称《北京专约》，或《台事专约》），另附“会议凭单”1 件。

《北京专条》共 3 条，连同“会议凭单”的主要内容是：

一、日本从台湾撤兵。

二、中国赔偿抚恤银 10 万两；赔偿日本在台湾修道、建房等银 40 万两。

三、中国承认台湾高山族“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加杀害”，日本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日本后来以此为据，在 1875 年迫使琉球与中国断绝传统的“藩属”、“宗主”关系。在清政府与日本进行交涉时，李鸿章等人一再忍辱妥协，使“琉球事件”不了了之。1879 年，日本武力吞并琉球，将其改为冲绳县。清政府曾向日本提出抗议，进行交涉，但没采取强硬措施，从而琉球成为日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军事基地，使台湾的处境也变得更加危险了。

1876 年 9 月 13 日　英国逼签《烟台条约》，列强侵华再升一级

英国自 19 世纪 50 年代占领了缅甸以后，就开始寻找经缅甸直接进入中国云南的道路。1858 年，一个英国侵缅退伍军官，提出由缅甸仰光修筑铁路直通云南思茅的计划。1863 年和 1868 年，英国侵略者先后派出“勘探队”探测进入云南的路线，一度到达云南腾越（今腾冲）。1874 年，英国又组织了一支新的探路队，由陆军上校柏郎率领，企图探测从缅甸曼德勒经八莫至云南的通路。英国驻华使馆派翻译官马嘉理从北京经云南入缅接应。1875 年 l 月，马嘉理在缅甸八莫与柏郎会合。2 月初，马嘉理在事先没有通知中国当局的情况下，便带领探路队连同护送的士兵近 200 人，由缅甸向中国边境进发。这支探路队行至云南腾越西南的蛮允山寨时，被景颇族人民发现，力阻其通过。21 日，马嘉理开枪打死我民众多名。当地人民义愤填膺，进行自卫，

杀死马嘉理等 6 人。与此同时，景颇、傣、汉等族人民还在班西山下阻击柏郎率领的“勘探队”侵略者，把他们逐回缅甸。

“马嘉理事件”发生后，英国借机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新的侵略要求。英国公使威妥玛一再故作姿态，以绝交、用兵相威胁。并与俄国公使密商，图谋分别向云南、伊犁进兵。清政府在英方的恫吓下，一再退让，捕杀了十几名被诬为所谓“凶手”的中国民众，还答应赔偿巨款。可是，英国侵略者仍不满意。李鸿章在事件发生之初，认为马嘉理带着武装入境，“不独有违条约，亦显悖万国公法”；但一经英国侵略强盗恫吓，马上向英国屈服。经过一年半的交涉，清政府最后被迫接受了英国的全部要求。1876 年 9 月 13 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英国公使威妥玛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也称《滇案条约》，又称《中英会议条款》，共 3 端 16 款，另议专条 1 款。主要内容是：

一、自 1877 年起以 5 年为限，英国得派员到云南大理府或其他相宜地方一处驻寓，察看通商情形，商订“滇缅边界及通商章程。”

二、清政府“赔偿”滇案及 1876 年以前中英间各案共计关平银 20 万两，并派大臣赴英“谢罪”。

三、清政府增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 4 处为通商口岸，开放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 6 处为轮船停泊码头，上下客货；英国可派员驻寓重庆，查看四川省的英国商务情形。

四、洋货在各口租界内免收厘金，没有租界的口岸应划定租界。洋货进入内地，不论华商洋商，都只纳子口税，全免各项内地税。

五、中国内地各省地方或通商口岸发生“有关系英人命盗案件”时，英国使馆可“派员前往该处观审”；中国各口中英两国臣民间的诉讼案件，应由被告所属国官员按其本国法律承审，原告所属国官员可往观审，“倘观审之员以为办理未妥，可以逐细辩论。

六、英国使馆派员从北京经甘肃、青海或经四川前往西藏，转赴印度，或者由印度入西藏，探访路程，中国均应发给护照，令驻藏大臣派员照料。

《烟台条约》签订后，清政府立即批准并派郭嵩焘去英国“道歉”。后郭成为驻英公使，是中国所派遣的常驻外国的第一位使臣。但英国迟迟不批准这个条约。中英双方“又经过多次谈判，终于在 1885 年 7 月，订立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鸦片进口每百斤征收税厘共 110 两，全国划一。直到这时，英国政府才将续约专条与《烟台条约》一并批准。

中英《烟台条约》是续《南京条约》、《北京条约》之后的又一个严重丧权辱国的条约。通过这个条约，英国取得了更多的通商特权利领事裁判权及侵入我国云南、西藏的便利条件。其他资本去义国家，也利用“一体均沾”的片面最惠国条款扩大其侵华权益。所以，资本主义侵略者把这个条约说成是“中国的国际关系之第三阶段，其重要性，仅次于 1842 年 1858 年的条约”。危害性之大，由此可知。

1883 年 12 月 14 日　边疆狼烟四起，法国挑起对华战争

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过渡的阶段。资本主义列强加紧掀起抢夺殖民地、分割世界领土的高潮，而地域辽阔、国力衰弱的中国就成为列强争夺的主要目标。在七八十年代，中

国的东南、西南和西北边疆狼烟四起，几乎同时发生外国侵略的危机。在这次中国边疆发生的危机中，法国在 1883 年发动的侵略越南和中国的中法战争，就是这次资本主义列强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19 世纪最后 30 年中，法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北部的煤矿工业和纺织工业逐渐形成了垄断联合企业，增强了财政资本的作用。法国大资产阶级积极向海外殖民扩张，目标指向地处远东的越南和中国。

19 世纪 50 年代，法国曾经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侵入越南，被越南军民击退。1862 年法国进攻南圻（越南南部），逼签不平等条约。在随后的几年里，逐渐侵占了南圻诸省。1873 年，法国又向北进犯，攻陷河内、海阳、宁平、南定四省。越南政府无力遏止法国的侵略，遂邀请在中越边境活动的刘永福的黑旗军协助抗法。

黑旗军原为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广西天地会的一支起义军，因为用七星黑旗作战旗，所以被称为黑旗军。太平天国失败后，迫于清军的围剿，刘永福率部于 1867 年退至滇越边界，开山辟林，聚众耕种。在接到越南政府的邀请后，刘永福为支援越南抵抗侵略的斗争，捍卫祖国边疆安全，立即率千余人加入越南人民抗法斗争的行列。1873 年 12 月，黑旗军在河内城郊配合越南军队痛击法国侵略者，击毙法军统帅安邺，歼敌数百。将法军赶出红河，收复了河内。法军被迫退守海防。此后十余年，黑旗军与越南人民为抵抗侵略，一直团结战斗在红河两岸。

80 年代后，法国金融资本获得迅速发展。为了给大量的“过剩”资本寻找投资场所，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推行更积极的对外扩张殖民地的政策。1880 年，血腥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大资产阶级代理人茹费里出任内阁总理。他随即增兵越南，并策划侵略中国。

1882 年 4 月，法军再次占领河内。黑旗军与越南军民协同作战，在 1883 年 5 月河内城西纸桥一仗中大获全胜，刘永福因这一战功被越南政府封为三宣正提督。法军在北越虽然受挫，但对越南中部的进攻却得逞了。同年 8 月，一支法军直逼越南首都顺化，越南被迫与法国订立不平等的《顺化条约》，法国取得对越南的“保护权”。

1881 年至 1882 年，法国侵略越南日趋严重时，清政府曾应越南政府请求，以剿匪为名，陆续派兵进入北圻。法国占领越南首都顺化后，便把矛头指向中国，一面命令侵越法军向北进犯，一面要挟清政府撤退在越南北部的军队，召回刘永福，开放云南边界。中法矛盾日益尖锐。

面对法国将进一步侵略中国的严重局势。把持清政府外交实权的李鸿章主张妥协求和，以保和局；左宗棠、张之洞、曾纪泽等坚决主张与之一战。清廷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做些抗法的准备，调左宗棠为两广总督，并命令照常接济黑旗军。但同时又企图谋求与法国妥协，仍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侵略者在天津进行和谈，并乞求英、美出面“调停”。但法国已决定诉诸武力，实现以越南为跳板，侵入中国云南等省的既定侵略方针。

1883 年 12 月 11 日，法国远征军新任总司令孤拔率领法军 6000 人，分成水陆两队，从河内出发向中国军队驻守的北圻山西地区进犯，中法战争爆发。12 月 14 日，法国侵略军在舰炮掩护下，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歼敌近 1000 人，给侵略者以沉痛打击。但终因伤亡过重，又孤立无援，被迫弃城而走，山西城失陷。次年 3 月，法军又调 1.2 万人分水陆两队向北宁进攻，清军全线溃散，退往太原方向。不久，太原、兴化、临洮、

宣光等北圻要地先后被法军攻占，清军余部退守谅山、镇南关（今友谊关）一带，法军逼近中越边界。

前线败报传来，清政府大为震动。慈禧将战败责任全部推给奕䜣等人，撤换了所有军机大臣，以自己的妹夫奕䜣会商军机要政，又命奕䜣主持总理衙门。然而新的军机处仍然执行妥协退让政策。1884 年 5 月，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进行和谈，订立《中法简明条约》，内容包括承认法国保护越南，中越边境通商，中国从越南退兵等。6 月，法军前往“接收”谅山，首先攻击清军。驻防清军被迫自卫，在北黎（中国当时称观音桥）大败法军。法军便以北黎冲突为借口，准备从海路大举进攻中国，矛头指向台湾和福州，将战火由越南烧到中国境内，中国再一次遭受侵略军的战火焚掠。

1884 年 8 月 23 日　法舰强入马江，福建水师覆没

1884 年 6 月 23 日“北黎冲突”发生后，法国蓄谋将战火燃烧到中国东南沿海，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遂命其远东舰队司令孤拔中将率主力舰艇 10 艘，兵力 1700 余人，于 1884 年 7 月 14 日集结于福州闽江口。佯言进马尾（义称“马江”）港“游历”，提出入泊马江的要求，以便伺机寻衅，挑起新的战火。

清政府钦差会办福建海疆大臣张佩纶、闽浙总督何景、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等，根据清政府“切勿生衅”、“静以待之”的指令，非但不对法国舰队阻拦，反而给予友好款待。同时还命令福建水师各船舰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8 月中旬，法国远东舰队闯入闽江口内，上驶至福建水师集泊场下游的水面抛锚，将福建水师锚泊的全部舰只完全控制在其舰炮火力范围之内，形势十分危急。

8 月 16 日，法国向清政府下最后通碟，限 48 小时内，接受法国提出的赔款 8000 万法郎的条件，否则将采取一切行动。同时命令孤拔，若清政府拒绝要求，立即行动。孤拔当即进行作战布署，决定次日午后趁退潮时福建水师舰只尾部面对法军舰只时开战。23 日上午 8 时，法驻福州副领事向闽浙总督何景递交最后通碟，限令福建水师下午撤出马尾、否则开战。福州船政大臣何如璋竟不告知福建水师官兵这一紧急情况，并乞求法方延至 24 日再开战。

然而，就在 23 日午后 1 时 56 分，法军舰队突然猛烈炮轰福建水师。事起仓促，福建水师备战不及，被迫应战。虽然爱国官兵及未经征战的水师学堂管驾学生，奋勇抵抗，但终因实力悬殊，且又战在肘腋，无余地回旋，而损失惨重。激烈的舰炮对射战仅进行约半小时，停泊在马江的福建水帅 11 艘船舰就全部被击沉，19 艘商船亦被击毁，700 余名爱国将士血染马江，马尾军港落入敌手。24 日上午，法舰乘潮上驶至福州船政局造船厂附近，用重 28 公斤的榴弹猛轰船厂，击毁船厂后又大肆炮击马江附近的中国民船和闽安炮台。26 日，清政府被迫下诏宣战。27 日，法军舰队转向下驶，沿途逐次轰击闽江两岸的清军炮台，将这些炮台全部击毁。30 日，耀武扬威的法国舰队以“胜利者”的姿态全部驶出闽江口。

马江之战之所以失败得如此惨重，其主要原因在于清廷极端昏庸，福建军政当局的官僚缺少应变能力，一味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方针，严重束缚了前线将士的手脚，在敌寇已登堂入室的情况下，竟不许将士们做自卫的

准备。其结果，清政府苦心经营的福建水师连同福建海防，就这样在“切勿生衅”、“静以待之”的退让下被葬送了。

1885 年 6 月 9 日　清政府胜而乞和，签订《中法新约》

1885 年 2 月，清政府鉴于广西关外迭次失利的现实，命冯子材帮办广西关外军务。冯子材在当地各族人民高昂斗志的鼓舞下，团结各军将士，大力整顿溃军，认真做好战备。3 月，冯子材率领清军粉碎了法军的进攻，一举取得闻名中外的镇南关——谅山大捷，扭转了中法战争的整个战局。法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巴黎以后，法国朝野震动，政局动荡。在人民抗议、议会质询下，茹费理内阁被迫下台，法国面临军事、政治交困的严重局面。而中国军队已完全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形势对中国十分有利，冯子材等约会西路滇军，作好了进攻北宁、河内的准备。越南广大人民愿积极配合清军，同时约定在西贡内应，决心把法军赶出越南。就在这时，昏庸的清政府却做出停战撤兵的荒唐决策。在下令清军停止战斗撤出越境的同时，又派出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与法国进行停战谈判。6 月 9 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虽取得战争胜利又屈辱求和的不平等条约——《中法新约》。亦称《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或《越南条款》，全文共 10 款，其主要内容有：

一、中国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

二、自订约起，限 6 个月内由中法两国派员会同勘定中国和北圻的界限。

三、在中越边界上指定两处为通商处所：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允许法国商人在此居住，并设领事。

四、中国云南、广西同越南边界的进出口货物，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

五、法国可在北圻建造铁路。日后中国修造铁路时，应与法国商办。

六、法军立即退出台湾、澎湖。

法国通过《中法新约》夺取了整个越南，变越南为其殖民地，并且实现了以越南为跳板将其势力渗入中国云南、广西等省的战略企图。从此，我国西南边疆的国门被打开了一个缺口，西南边疆的危机进一步加剧。

1887 年 3 月 26 日　中葡签订《里斯本议定书》，完全丧失澳门领土主权

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的可耻结局，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更加看清了清政府腐败软弱的本质从而大大助长了其侵略中国的野心。不但各大国加强了对中国的争夺，一些小国在大国的怂恿下，也乘机渔利。

葡萄牙是西欧一个较小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它又是一个老资格的殖民国家。早在我国明朝末年，它就强行占据了中国澳门。到 19 世纪 80 年代，澳门已变成殖民主义者偷漏税课、拐骗人口、作奸犯科、招纳亡命徒的场所。在 80 年代初，中俄、中法关系日趋紧张，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就企图乘清政府的困窘情状，施加外交压力，图谋正式攫取中国在澳门的主权，但一直未能得逞。中法战争后，中国政局动乱，人民怨声载道，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认为这是其实现上述侵华目的的好机会，于是在英国的支持下，加紧独占澳门的

侵略步伐。

根据 1885 年 7 月中英签订的《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有关规定，中英双方应尽快派员查禁从香港往中国偷漏税款的鸦片走私事件。为此，1886 年 2 月 13 日，清政府派道员邵友濂、总税务司赫德与英国代表商订洋药（鸦片）新章。港英当局却提出此类办法须香港、澳门同样接受，否则香港不能应允。1887 年总税务司赫德受命派金登幹代表清政府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与葡方代表进行谈判。3 月 26 日，金登幹与葡萄牙外部大臣巴罗果美在里斯本共同炮制出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中葡《会议草约》，又称《会议节录》或《里斯本议定书》。其主要内容为：

一、中国允准葡国永驻和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

二、葡国未经中国同意，不得将澳地让与他国。

三、洋药（鸦片）税征事宜，葡国按照英国在香港实施办法，在澳类推办理。

清政府在英国侵略者讹诈下，为了征收鸦片税，竟任洋人摆布，拱手将澳门的领土主权出卖给欧洲弹丸小国葡萄牙。

葡萄牙进而得陇望蜀，在同年 12 月 1 日又逼迫清政府在北京与其签订了中葡《友好通商条约》，亦称中葡《北京条约》。通过这个条约，葡萄牙不仅再一次迫使中国承认其永驻、管理澳门及属澳之地的权利，而且还借应允协助清政府征收从澳门出口运往中国之鸦片的税厘的机会，获取了其他列强已经获取的税则、领事裁判权、传教权、通商口岸居住权等多种侵华权益，跻身于瓜分蚕食中国主权的帝国主义国家行列。

1890 年 3 月 17 日　英军入侵西藏，逼签《藏印条约》

英国侵略者早就企图侵占我国西藏，并想由西藏侵入中国西南广大地区。1876 年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曾作出允许英国派员进入西藏的规定，据此英国开始作好侵入西藏的准备。1886 年，英印孟加拉财政厅长马科蕾组成入藏“考察团”，并配有一支 300 多名士兵的护卫队，待命出发。清政府得知后，生怕当地人民与英国“考察团”造成武力对抗的局面，因此请求英国侵略者放弃马科蕾“考察团”进入西藏的计划，并以立即承认英国吞并缅甸作为交换条件。但中英《缅甸条款》签订不久，它便另找借口，以实现其侵略西藏的目的。后来，当马科蕾“考察团”准备入藏时，西藏地方政府派兵在与哲孟雄（今锡金）交界处的隆吐山设防。英国硬说藏兵越界戍守，要挟清政府下令将其撤走，否则将“调兵驱逐”。1888 年 3 月，英国出动一支 2000 多人的军队进入西藏，藏民抵抗失利。清政府一面下令撤退前线军队，一面派驻藏大臣升泰与英国代表谈判。1890 年 3 月 17 日，升泰代表清政府在加尔各答与英属印度总督兰斯顿签订了《藏印条约》。

《藏印条约》有汉、英两个文本，全约共 8 款，主要内容如下：

一、规定哲孟雄由英国一国保护管理，其内政外交专由英国一国经办，其官员除由英国经理准行之事外，概不得与它国交涉往来。

二、划定中国西藏与哲孟雄边界。

三、对于游牧、通商等问题留待以后再议。

1893 年 12 月 5 日，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藏印续约》，又称《藏印条款》，作为《藏印条约》的附加条款。该约共 12 款，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从 1894 年 5 月 1 日起，开放亚东为商埠；允许英国商人在亚东自由贸易，租赁住房、栈所；英印政府可在亚东另设公所，派员驻扎。

二、亚东自开放之日起，5 年内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间的贸易一概免纳进、出口税；5 年限满后，再查看情形，或可由两国酌定税则，按规定缴纳进、出口税。

三、自亚东开放之日起 1 年后，西藏居民仍在哲孟雄游牧者，应照英国在哲孟雄随时立定游牧章程办理。

英国通过《藏印条约》、《藏印续约》的订立，使哲孟雄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并实现了从西藏地区打开中国西南大门的侵略目的。

1894 年 7 月 25 日　日舰突袭清军，发动甲午战争

日本自经过明治维新以后，建立起以明治天皇为头子的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迅速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日本的资本主义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国内封建势力大量存在，广大农民生活十分贫困，无力购买工业品，使其国内市场非常狭小。同时，日本又是以经营军事工业为主导来带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这种封建性、军事性的特点，决定了它对外具有强烈的掠夺性、扩张性。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便确立了对外侵略的政策，提出要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制定了征服中国和世界的大陆政策。按照这一政策，日本计划第一期征服我国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我国东北，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就在美国支持下不断对朝鲜进行渗透。1875 年 9 月，日本军舰开炮轰毁朝鲜江华岛炮台，制造了“江华岛事件”。次年，日本以这一事件为借口，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江华条约》，获得在朝鲜自由通商权及领事裁判权。1882 年，日本又趁朝鲜发生兵变的机会，胁迫朝鲜签订了《仁川条约》，取得在朝鲜驻兵的特权。1885 年，中日两国在天津举行谈判，签订了《天津会议专约》，规定将来朝鲜遇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如一国要派兵，必须互相通知。后来，日本就是利用这一条约出兵朝鲜，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的。

1887 年，日本制订了《征讨清国策》，提出以 5 年为期，作好侵华准备。日本的侵华政策确立以后，一直等待时机，寻找借口。1894 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的统治者无力镇压这次起义，请求清政府派兵支援。日本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大好时机，一面竭力怂恿清政府出兵，诡称日本政府“必无他意”；一面秘密下达动员令，准备挑起一事端，发动战争。清政府不知中了日本设下的圈套，于 6 月 5 日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淮军 1500 人开赴朝鲜，驻守在汉城以南的牙山。日本眼见阴谋得逞，遂以保护使馆、侨民为借口派大量军队进入朝鲜，控制了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军事要地，并于 6 月 10 日占领了汉城。随后，日军源源不断地开入朝鲜，总兵力达 1 万余人。清政府看到朝鲜内部局势已趋平稳，建议中日双方同时撤兵，但却遭到日本的无理拒绝。日本军国主义恣意挑起战争的凶恶面目暴露无遗。

面对日本的侵略汹势，国内舆论强烈要求清政府备战，以防后患。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帝（光绪）后（慈禧）两党的矛盾出现主战和主和的争论。帝党主张对日作战，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势力；后党为保存实力，力主避战求和。在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支持下，李鸿章往来于英、

俄等国之间，乞求列强从中斡旋。但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争夺中国问题上虽有互相争夺的一面，也有互相勾结的一面，李鸿章乞求列强出面“调停”的幻想，最终破灭。于是他又死抱着“避战自保”的幻想不放，甚至认为日本不会先我而动，还天真地说：“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清政府的畏缩忍让，大大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7 月 22 日，日军攻占了朝鲜王宫，劫持国王，组建傀儡政权。7 月 25 日，日本迫使朝鲜大院君傀儡政府宣布“授权”日军驱逐在朝的中国军队。就在同一天，日本不宣而战，分两路向驻守牙山的中国军队及牙山口外丰岛海面的中国兵舰发动了突然袭击，挑起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这一年是中由农历的甲午年，故史称“甲午战争”）。

在这一天，我国“济远”、“广乙”两舰从牙山出发，驶往旅顺，途经丰岛海面时，遭到日本 3 艘快速舰的拦截和围攻。“广乙”舰在躲避日舰追击时触礁而毁，死伤 70 余人；“济远”舰在遇日舰后，管带方伯谦挂出白旗示降，然后转舵回逃。舰上的爱国士兵不堪受辱，奋起抵抗，以尾炮击伤敌舰，摆脱了追击。这时，正有运兵船“高升”号及 1 艘护航舰“操江”号从天津行驶至此，日舰以强压弱，俘获了“操江”号，强迫“高升”号中国官兵投降。中国将士宁死不屈，进行自卫。日舰开炮射击，“高升”号上的 1100 名官兵除 250 人死里逃生外，其余全部遇难。日本在海上发动偷袭的同时，又派陆军向驻守牙山的清军发起进攻。聂士成率部与日军激战，而主将叶志超竟弃守逃往平壤，牙山失守。

在遭到日军突然袭击之后，清政府被迫应战，8 月 l 日，中日双方同时宣战。

1894 年 9 月 17 日　中日舰队激战黄海，我国丧失黄海制海权

中日两国宣战后，日本联合舰队按照日本大本营的命令，采取进攻态势，积极寻机与北洋舰队主力决战，企图击败中国海军，完全夺取黄海制海权，以掩护和支援陆军的地面作战行动。这时，中国北洋舰队在李鸿章的所谓“保船制敌”方针指导下，只在渤海内外游弋，陷入了消极自保的被动局面。1894 年 9 月上旬，平壤战役爆发，清政府决定调兵增援。派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定远”号等 12 艘军舰和 4 艘鱼雷舰护送招商局 5 艘轮船，装运驻防大连的刘盛休的铭军 12 营共 6000 人，由海道至大东沟，然后转由陆路入朝，增援驻守平壤的清军。美国人把这一军事行动透露于日本。9 月 16 日，在北洋舰队护卫下，铭军搭乘轮船由大连出发，于当晚在大东沟安全登陆。日军实际已于前一天夜里攻陷了平壤，并开始实施进攻中国的战争准备。而且，此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正在海面搜索北洋舰队，企图全歼北洋海军，以取得黄海、渤海的制海权，确保对中国陆军作战的顺利进行。当伊东祐亨得知北洋海军出动的消息后，遂命令第一游击队的“吉野”、“秋津洲”、“浪速”、“高千穗”等舰为先锋队，由海军上将坪井航三指挥：“松岛”、“岩岛”、“千代田”、“桥立”、“比睿”、“扶桑”、“赤城”、“西京丸”等 8 艘舰组成的本队则以伊东祐亨乘坐的“松岛”号为总队旗舰，出海寻找战机。

9 月 17 日晨，北洋舰队正准备起锚返航。伊东祐亨率日舰忽然于 10 时 30 分出现在北洋舰队附近海面。丁汝昌闻报立即下令迎战。中午 12 时 50 分，北洋海军“定远”舰首先发炮，打响了黄海战役第一炮。日舰利用速度快、

炮位多的优势，避开北洋舰队“定远”、“镇远”两主力舰的正面炮火，绕向北洋舰队侧后，以左右舷炮轰击两翼小舰，并集中火力攻击我旗舰“定远”号。战斗一开始，旗舰“定远”号一发炮就震塌了飞桥，正在台上督战的丁汝昌坠落甲板摔伤，信号旗语装置被日舰炮火击毁，舰队指挥失灵，造成北洋舰队阵形混乱，陷于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丁汝昌虽伤却不下火线，坚持指挥旗舰“定远”号炮击敌舰。北洋舰队官兵英勇战斗，奋不顾身，重创日舰“比睿”、“赤城”、“西京丸”号，击毙“赤城”号舰长坂元八太郎，而且还不同程度地击伤“吉野”、“浪速”、“松岛”、“高千穗”、“秋津洲”等日舰。

到下午 2 时左右，北洋舰队遭到日舰本队与第一游击队的夹击，除“定远”、“镇远”舰能相互策应外，其余各舰被分割异处。“致远”号在激战中多处受创，舰身倾斜，弹药将尽。管带邓世昌见日舰“吉野”号十分猖狂，毅然下令开足马力向前猛冲，准备用冲角撞击“吉野”，与敌同归于尽。不幸中雷沉没，全舰 250 名官兵除 7 人遇救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经远”号也被敌鱼雷击沉，管带林永升及手下 200 多名官兵大都壮烈牺牲。当“致远”、“经远”与敌激战时，“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和“广甲”号管带吴敬荣却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济远”号在逃跑时还误将“扬威”号撞沉；“广甲”号在大连湾三山岛外搁浅，被敌击沉。“靖远”号、“来远”号因中弹过多，被迫退出战斗。“定远”、“镇远”两舰分别在总兵刘步蟾、林泰曾指挥下，保持相互依恃的阵形，虽中弹多处，仍继续奋战。下午 3 时半，日旗舰“松岛”号被“镇远”号巨炮击中，甲板上炸药爆炸，官兵死伤 100 多人。不久，“靖远”号、“来远”号抢修完毕，重新投入战斗。一度退出战斗的“平远”号、“广丙”号及各鱼雷艇也相继折回。下午 5 时 40 分，伊东祐亨感到形势对自己不利，便下令各舰从东南方向逃出战场。北洋舰队追击 10 余海里，然后整队返回旅顺。

黄海海战，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近代世界海战史上部是罕见的。在黄海海战中，中国北洋舰队伤亡 800 余人，损失 5 舰，其余各舰也不同程度受伤；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伤亡 300 余人，参战各舰均受伤，其中旗舰“松岛”号完全失去战斗能力，“西京丸”号几乎被击沉。经此一战，日本虽未达到消灭北洋舰队的目的，但由于李鸿章从此不许北洋舰队巡海作战，日军便控制了黄海制海权，对整个中日甲午战争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1894 年 10 月 24 日　日军攻占辽东，制造旅顺惨案

日本陆军占领平壤、海军取得黄海制海权后，便决定入侵我国的辽东半岛。

清军在平壤战败后，退守九连城，集重兵 70 余营于九连城、安东（今丹东）一带。1894 年 10 月下旬，日军分两路侵入我国东北：一路由山县有朋率领第 1 军追击自平壤溃退的清军，越过鸭绿江；另一路山大山岩率领第 2 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

10 月 24 日，日军在朝鲜义州强渡鸭绿江，猛攻虎山。清军顽强抵抗。激战 6 小时后，虎山最终被日军占领。26 日，日军占领重镇九连城，并分兵进占安东、凤凰城。清军的鸭绿江防线，3 天内就被日军突破。此后，日军第 l 军分东西两路进犯，占令长甸、宽甸、岫岩、海城，进逼沈阳。

与此同时，日军第 2 军第 1 师团在日海军掩护下，分三批在辽东半岛东岸花园口登陆，企图抄袭旅顺、大连后路。旅顺为北洋海军基地，阵地坚固，有 30 多营，1 万多清军驻守。大连也有守军 6 营。因此，日本认为从海上正面进攻旅顺、大连，将会付出重大代价、便采取由陆路从侧后攻取旅顺、大连的作战方针。旅顺守将徐邦道获悉日军将进攻金州、大连，电请李鸿章派兵增援金州，派北洋舰队赴援大连。但李鸿章仅派 2000 援兵前往金州。徐邦道认为金州一旦失陷，则旅大便不可保，因此建议大连守将赵怀业增援，赵却按兵不动。徐邦道激于爱国义愤，率所属部队急驰金州御敌。

11 月 5 日，日军猛攻金州。其先头部队在金州城东的大和尚山遭到徐邦道部队的炮击，不能前进，便将其主力折向金州北面，从左侧背向金州发起攻击。6 日，徐邦道部队战败，退回旅顺，金州遂失陷。7 日，日本陆海军互相配合，向大连发起进攻。由于大连守将赵怀业已于 6 日逃往旅顺，兵勇溃散，日军未受抵抗便占领了大连，缴获清军大炮 120 多门，炮弹 246 万多发，子弹 3200 多万发以及大量军用物资。当天，日军混成第 12 旅团也在花园口登陆完毕。

日军在大连休整 10 天，于 11 月 18 日向旅顺发起进攻。当天，日军占领了旅顺的陆路咽喉南关岭。19 日，徐邦道部队在土城子南面同日军先头部队发生激战，将敌分割数段，一直追击至营城子西南。无奈，日军不断增援，而徐部兵单力薄，没有后援，与日军交战失败，被迫退回旅顺。不料，驻防旅顺的 8 艘雷艇先期逃至烟台，总办旅顺船坞工程、会办北洋营务处道员龚照玙（yú）和一些将领也乘船仓皇逃跑。21 日，日军主力猛攻可以瞰制各炮台的椅子山炮台。22 日，椅子山炮台和其它炮台相继被日军攻破，守军溃散，号称“固若金汤”的旅顺军港失陷。至此，辽东半岛被日军全部占领。

日军在占领辽东半岛过程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惨案。11 月 21 日，日军侵入旅顺后，兽性大发，竟借口为在攻城战中死去的官兵“复仇”和捕杀躲藏在城内的清军士兵，使用各种极其残忍的手段，对手无寸铁的旅顺居民进行一连 4 天的血腥大屠杀。旅顺居民 2 万多人惨遭杀害，仅有 36 人因被驱使掩埋尸体才幸存下来。日本制造的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受到各国公正舆论的谴责。美国《世界》杂志痛斥“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 暴露了野蛮的真面目。”但是，日本侵略者对其在旅顺的暴行，曾企图进行抵赖。然而，日本军国主义屠杀我旅顺同胞的罪行，是永远抵赖不了的。今天，埋葬在旅顺“万忠墓”中 2 万多殉难者的尸骨，就是历史的见证。

1895 年 2 月 12 日　威海军港失守，北洋海军覆灭

黄海海战后，北洋海军在旅顺整修。1894 年 10 月 18 日，北洋海军又移师威海卫。威海卫是北洋海军重要基地之一。威海卫港三面环山，南北岸如两臂突入海中，成半圆形，港外有刘公岛、日岛、黄岛拱卫大门，形势十分险要。北洋舰队提督衙门就设在刘公岛上。海港两岸和口外诸岛都设有配备重炮的新式炮台。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军又增修了许多临时炮台，并在海港的东西两口布设各种水雷和水下障碍物。当时港内尚有铁甲舰、巡洋舰 7 艘，炮舰、练船 8 艘，鱼雷艇 13 艘，驻军近 1 万人，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但是，李鸿章命令北洋舰队“不得出大洋浪战”，只许死守海港。丁汝昌执行了李

鸿章这一消极自保的错误方针，不敢出海与敌争锋。

日军占领旅顺后不久，日本大本营便采纳了第 2 军司令官大山岩和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的建议，决定向山东半岛进犯，用海陆军夹攻威海卫，妄图一举摧毁北洋舰队。为此，日军组成“山东作战军”，共 2.5 万人，任命大山岩为司令官。日军发现威海卫港正面设防坚固，因此决定在荣成湾登陆，然后西进，从侧面夺取威海卫。

1895 年 l 月 20 日，日军出动 2 万人，兵分两路，一路佯攻登州以迷惑清军，主力则在 25 艘军舰护送下陆续在荣成湾成山头登陆，占领了荣成县。25 日，日军分南北两路西犯威海卫。第 6 师团走北道，直扑南帮炮台；第 2 师团走南道，进攻北帮炮台。南帮炮台虽英勇抵抗，并杀伤大量敌人，但仍于当天下午被日军攻陷。北洋舰队在港东口已无立足之地，被迫移至西口。北帮炮台守军见南帮守军伤亡惨重，纷纷溃逃，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北帮炮台。至此，威海卫陆上的据点全落敌手，北洋舰队和刘公岛陷入重围。2 月 3 日，日本舰队倾巢进犯，轮番向刘公岛、日岛及停泊的北洋海军炮击。日军连续几天的强攻和偷袭，使北洋舰队受到重创，遭受很大损失。“定远”舰中雷受重伤，不久自毁；“来远”、“威远”等舰被日鱼雷艇袭沉。

2 月 7 日晨 7 时，日军对北洋舰队发起总攻，炮声轰鸣，硝烟蔽海，战斗异常激烈。清海陆守军经过 10 余天艰苦的鏖战，伤亡过重。随着战势日益险恶，在北洋舰队服役的外国海员伙同部分中国卖国将领煽动兵变，逼迫丁汝昌投降。11 日，丁汝昌接到密报，得知已不可能从陆路得到增援，便命令各舰突围。但外国海员和一些准备投降的将领坚决反对。

丁汝昌在绝望中自杀殉国。在此前后自杀的将领，还有威海守将戴宗骞、“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刘公岛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镇远”舰管带杨用霖等人。12 日，营务处道员刘昞炳等人盗用丁汝昌名义，起草乞降书，向日本舰队投降。16 日，刘昞炳代表清军在投降条约上签字，交出威海卫港内北洋舰队全部残余舰只，以及刘公岛、日岛等各炮台所有军械弹药。17 日，日本联合舰队正式占领威海卫。清政府耗费无数钱财，苦心营办的一支空前强大的近代化的北洋舰队，就这样彻底覆灭了。

1895 年 3 月 11 日　大施弱肉强食政策，英俄私自瓜分帕米尔

英俄争夺我国帕米尔地区由来已久。英国为了和沙俄争夺势力范围，企图利用帕米尔作为英属印度的屏障。为此曾表示支持中国在帕米尔地区的主权。1891 年秋，英国秘密照会清政府，建议划分中国、阿富汗间的边界，使帕米尔成为英俄之间的缓冲地带。然而，就在次年，沙俄大举入侵帕米尔，侵占萨雷阔勒岭以西帕米尔地区，强占了 2 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使英国的企图没能实现。

早在 1881 年中俄签订的《改订条约》及其子约《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中明确规定：从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其间的帕米尔地区为中国领土。显然，沙俄入侵帕米尔地区完全是违约行为。不仅如此，沙俄在以武力霸占帕米尔地区后，随即逼迫清政府进行“划界谈判”，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企图使非法的占领“合法化”。清政府为了使沙俄撤出它违约侵占的帕米尔地区，也同意与俄国举行谈判。1892 年 11 月 9 日，沙俄政府电示驻华公使喀西尼向清政府提议举行帕米尔划界谈判，并口

头宣布：“应以沿萨雷阔勒分水岭划分边界线作为划界的主要原则”，即中俄边界线从乌孜别里山口起，先向东再向南，将萨雷阔勒岭以西地区划归俄国。但是，沙俄的这种非法企图遭到清政府的拒绝。清政府提出了帕米尔划界应遵守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基本立场。可是沙俄连这个不平等条约也不愿遵守，强要清政府按照俄国的军事占领线——萨雷阔勒岭划界。

由于沙俄坚持无理要求，双方虽经 1 年多交涉，仍毫无结果。在中俄交涉的同时，1892 年 8 月，英国背着中国向沙俄提议，以萨雷库里湖向东划一直线到萨雷阔勒山脊，直线以南归英国“保护”，以北归俄国“保护”。1893 年 3 月，沙俄连续两次召开策划瓜分帕米尔的特别会议讨论英国建议。会议决定根据 1873 年俄英瓜分帕米尔的协议，坚持以喷赤河作为划分两国势力范围的界限，英国势力不得越过兴都库什山。英国对后一点表示反对。嗣后双方讨价还价，反复交涉。1894 年 4 月，沙俄向清政府强行提出：争议地区暂时维持现状，双方军队各扎原处，不得前进，分界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由于中日甲午战争即将爆发，清政府内外交困，无力西顾，只得对沙俄让步，表示同意“在中国和俄国间的帕米尔问题未得到最终解决以前，双方分别给予两国主管机关命令，以便使其保持并不超越各自的位置”。同时声明：在采取上述措施时，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对于目前由中国军队所占领以外的帕米尔领土的权利。1895 年 3 月 11 日，沙俄背信弃义，乘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之机，与英国秘密达成瓜分帕米尔的最后协议，划定了萨雷库里湖以东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分界线从湖东端的一点起，东到萨雷阔勒岭止，英国政府保证在英国势力范围内的土地应是构成阿富汗领土的一部分。

俄英瓜分帕米尔，是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政策的具体表现。在英俄瓜分帕米尔的过程中，虽然清政府向英俄郑重声明，对其背着中国私自瓜分中国领土帕米尔不予承认，并保留日后“重申前说”的权利。但沙俄恨本无视中国主权，继续强占萨雷阔勒岭以西的中国帕米尔地区，暴露了它侵略扩张的本性。

1895 年 4 月 17 日　日本逼签《马关亲约》，带来无穷无尽的后患

在 1894 年 9 月的平壤、黄海两战役之后，慈禧太后就起用被她在中法战争中罢黜的恭亲王奕䜣重新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谋求各国驻华公使出面调停，但无结果。当日军侵入辽东半岛后，清廷又请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出面调停，在美国操纵下派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署理湖南巡抚邵友廉为全权大臣，于 1895 年 1 月底赴日本谈判议和。但日方借口张、邵二人“全权不足”，拒绝与其谈判，提出必须以奕䜣或李鸿章为全权代表方可谈判。

2 月中旬，日军已占领威海卫，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异常恐慌，便通过美国公使转告日本已决定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3 月 19 日，李鸿章及其子、钦差全权大臣李经方，在美国顾问、前国务卿科士达陪同下，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代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及其美国顾问端迪臣议和。3 月 20 日，在马关春帆楼议和会议上，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日方则故意刁难，提出包括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 4 项苛刻的停战条件，迫使李鸿章撤回了以停战作为谈判前提的要求。3 月 24 日，李鸿章在返回寓所的路上，被日本暴徒小山丰六郎用手枪击伤左眼下的面部，谈判暂时停止。日本担心因李鸿章的被刺造成谈判破裂，便同意暂时停

战并签订《停战条款》。接着，中日双方继续议和谈判。在谈判中，日本方面采取漫天要价和肆意恐吓等卑劣手段，企图迫使李鸿章等谈判代表就范。经过近 1 个月的谈判交涉，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高压下，李鸿章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原称《马关新约》）。该条约共 11 款，并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其中内容如下：

一、中国承认朝鲜“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的国家。

二、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三、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 2 亿两，分 8 次在 7 年内付清；在第一次赔款缴清后，余款按年加“每百抽五”的利息；如清政府欲免付利息，则须在 3 年内将 2 亿两悉数缴清。

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上述各口搭客装货，日本政府得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官。

五、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设立工厂、输入机器，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在华制造的一切物品得免征各项杂税，所有日货均可设栈寄存。

1896 年 7 月，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日本又迫使清政府签订《通商行船条约》，规定日本在华与欧美诸国同样享有领事裁判权及“最惠国待遇”。同年 10 月，中日双方又增订关于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日本租界的专条。

《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后，对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利益损害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朝鲜成为日本附庸，日本便以朝鲜为跳板，大举向我国东北扩张。割占我国最大海岛台湾及北洋门户辽东半岛，是继沙俄侵吞我国大片领土后又一次大劫掠。对中国所勒索的前所未有的巨额赔款，不仅使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迅速膨胀起来，而且使列强蜂拥而起纷纷向中国进行侵略性的政治借款，加重了中国财政危机和人民的负担。允许日本在中国投资设厂，使帝国主义列强得以利用剩余资本在中国榨取超额利润，严重阻碍了刚刚起步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已经取得的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特权，通过各种形式向中国输出大量资本，侵占商品销售市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总之，《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把中国进一步推进半殖民地的深渊，严重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

1895 年 4 月 23 日　俄、法、德干涉“还辽”，借机扩张侵华势力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帝国主义列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俄、德、法三国对于中国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的问题尤其关注，因为它给三国在华的侵略扩张以极大的威胁。事实上，俄国早就有独占中国东北的野心，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便使俄日两国争夺我国东北的矛盾斗争尖锐化了。1895 年 2 月，中日谈判前夕，俄国一面通知日本，如放弃向中国大陆扩张版图而割占台湾，俄国将无异议；一面调遣大批海陆军闯入中国，以“保护”俄国利益为名对日本施加压力。4 月 6 日，即日本公布议和条件后 5 天，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在写给沙皇的条陈中说，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将威胁俄国的安全，建议俄国与列强联合干涉日本占领辽东半岛。接着，他又说：“我们的目的是双重的：在太平洋取得一个不冻港；并吞满洲的一部分以利修建外西伯利亚铁路。”罗拔诺夫的意见得到了沙皇的同意，并作出两点决策：一上

是如果日本拒绝放弃割占中国辽东半岛的建议，俄国就有“行动的自由”；二是照会其它列强和日本，俄国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坚决要求日本退出辽东半岛。4 月 17 日，即《马关条约》签字那一天，俄国政府正式向英、法、德三国建议，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如不答应，三国即“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

英国是俄国争霸欧洲和向远东侵略扩张的宿敌，因此拒绝参加联合行动。但法国是俄国在欧洲的盟国，所以表示愿意参加干涉，借以向清政府勒索报酬。当时的德国还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急于夺取更多的殖民地。虽然它在欧洲与俄法长期为敌，但在远东却热衷于和俄法共同行动。一则趁机离间俄法在欧洲的同盟关系；再则可转移俄国视线，减轻对德国东方边境的威胁；此外还可以借此机会得到中国方面的感激，以便从中国割占“一块地方”作为海军基地或煤站。

4 月 23 日，俄、德、法驻日公使同时照会日本政府，“劝告”日本“放弃领有辽东半岛”，并限令 15 天内给予答复。随即三国海军同时出现在日本海面。停泊在日本港口的俄国军舰昼夜升火，大有准备开战的架式。日本政府自忖无力与三国同时作战，便急忙向英美两国寻求援助。但英美两国既不愿担此风险，也不愿日本在华势力过分膨胀，因此劝告日本接受三国要求。当时日本刚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海陆军备空虚，将士疲惫不堪，实在无力再行开战。在俄、法、德三国压力下，日本政府被迫于 5 月 5 日宣布接受三国劝告，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俄、德、法三国同意日本向中国要求增加赔款，作为“补偿”。

日本政府对俄、德、法“全然让步”，但对中国却采取“一步不让”的方针，严逼清政府必须迅速批准《马关条约》，如期互换批准书。美、德、法也出面催促中国从速批准条约。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 5 月 8 日，派伍廷芳与日本代表伊东美久治在烟台互换批准书。同年 11 月 8 日，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林董在北京签订《辽南条约》，中国以银 3000 万两“赎回”辽东半岛。

三国干涉还辽，是 19 世纪末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开端。此后，三国以干涉还辽邀功索偿，强迫清政府给予租借军港、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等特权。沙俄乘机迅速扩大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势力。

1895 年 6 月 7 日　日本占领台湾，殖民统治 50 年

《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的消息一经传到台湾，台湾省人民“若午夜暴闻惊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1895 年 4 日 20 日，即《马关条约》签字后第 4 天，台北人民鸣锣罢市，集会抗议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决心与台湾共存亡。但清政府对台湾人民的反割让运动采取遏制态度，同时决定如期向日本交割台湾。

5 月 20 日，台湾省巡抚唐景崧受命率文武官员“陆续内渡”，撤出台湾。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被任命为“割台特派大臣”，由美国顾问科士达陪同前往办理交割手续。李经方不敢在台湾上岸，按照科士达的意见，于 6 月 2 日在基隆口外日轮“横滨”号上，向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交出割台清单，将“台湾全岛、澎湖全岛之各海口，并各府厅县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台湾、澎湖两岛人民在这张卖身契下被沦为亡国奴。

日本侵略强盗深知不甘屈服的台湾人民是绝对不答应其在台湾建立殖民统治的。因此，决定武装占领台湾。它派出以北白川宫能久中将为师团长的近卫师团，于 5 月 27 日从冲绳中城湾出发，分乘大批舰船，经过我钓鱼岛附近海面，分两路进攻台湾本岛。29 日，日军在基隆以东 50 里的澳底登陆。6 月 1 日，日军占领三貂岭，然后分三路进攻基隆。在日本海军配合下，日军占领了基隆。唐景崧带领大小官吏和 12 营清军内渡，6 月 7 日，日军不战而陷台北。

在敌军压境的严重关头，台湾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抵抗。以徐骧、吴汤兴、姜绍祖等为首的抗日义军同帮办台湾军务、台南守将刘永福（即原黑旗军将领）领导的清军联合作战，掀起了悲壮而激烈的武装斗争。大致经过如下：

6 月初，日军分两路进犯通往台中的入口处新竹。徐骧、吴汤兴等带领义军英勇阻击入侵之敌。在龙潭陂一带，义军在农民群众配合下，一举歼灭日军 60 余人。6 月下旬，日军从小路抄袭，攻陷新竹。吴汤兴联络各军进行反攻，在新竹城东十八尖山一带展开激烈争夺战，历经数十仗，将日军牵制了两个月之久。

8 月，日军增调 2 万人到台湾，向台中地区发动了进攻。义军及刘永福的黑旗军在大甲溪伏击日军，给敌人以重创，杀死日军无数，使得溪水都为之断流。此后，日军疯狂地进行报复，发动多次进攻。8 月下旬，大甲溪被日军占领。

接着，侵台日军集中兵力猛攻彰化。早已做好准备的义军和黑旗军给以迎头痛击。台湾军民击毙日本最精锐的近卫师团 1000 多人，日军少将山根信成也命归黄泉。在激战中，黑旗军将领吴彭年及 300 多名战士壮烈牺牲，彰化陷落。

9 月初，刘永福重新组织力量进行反攻，相继收复云林、苗栗等地。后日军反扑，云林等地又陷敌手。

由于长时间苦战，台湾军民的粮饷、军械等物资十分短缺。虽然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援助台湾抗战，并积极筹款赞助，但由于清政府害怕开罪于日本侵略者，竟下令禁止支援台湾人民。台湾军民在极其险恶的危境中毫不气馁，继续顽强地坚持战斗，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10 月上旬，日军猛攻嘉义，义军和清军沿路设雷，炸死敌军 700 多人，日寇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中将也重伤毙命。敌军冒死夺城，嘉义失守。10 月 19 日，义军在嘉义西南的曾文溪与日军展开最后一次激战。当时台湾抗日军民的处境更加困难，卖国的清政府非但不予接济，还命令沿海各省督抚查禁海口，不准大陆援助物资上岸，甚至将刘永福派人到大陆募集的捐款截留。在曾文溪战斗中，义军首领徐骧、总兵柏正才等相继牺牲，余军退入台南，曾文溪陷落。日军三路夹攻台南，义军和黑旗军弹尽援绝，形势万分危急。此时，刘永福登上英国轮船，逃回厦门。10 月 21 日，台南陷落。至此，台湾全岛被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

从 6 月至 10 月，台湾军民顽强抗战，打了大大小小 100 多仗，抗击了日本侵略军 3 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使日本侵略者受到沉重的打击。日本在侵台战争中，动员了约 5 万人，夫役 2 万余人参加战斗，最后伤、病、死亡达 3 万余人；主力军近卫师团伤亡过半，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中将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殒命。台湾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捍卫祖国领土完整

而进行的英勇战斗，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史册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在日本统治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未间断，直到 1945 年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1895 年 6 月 20 日　法国逼签界约，蚕食南疆领土

中法战争后，法国侵略者逼迫清政府与之先后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款》、《续议界务专条》等不平等条约，据此法国在中国攫取了一大批侵略特权。尽管如此，法国仍贪心不已，处心积虑地蚕食我国南疆领土，决心打开我国西南大门。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法国仗恃其参加三国干涉还辽“有功”，以此向清政府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法国侵略者一方面充当沙俄亲密伙伴，迫使清政府与其签汀《四厘借款合同》，另一方面又单独向清政府进行另外勒索。1895 年 5 月 8 日，法国外交部长哈洛托召见中国驻法公使龚照瑗，露骨地表示：“法和俄、德争退辽东全境”，对华有“功”，要求中国政府就前议商务、界务等事与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早日定议，以“服”法国之人心。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随即多次亲自至总理衙门，当面向奕诉“居功求报”，逼迫清政府与其签约。奕诉明知法国意在勒索，但生怕拒绝法国的无理要求会招致祸患。于是出于与法国“固邦交”和“维大局”的目的，奏请光绪皇帝“勉从其请，以示酬答之意”。光绪皇帝便命奕诉、徐用仪与施阿兰于 1895 年 6 月 20 日正式签订了中法《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和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

根据中法《续议界务专条附章》，重定了中越边界，依照第 3 款规定，中国云南境内的猛乌、乌德以及化邦、哈当贺、联盟、猛地等处划归法属越南。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除了进一步确认 1885 年到 1887 年中法双方所订立的两个通商章程外，同时又扩大了法国在华新的特权：广西龙州、云南蒙自、思茅、河口 4 处开埠通商，前 3 处法国可以派领事；上述 4 处进出口货物比照沿海各口税率减收 2/5；越南已有的和日后将要修筑的铁路可接至中国境内。通过上述界约和商约，法国割占了我国云南边境一部分领土，取得了陆地通商减税的特权。法国在甲午战争后领先向我国勒索筑路、开矿的利权，为列强争夺我国路、矿特权开创了一个恶例。

法国为实现其在我国的筑路权，于 1896 年 6 月，进一步迫使清政府与其签订修筑镇南关（今友谊关）至龙州的铁路合同。按合同规定，法国公司得以“包办”铁路的修筑及建成后的经理事宜，清政府只能加以“稽察”。这样，这条铁路实际上完全归法国控制。

1895 年 7 月 6 日　第一次大借款——被迫签订《俄法借款合同》

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几年里，向清政府提供贷款，成为侵略中国的列强们竞争的焦点之一。列强纷纷向清政府提出贷款，诱使或强迫其接受。为了争做中国的债主，它们展开激烈争斗。各国驻华公使甚至到总理衙门吵架，耍流氓手段，同时还用大量金钱贿赂清朝官员，以图达到逼迫清政府与其签订借款合同的目的。

依据《马关条约》的规定，清政府得在 3 年内偿付对日赔款银 2 亿两和赎辽费 3000 万两。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足 9000 万两，根本无力偿

付如此巨款。为了交付赔款，清政府唯一的办法是举借外债。帝国主义列强也就乘机争着向清朝政府提供带有政治条件、具有奴役性质的贷款。为此，在俄、法、英、德、美等国间，主要是英俄两国间展开了激烈地争夺。

《马关条约》订立后的 4 年间，清政府共 7 次向外借款，其中 3 次数额最大，即 1895 年的俄法借款，1896 年的英德借款和 1898 年的英德续借款。

英国在《马关条约》刚订立时，就通过担任中国总务司的赫德进行活动，要由英国银行承揽一笔大借款。当时正在以清朝政府“朋友”的姿态，干涉辽东半岛问题的俄、法、德三国听到这个消息，都出来阻拦。特别是俄国，立即向清政府提出由于它首先对日本进行干涉，这笔贷款必须先由它承担的要求，说是俄国银行可以贷款 1 亿两。其实俄国并没有足够的财力，所以它向法国联系，要求法国共同投资。法国决定把德国排斥在外，而同俄国在这个问题上合作。这时，英国仍不愿意放弃贷款，德国也很想参与。清朝政府感到与其只向一两个国家借款，不如让各国都参加一份。所以向俄国表示，只愿向它借 5000 万两。但俄国坚决不答应，便联合法国共作债主，拉拢 6 家法国银行和 4 家俄国银行组成对华借款银行团。在沙俄的胁迫下，1895 年 7 月 6 日，驻俄公使许景澄代表清政府在俄国圣彼得堡与俄法银行团签订了《俄法借款合同》，亦称《四厘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共 19 条，另附《四厘借款声明文件》1 件。主要内容为：借款总额为 4 亿法郎（合白银 9896 万余两）；由 6 家法国银行与 4 家俄国银行分借；以 94.125%折扣交付，年息 4 厘；偿还期限 36 年，1910 年 1 月 1 日前每年应还数额不能增多，不能议减年息，不能一次还清；以海关收入作担保；中国若许他国管理、监督税收等项权利，亦准俄国均沾。

俄法金融资本与俄国政府相结合，通过这次借款，从中国发了一笔横财，还由此得以插手中国的海关管理。同年 12 月，经沙皇批准正式成立华俄道胜银行，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主持银行的组成工作，其资金大部分来自法国。这个银行是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扩张的有力工具。

1896 年 3 月 23 日　第二次大借款——被迫签订《英德借款合同》

俄法集团在第一次大借款中取得了胜利。在俄法与清政府签订《俄法借款合同》后，德国不甘心被排斥在俄法银行团对华借款之外，英国也极力反对俄法插手中国海关，威胁它在华的侵略利益。于是英德勾结起来，争夺第 2 次对华大借款，俄、法、美等也积极兜揽。本来在俄法借款合同签字之前，清朝当局就曾向德英两国表示下次借款将一定轮到它们。所以，到了 1896 年 1 月，英德两国驻华公使就主动向总理衙门提出要由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德华银行贷款 1600 万英镑（相当于白银 1 万万两），并且拿出合同底稿，限期签字。英德两国还公开表示，“不惜诉诸武力”也要夺得这次借款，对清政府施加压力。俄法两国自然不会甘心退让，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提议由俄、法、德、荷四国共同贷款。由于英国坚决反对，德国也不愿参加，俄国的图谋未能得逞。法国公使施阿兰仍不甘心，继续进行单独活动。他向总理衙门提出由法商承担借款，并且说折扣可以低于英德提出的九五扣（当时的借款在支付时都有折扣，例如名义上是 1 万万两借款，并以此数计息还钱，但实际只付 9500 万两，扣除了 5%，即所谓九五扣）。总理衙门虽然同他们进行了谈判，但最后仍然没有做成这笔买卖。为英德垄断组织奔走的赫德，经过

多方交涉，最后还是迫使总理衙门将这笔巨额借款交由英德办理。

1896 年 3 月 23 日，清总理衙门与汇丰银行及德华银行在北京签订《英德借款详细章程》，亦称《英德借款合同》，又称“中国五厘借款”。

借款合同共 18 款，主要内容为：借款总额为 1600 万英镑，合银 9762 万余两；94%折扣交付，年息 5 厘；偿还期限 36 年，不得提前或一次还清；以海关收入作担保。并明确规定：在借款偿还期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必须由英国人充任。

1896 年 6 月 3 日　沙俄逼签《中俄密约》，攫取在东北修筑铁路权

中日甲午战争后，俄国因带头干涉日本占有辽东半岛，对清政府“有功”，因此寻机向中国索取“报酬”。这时的清政府对俄国也愈加依赖，幻想依靠沙俄牵制列强。李鸿章的“联俄制日”的外交思想，甚至也被倾向英美的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所接受，一致主张同俄国缔结密约，巩固邦交，一旦有事可得到俄国的保护。这时的俄国正在加紧修筑西伯利亚铁路，急于向远东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区扩张，自然不会错过向中国进行勒索的大好时机。

1896 年 5 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清政府按照俄国的要求，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前往祝贺。俄国认为这是一块送到口边的肥肉，因此急忙派专员到苏伊士运河迎候李鸿章，为的是怕欧洲其它列强抢走。李鸿章到达圣彼得堡后，俄国财政大臣维持、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很快便于 5 月 3 日与他秘密谈判，提出中俄缔结军事同盟，并以防日为借口，要求中国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境内修筑铁路直达海参崴。俄国对李鸿章软硬兼施，一面以 300 万卢布重金贿赂，一面由沙皇亲自接见施加压力。李鸿章在沙俄的贿赂和威逼下，无耻地出卖了国家主权，同意与俄国签定所谓军事盟约，并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境内修筑铁路。

6 月 3 日，李鸿章与维特、罗拔诺夫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又称《中俄密约》）上签字。当光绪帝看到该约文本后，对这种如此把祖宗发祥地一举卖与俄国的做法十分恼怒，故不予批准。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大耍流氓无赖手段，装模作样地把运载行李的车子摆在俄使馆大门前，表示若不立即批准条约，他马上下旗回国。清政府在俄国的胁迫下，批准了条约。9 月 28 日，双方在北京互换条约文本。

《中俄密约》共 6 款，另附规定约文以法文为准的专条。其主要内容为：

一、日本如侵占俄国亚洲东部土地或中国、朝鲜领士时，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并互相接济军火、粮食。

二、缔约国一方未征得另一方同意，不得与敌方议立和约。

三、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对俄国军舰开放，中国地方官应尽力供应所需。

四、允许俄国通过黑龙江、吉林两省修建一条铁路，自赤塔直达海参崴，该路的修筑、经营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具体合同由中国驻俄公使与华俄道胜银行就近商订。

五、无论平时或战时，俄国均可在该铁路运送军队、粮食和军需品。

六、本条约自铁路合同批准之日起，有效期 15 年；届期 6 个月以前，由两国再行商办展限。

《中俄密约》从表面来看，是中俄两国共同防御日本侵略的军事同盟，

实际上是沙俄借“共同防日”之名，通过“结盟”的形式，来推行它征服中国东北和争霸远东的侵略扩张政策。同年 9 月，俄国又迫使清政府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规定中东铁路的建造和经营管理等事项，由道胜银行另设中国铁路公司主办。中东铁路名义上由中俄合办，有清政府的股份，中国商民一样可以购买股票，但实际上完全受俄国支配，清政府只是提供便利而已。《合同章程》规定，中东铁路公司对铁路沿线地段“享有绝对的、专有的管理权”。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12 月，俄国政府单方面制定并颁布《中东铁路公司章程》，事实上把中东铁路当成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部分。它擅自“授权”给中东铁路公司，只要经中国政府核准即可在中国开采煤矿，兴办其他工商业；“在被划给中东铁路及其附属物的土地上，法律及秩序的维持应委之于公司任命的警察担任”。这样，中东铁路沿线地段就成了俄国侵略中国东北的基地。1897 年春，俄国开始筑路，向沿线派出大批修路队和殖民者，开采矿产，建立城镇（哈尔滨是第一个），推进对我国东北，首先是东北北部的“和平征服”。《中俄密约》的签订，标志着我国东北北部已沦为沙俄的势力范围，从而加剧了列强对中国的争夺。

1898 年 3 月 1 日　第三次大借款——被迫签订《英德续借款合同》

到 1897 年下半年，清朝政府为了最后付清中日甲午战争的赔款，又着手进行第 3 次大借款。李鸿章奉命办理这件事，他想越过列强政府而向在上海的外国商人直接借款。美国的德伦公司想揽这笔买卖，便同李鸿章的代理人盛宣怀洽谈，但没能成交。李鸿章又同英国的哈利詹利士公司初步商订了借款合同草案。但英国政府出来阻难，这个草案也被废弃了，因为英国政府认为这个公司所订的草案并没有能充分反映英国利用这次借款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夺取沿海港口，分割势力范围，互争在对中国侵略中的优先地位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因此这次清政府大借款仍无法摆脱以俄法为一方，和以英德为另一方的激烈争夺的局面。俄法与英德双方都各自提出条件和要求，争着要承担这次借款。各国公使天天在总理衙门进行威胁，英国和俄国还在伦敦与圣彼得堡紧张进行交涉。最后，英德再度紧密勾结战胜了俄法集团，争得了第 3 次大借款。1898 年 3 月 1 日，总理衙门与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在北京签订《英德续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共 17 款，加附《付还本利日期数》1 件。主要内容有：借款总额仍为 1600 万英镑，合白银 1.1277 余亿两；以 83%折扣交付；年息 4 厘半；偿还期限 45 年，不得提前或一次还清；以海关收入和苏州、淞沪、九江、浙东货厘及宜昌、鄂岸、皖岸盐厘为担保。在借款偿还期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必须仍由英国人充任。

从 1895 年至 1898 年清政府向列强举办三次大借款，总计合银 3.09 多亿两，外国银行扣除回扣之后，清政府实得 2.62 多亿两，其中 2.3 多亿两作为甲午战争赔款、辽东半岛赎还费和日军占领威海卫的军费。清政府每年要交付本息 2000 万两以上，相当于当时一年的全部关税收入，使中国深深陷入国际金融资本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这些贷款不仅仅追求经济利益，更主要的是作为勒索和破坏中国主权的一种手段，而附加了许多政治条件。外国贷款越多，越增强它们在中国的政治力量；清政府欠债时间越长，在政治上依赖、

受制于外国的时间就越长。经济剥削与政治奴役结合在一起，就成了这些借款的突出特点。

这三笔大借款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吸吮中国劳动人民血汗达数十年之久。俄法借款中俄国借款部分于十月革命后取消；法国部分到 1931 年才全部还清。英德的第一次借款，到 1932 年才将本利全部还清。英德续借款，直到 1938 年，即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年，仍有 366.665 万镑没有偿还。

1898 年 3 月 6 日　德国强租胶州湾，划山东为其势力范围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为肢解中国神圣领土以作为其各自的势力范围，掀起了强行“租借”中国沿海港湾、瓜分中国的狂潮。在列强这一罪恶活动中，德国首先向中国伸出侵略魔爪。

德国与俄法帝国主义一样也以干涉还辽的“功臣”身份，向清政府勒索“报酬”。1895 年 10 月德国取得在汉口、天津开辟租界的特权以后，其外交大臣马沙尔又向清迁驻德公使许景澄提出租借一个“屯泊兵船”的地方的要求。在此处 2 年中，它又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途径向清政府提出同样的要求，但均未得逞。1896 年 11 月 29 日，德皇威廉二世召开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占领胶州湾。为此，1897 年初，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与总理衙门进行交涉，明确提出索取胶州湾的无理要求。清政府以胶州地势重要，不容外国盘踞为由予以拒绝。2 月 17 日，德国海军大臣何尔门正式通知外交大臣马沙尔：德皇已决定武装占领胶州湾，俟时机一到便立即执行。为了实现这一侵略计划，德国海军部加紧对胶州湾进行“详密调查”，做好武装占领胶州湾的准备。

11 月 1 日，2 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巨野被杀。6 日，威廉二世闻知此事，喜不自禁地说：“中国人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与事件。我决定立即动手！”于是，德国在沙俄的默许下，以“巨野教案”为借口，于 13 日调其远东舰队到达胶州湾。当清军守将章高元派员询问德舰来意时，德国舰队同令蒂尔皮茨谎称“来此游历”。14 日晨，德国陆战队 720 余人以操练为名强行登陆，分据要隘，然后送来照会，限清军于当日下午 3 时以前全行退出，以 48 小时为限。面对敌人汹汹来势，章高元要求抵抗，但清政府下令：“断不可先开炮，致衅自我开”。30 日，又发出旨令，强迫章高元部移驻烟台。到 12 月 17 日，清军完全撤离了胶州湾，德国侵略者便轻易地实现了武装占领胶州湾的目的。

在德帝国主义的武装进犯和外交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屈辱妥协，不仅接受了德国就巨野教案所提出的极端无理的 6 项要求，还于 1898 年 3 月 6 日同德国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该条约包括胶澳租界、铁路矿务及山东全省办事之法三端，共 10 款，其主要内容为：

一、胶州湾及湾内各岛租与德国，租期 99 年；租期内胶州湾完全由德国管辖，并得以制订章程，约束色括中国在内的他国来往船只。

二、胶州湾沿岸潮平 100 里内，划为“中立”地区、德国官兵有权自由通行。清政府在该处“派驻”兵营、筹办兵法”，须先与德国会商办理；清政府在“中立区”内不得颁布法规和行政命令。

三、德国有权在山东建造由胶州经潍县、青州（今益都）、博山、淄川、邹平到济南及山东界和由胶州经沂州、莱芜到济南的 2 条铁路，并有权开采铁路沿线 30 里内的矿产。

四、山东省开办各项事务，或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物料，德国享有优先承办权。

8 月 22 日和 10 月 6 日，中德双方划界官员分别签订了《胶澳租地合同》和《胶澳潮平合同》，这两个合同具体规定了德国在胶州一带的租界地的范围。

据此，山东全省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接着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纷纷以租借的名义，强占我国的港湾，争划各自的势力范围。

1898 年 3 月 27 日　沙俄强租旅顺、大连，划东北为其势力范围

沙俄通过 1860 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夺得海参崴（后改名符拉迪沃斯托克，意即“统治东方”），作为俄国太平洋舰队锚泊的军港，成为它在远东的重要侵略基地。但是海参崴在 1 年中有 4 个月的封冻期，因此沙俄想再从中国夺取一个不冻港以加强其远东的军事力量。为此，沙俄在此后 30 多年间，处心积虑地为在中国北方沿海夺取一个不冻满而积极活动。甲午战争后，沙俄为了将其正在修筑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伸向我国东北，要在中国寻求一个理想的港口的企图愈加迫切了。此时，俄国驻烟台的领事经过对辽东半岛的“调查”，立即向俄国政府报告了大连湾的情况。他说：大连湾有 4 个单独的良好港湾，能停泊吃水 20 英尺甚至更深的船只，而且冬夏相宜。这样，大连湾就成了俄国猎取的目标。1897 年 11 月 14 日，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口实出兵强占胶州湾以后，俄国政府就做出了不失时机占领大连湾的决定。为此，在 11 月末，俄国便与德国秘密谈判达成一项谅解，互相支持对方的侵华活动。与此同时，俄国利用清政府在甲午战后对它的信任和依赖，不惜愚弄清政府，谎称俄国“忿于”德国强占胶州湾，为“援助”清政府遏制德国出兵胶州湾，俄国舰队决定进入旅顺口。还进一步给清政府设下一个圈套：让清政府向列强“表明中俄联盟之意”，俄国占领旅顺是得到清政府允许的。昏庸的清政府竟然听信俄国的谎言，完全按照俄国的侵略意旨行事，不仅允许俄国舰队驶入旅顺，并且命令旅顺守将宋庆：“俄船在旅所有应用物件，随时接济。”

12 月 14 日，俄舰驶入旅顺口，但对德国占领胶州湾却没有采取任何遏制行动。清政府如梦初醒，方知上了俄国的圈套，感到事态的严重，便马上派许景澄为特使到俄国进行交涉。沙俄政府一方面对中国特使支吾其辞，制造种种谎言继续欺骗；另一方面又通过卑鄙手段，以牺牲中国主权为交换条件与日英达成妥协。然后公然于 1898 年 3 月 3 日照会中国政府，提出租借旅顺、大连和建筑中东铁路南满支线的无理要求，并声言一旦谈判破裂，将强行登陆占领。3 月 16 日，俄使巴布罗福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 3 月 27 日前按照俄国的要求订约，并拒绝与许景澄继续会谈。俄国在对中国连连施加压力的同时，又一次使用贿赂谈判大臣的伎俩，俄财政大臣指示华俄道胜银行，如中国同意签约则向李鸿章赠银 50 万两，向张荫桓赠银 25 万两。

结果，在沙俄威逼和重金利诱下，李鸿章、张荫桓于 3 月 27 日与巴布罗福分别代表中俄两国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这个条约规定：

一、清政府允许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给俄国，租期 25 年，但经双方同意得延长之。

二、在租借地及其附近海面内，地方行政完全由俄国官吏管理，中国军

队不准驻扎。

三、租借地北面划一“中立区”（“隙地”），行政由中国官吏管现，但中国军队须经俄国官吏同意后，始得入内。

四、清政府允许中东铁路建一支线至大连湾，必要时得展至营口与鸭绿江之间的海岸。

同年 5 月 7 日，许景澄、杨儒在圣彼得堡与俄外交部继续交谈，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划定旅大租借地与“中立区”的界线，并规定非经俄国同竟，中国不得将中立区及其东西沿海口岸让与别国人享用或与别国通商；中东铁路支线经过的地方，不得将铁路利益让与别国，等等。

7 月 6 日，清政府又与东省铁路公司签订《续订合同》，将中东铁路支线定名为南满支路。公司取得三项特权：

一、其船只“行驶辽河并该河之支河”，以及驶入营口和“中立区”各口之权。

二、“在（中国）官地树林内自行采伐”之权。

三、“在此支线经过地带开采煤矿”之权。

这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清政府用 3000 万两银子从日本赎回的辽东半岛转手又被俄国夺去，而且南满支线的修筑还把东北三省南部和北部联结起来，使我国整个东北地区都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

1898 年 6 月 9 日　英国强租九龙、威海卫，以此与俄法相对抗

英国作为一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华一直保持侵略权益的优势。然而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随着俄、法、德等列强在中国侵略权益的不断扩大，英国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优势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德国武装占领胶州湾；俄国强“租”旅大并企图将其势力向南扩展；法国准备夺取广州湾，这些情况使英国极为不安。它决心攫取更多的侵华特权，与俄、德、法等国抗衡。于是，英国采取暗中与日德联盟，北阻沙俄，南抗法国的方针，与俄法展开激烈的角逐。

1898 年 4 月 10 日，清政府被迫答应租借广州湾给法国，并确认滇、粤、桂 3 省的大部分作为法国的势力范围。针对这一情况，英国公使窦纳乐于 4 月 24 日奉命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如下要求：

一、不得将西南诸省铁路、开矿独占权让与法国。

二、开放南宁为商埠。

三、向英国保证不割让广东、云南。

四、允许英国修筑沪宁铁路。

五、展拓香港界址。

清政府慑于法国的强烈反对，加之法国背后又有沙俄的支持，所以没有同意开放南宁；但又迫于英国威胁，不情愿地对其余要求一概照允。6 月 9 日，李鸿章和礼部尚书许应骙与窦纳乐分别代表中英双方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根据其规定，英国租借了从深圳湾到大鹏湾的九龙半岛全岛，连同这两个海湾的水面，以及北纬 22 度 9 分以北，东经 113 度 52 分和 114 度 30 分之间的全部海面和岛屿（大小岛屿 200 余个）共 975.1 平方公里（后称“新界”），租期为 99 年，“租借地专归英国管辖”。中国仅保留了九龙城内区域的行政权和九龙到新安陆路的通行权。至此，英国通过这一《专

条》以及 1842 年的《南京条约》割让给英国的香港岛 75.6 平方公里、1860 年的《北京条约》割让给英国的九龙司（半岛界限以南）11.1 平方公里，侵占厂中国整个香港地区，面积为 1061.8 平方公里的领土，极大地增强了它在我国华南的地位和势力。

鉴于沙俄强“租”了旅顺、大连，英国也加紧实现强“租”威海卫以对抗俄国的图谋。1898 年 3 月 25 日，当英国获悉《旅大租地条约》即将签订时，首相索尔兹伯里立即训令窦纳乐，令其“以最有效和最迅速的办法获得在日军撤出后占领威海卫的优先权，占领条件应与俄国占领旅顺口的条件相同”。同时还命令其舰队开赴渤海湾。当天，窦纳乐声称由于俄国租借旅大，英国“非租借山东之威海卫停泊兵轮，不足以资抵制”。清政府恬不知耻地认为英国的无理要求“尚属实情，并非无端图占”，同意在日军撤出后把威海卫“借”给英国。

当时威海卫尚在日本占领之下，处于德国势力范围之中。英国为了尽快把威海卫抢到手，一方面继续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积极展开同日本、德国间的交涉。由于英国与日本、德国有着同盟关系，最后 3 国在彼此维护和尊重对方侵华权益的基础上，达成谅解。5 月 7 日，清政府付清了对日本的全部赔款。接着，日本通知清政府，日本在占领期间建造的兵营和其它建筑物将移交给中国，但当英国占领威海卫后这些设施应归英国处置。日本同时又将这项通知告诉英国政府。英国十分赞赏日本这一“友好举动”。

7 月 1 日，总理衙门大臣奕诉、廖寿与窦纳乐分别代表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了《订租威海卫专条》，主要内容为：

一、将威海卫及其附近海面，即包括刘公岛和威海湾在内的群岛，以及全湾沿岸 10 英里以内地方租给英国。

二、租期 25 年，期满经两国相商仍可延长。

三、所租之地归英国管辖。

英国为能勒索到威海卫这一十分重要的军港，深感满意。至此，拱卫北京和华北门户、分踞渤海湾南北入口的旅顺和威海卫，便沦入沙俄和英国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手里，给中由带来极大的威胁。

1899 年 4 月 28 日　日本强租福州，划福建为其势力范围

在英、俄、德、法等西方列强强租中国海湾、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中，日本也不甘落后，强烈要求清政府不要把靠近台湾的中国地区让与或租给别国。日本猎取的目标，是要把福建省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为此，日本十分留意清政府如何答复法国“不割让与越南毗邻省份”的照会，以便可以援例实现计划。1898 年 4 月 10 日，清政府复照法国，答应不割让两广和云南。日本认为这是向清政府提出侵略要求的大好时机，就在清政府答应法国的要求后第 5 天，日本政府向总理衙门口头提出，要求清廷不割让福建与他国。接着，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非正式地会晤了李鸿章和张荫桓，逼迫二人接受日本的要求。22 日，矢野文雄照会总理衙门正式要求福建不割让或租给其他国家。在日本的威逼下，清政府又一次妥协屈服，并在同日发表声明：“福建省内及沿海一带均属中国要地，无论何国，中国断不让与或租给。”据此，日本把福建省强据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此外，还逼使清政府做出口头承诺：如果“日后拟在福建省内兴造铁路”，得“先向日本政府筹商”。1899 年，

日本擅自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到福建、浙江、江西等省查勘，为包揽这些省份的铁路建筑做准备。

1899 年 4 月 28 日，日本强迫清政府正式签订了《福州口日本专用租界条约》。条约共 12 款，另附《另约章程》5 款，其主要内容为：

一、自天主教堂码头东界起，至尾墩村东方止，前部面沿闽江，后部模田地一带地方，为日本专管租界。

二、租期 30 年，期满可以继租。

三、租界内之行政、警务等权，皆属日本管理。

四、所有外国租界和将来开拓之外国租界的优惠、日本租界一体享受。

五、租界内港头、中墩两村房产，出卖时只许卖与日本，不得卖与或租与别国，违者由中国地方官从严惩办。

通过这个条约，日本在中国东南沿海夺取了一块军事殖民地，加强了它对福建省的控制。

1899 年 9 月 6 日　美国不甘放弃侵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

1899 年，工业已跃居世界第一位的美国，正在进行同西班牙争夺菲律宾的战争，无暇东顾，因此未能赶上对中国海湾港口和势力范围的争夺。美国打败西班牙夺取了关岛和菲律宾群岛，终于完成了通向亚洲和中国的第一步。它在西太平洋建立了侵略基地，并将其对外扩张的矛头转向中国。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抢占中国沿海的一些最优良的港口，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美国想在中国夺得一块独占的势力范围实在太迟了。摆在美国政府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可选择：要么同俄、英、法、德、日等国合作，结成共同掠夺中国的利害关系；要么同其他列强对峙。然而当时的美国武装力量相对来说还比较弱小，要与众列强对抗，以武力挤进瓜分中国的行列是不太可能的。于是在占领菲律宾后不久，美国总统麦金莱就声称：美国“绝不在东方寻求一点非共同的利益”，而仅仅“要求门户开放”。1899 年，“门户开放”终于作为美国对中国的一项所谓“新政策”而被提出来了。

1899 年 9 月 6 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先后训令美国驻英、德、俄、日、意、法等国使节，征询各驻在国政府的意见，请各国对美国提出的一份宣言作出承诺。这份宣言主要内容，一是互不干涉各国在华的一切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既得利益；二是各国运往上述势力范围内一切口岸的货物，一律适用目前的中国税则，税款由中国政府照章征收；三是各国对于往来于上述势力范围内任何口岸的船只，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船舶的港口税；在它的势力范围内所修筑、控制或管理的铁路线上，对他国货物不得征收高于本国同等里程、同类货物的运费。这就是美国最初提出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的基本内容。

英国是早复文表示有条件地接受美国这一个建议。这是因为原来占有最广泛侵华权益的英国，到 19 世纪末在中国的地位已经受到俄、德、法、日的损害。而“门户开放”的政策能够使英国借以维护既得利益，也为英国提供了一个和美国协同行动，反对俄国的良好基础。

1899 年 12 月下旬，日本政府也表示了接受美国建议的意向。这除了美国本来就与日本存在亲密关系以外，也是因为日本在“三国还辽”后与俄国利害冲突日益加剧，日本借助“门户开放”政策可以比较容易地向中国尤其

是中国东北地区伸张其侵略势力。

意大利则无保留地表示赞同“门户开放”政策。这是因为它在中国没有取得自己的势力范围，“门户开放”正好帮助它取得想要而未能取得的侵华利益。

德法两国接受“门户开放”原则，是由于他们想插足英国的势力范围。德国不仅声明对“门户开放”没有异议，而且还说德国在远东的政策事实上就是门户开放政策。法国声称，希望享有中国全境内的“平等待遇”。

唯一不乐意接受“门户开放”原则的是沙俄、在列强中，俄国经济实力最薄弱，无力以经济手段同其他强国竞争，所以迟迟不表示赞同。最后在其他有关国家都先后以不同形式表示同意的的情况下、俄国才勉强同意接受。

美国垄断资本的舆论机器，为此大肆宣扬美国在外交上取得的这一“成就”，说它比西班牙战争的胜利更为巨大，称赞它“保护了（美国的）现在的利益，保障了未来的利益，使美国立于一个牢不可破的地位”。然而，这只能是一种空想。

19 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侵华利益而矛盾重重时，“门户开放”政策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妥协方案。此后，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的扩张，也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暂时平衡。

1899 年 11 月 16 日　法国强租广州湾，划云南、两广为其势力范围

1898 年 3 月，德国、俄国先后强占胶州湾和旅顺、大连后，法国以保持“东方均势”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四项侵略要求：

一、中国不得把云南、广西、广东等省让与他国。

二、中国邮政总管由法国人充任。

三、法国修筑自越南至云南昆明的铁路。

四、把中国南部海岸的广州湾（今湛江港）租给法国。

俄国对法国的无理要求表示支持，目的是让法国在华南牵制英国，打破其在中国东南沿海所占的侵华优势。英国则因其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权益遭到侵害，而强烈反对。这样就将清政府置于英国与法俄的矛盾冲突之间，使清政府左右为难。清政府经过认真考虑后，终不敢贸然答应法国的要求，命中国驻法公使庆常与法国外交部进行交涉。但是法国外交部态度十分蛮横，恫吓庆常说：“山东允备借地及铁路数道，法独向隅，议院不平，请派舰重办。所开四事，必须照准……否则不得不筹办法”，强迫清政府代表必须做出满意答复，方肯罢休。同时，法国外交部长阿诺托指示其驻华代办吕班与俄国驻华公使巴布罗福彼此相援，抵制英国的反对。他还威胁清政府说：“中国对待法国的态度已经引起法国的强烈不满，任何拖延都是危险的。”吕班在巴布罗福的支持下，频频到总理衙门催逼。法国还秘密派出 2 艘巡洋舰开赴福州，进行武装恐吓。4 月 9 日，吕班提出了照会底稿，宣称“不准动一字，限明日复”。

在法国的外交压力和武装恐吓下，清政府再次被迫屈服。4 月 10 日，总理衙门交出复照两件。在第一件中，清政府承诺不以租借或其他名义将与越南毗邻的中国诸省地方全部或一部让与他国，从而确认了云南大部、广东一部和广西全部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在第二件中，清政府准许法国自越南边境筑造铁路至昆明；将来中国设立独立的邮政机构时，聘请法国人帮助管理；

广州湾（即雷州湾）租与法国，为期 99 年，租界地范围待查勘后再定。

但是，法国不等两国官员会勘，就于 4 月 22 日擅自派舰驶进广州湾，强行登陆，占据炮台，制造事端，任意扩大租借地的范围，以至进入吴川、遂溪境内。

直到 1899 年 11 月 16 日,广西提督苏元春与法国水师提督高礼睿才正式签订《广州湾租借条约》。该约共 7 款，主要内容是：

一、广州湾租给法国，租期 99 年。

二、租界内全归法国管理，并可设防及驻扎军队。

三、允许法国修筑自广州湾赤坎至安铺的铁路。

这样，中国的广西以及云南、广东两省邻近越南的地区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这 3 个省的领土、主权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

1900 年 6 月 2 日　八国联军入侵，血腥镇压义和团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我国北方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沉重打击了列强在华的统治。因此，列强一开始就叫嚣要用武力镇压义和团。1900 年 5 月 28 日，奥、英、德、法、意、日、俄、美八国一致决定，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进入北京。5 月 31 日和 6 月 2 日，八国的海军陆战队 450 人陆续从天津开抵北京，进驻东交民巷。随后继续向中国增兵，24 艘军舰和 2000 余侵略军向大沽口集结。10 日，八国拼凑了 2000 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的率领下向北京进犯。14 日，西摩尔联军所乘的火车在廊坊车站等处被义和团包围，联军到处受到义和团和董福祥的甘军的袭击，被迫沿北运河向天津逃窜。6 月 15 日，各帝国主义国家舰队司令会议大沽口，议决出兵，发表宣言，助清“剿匪”，以屠杀中国人民，扩大侵华战争。16 日，俄军中尉巴赫麦季耶夫把最后通牒送交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限次日凌晨 2 时交出炮台。罗荣光严正拒绝。17 日凌晨，联军发动猛攻，驻守大沽炮台的爱国官兵奋起反击，终因弹尽而无后援，使炮台失陷。

在八国联军大规模入侵面前，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战”与“和”的对立主张。以端王载漪、庄王载勋为首的一派主张利用义和团抗击列强，竭力主战；以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另一派则主张把义和团镇压下去，不给列强以借口，他们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坚决反对轻下战书和围攻使馆，尤其反对向列强同时宣战。为此，从 6 月 16 日开始连续几天御前会议上，两派唇枪舌剑，展开激烈争论。正当此时，有一偶然事件发生，即慈禧太后得到一份伪造的洋人照会，其中内容之一，是“勒令太后归政”。慈禧闻听勃然大怒，于 6 月 20 日发出宣战诏书，并将反对宣战的立三、徐用仪、许景澄、联元、袁昶等大臣处死。同时，还颁布了正式招抚义和团的上谕。然而，就在清政府宣战后不久的 25 日，慈禧太后就指示荣禄派人与使馆议和。29 日又电令驻外国使臣，向所在国政府解释：“即不自量，亦何至各国同时开衅”，乞求各国体谅，并保证“设法相机自行惩办”义和团。

与清政府对列强乞和的态度相反，京津义和团和爱国清军奋勇抵抗侵略者，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

天津义和团和驻军在大沽失守后，又在紫竹林东面的武备学堂、东局子和老龙头火车站、纪家庄、八里台等处与八国联军展开激烈搏斗。八国联军不断增兵天津，达 1.8 万多人。7 月 14 日，联军用炸药轰塌城墙，清军和义

和团与侵略军展开激烈巷战后，被迫撤出，天津失陷。

在天津保卫战的同时，北京义和团和清军正在攻击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从 6 月 20 日至 8 月 4 日，义和团和清军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 56 天。清政府则对义和团施行借刀杀人的毒计，对使馆区采限名为进攻，实为严加保护的策略，因此义和团终未攻下使馆区。从 6 月 15 日至 8 月 16 日，义和团和清军进攻西什库教堂 62 天，也未能将教堂攻下。

8 月 4 日，八国联军 2 万人，以英、日、美为左翼，俄法等军为右翼，从天津沿运河西岸北犯。虽经义和团和清军奋力抵抗，但由于裕荣、李秉衡先后自杀，军心涣散，致使联军长驱直入，于 13 日直抵北京城下。当日夜，俄军抢先进攻东便门。14 日，北京陷落。15 日凌晨，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和少数亲信臣仆仓皇逃离北京。

八国联军大举入侵，使灾难深重的祖国，再次遭到空前的大屠杀、大洗劫。八国联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1900 年 7 月 17 日　沙俄入侵东北，制造海兰泡等血案

在义和团反帝斗争爆发后，沙皇政府借机加紧策划占领我国东北的阴谋。1900 年 6 月，沙皇政府主要决策人、财政大臣维特、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密谋，要把满洲变成俄国的一个省。库罗巴特金狂叫：必须利用这个机会，夺取中国的东北三省。7 月 6 日，沙皇尼古拉二世亲任侵略军总司令，库罗巴特金为参谋长，动员邻近我国的几个军区共 17.7 万多人的兵力，组成 5 个军。从 7 月 9 日开始，沙俄侵略军以保护正在建筑中的东省铁路为幌子，分 6 路大规模入侵我国东北地区。到 1900 年 12 月中旬，东北三省各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都被沙俄侵略军占领。沙俄除大量派兵参加八国联军血腥镇压义和团，在京、津一带烧杀掠夺外，还在一天之内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两起骇人听闻的大血案。

海兰泡位于瑷珲（今爱辉）对岸，是中国人世代居住的村镇。1900 年 7 月 16 日，全副武装的沙皇军警把海兰泡几千名中国居民驱赶到警察局，并洗劫了他们的住宅和所开的商店。次日，在沙俄阿穆尔地区的军事总督和政府头目指挥下，100 多名武装军警以押送这批中国人回国为名，把他们押往黑龙江边，途中凡摔倒或走不动的都被砍死或枪杀。到了江边，沙俄军警把这些中国居民赶入水流湍急的黑龙江中。这时一队俄国骑兵赶来，也参加了这场大屠杀。他们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有的被杀死在岸边，轻伤或未伤者被投水溺亡，最后游过江的仅 80 多人。在其后的几天里，沙俄又连续屠杀中国居民 3 次。到 1900 年秋，据盛京副都统晋昌的奏折估计，世代居住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人，被枪毙、水淹、火焚的不下 20 余万。

沙俄侵略者还在 7 月 17 日血洗了江东六十四屯。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左岸，从精奇里江口往南到霍尔莫勒津屯的一段土地。这里聚居着 2000 多户汉、满、达斡尔等族的中国居民，共有 1 万多人，历来属瑷珲副都统管辖。1858 年《瑷珲条约》曾明文规定：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在这里“永远居住”，仍由中国官员管理，俄国人“不得侵犯”。但从 7 月 17 日开始，俄国侵略军几次冲进这块中国领土，大肆砍杀居民，抢劫财物。在这场洗劫中，江东六十四屯惨死 7000 多人，损失财产合 300 多万银元。8 月中旬，俄国侵略军悍然宣布江东六十四屯归俄国管辖，不准已经逃离的中国居民重返家

园。中国人民祖祖辈辈在江东六十四屯辛勤开垦的肥沃土地，就这样被沙俄强行霸占。

除此之外，入侵中国东北各地的沙俄侵略军，还到处烧杀掳掠，制造了一系列惨案。在瑷珲，沙俄侵略军屠杀了 1500 人，还纵火焚城，火光冲天数日不熄。这座具有 200 多年历史的古城，几天内就成了一片废墟。在哈尔滨，沙俄侵略军见村就放火，见人就杀，城内居民数千人死于屠刀之下，葬身于火海之中，得以逃生者不过几百人。在牛庄，侵略军挥舞马刀在逃难的人群中来回砍杀，直至昏暗的夕阳西下才丢下几千具尸体回营。据不完全统计，仅入侵瑷珲、珲春等黑龙江、吉林两省重要城镇的沙俄侵略军，就屠戮了数万名中国百姓。

沙皇政府妄图使对中国东北的军事占领合法化，以便最终实现其建立“黄俄罗斯”的迷梦，便胁迫清朝盛京将军增祺派出已经革职的道员周冕为代表，到旅顺同俄国代表谈判。11 月，俄国代表强迫周冕在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上画押。按照这个“章程”，中国在这个地区的主权全部丧失，奉天名存实亡。

1900 年 8 月 14 日　八国联军施暴行，北京全城遭血洗

1900 年 7 月 14 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对天津大肆洗劫。在一个月后，八国联军又于 8 月 14 日攻占北京。随后就在北京城内疯狂屠杀义和团民，仅在庄王府一处就屠杀。烧死 1700 多人。

这些侵略军时而横行街衡，时而溜串巷口，时而夺门闯入民家，无恶不作，凶暴肆虐，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什么地方，凡是遇到中国人就枪击。例如，一队法军胁迫一批逃难的百姓走进一条死胡同，然后用机关枪扫射达 10 至 15 分钟，直至一人不留为止。皇城之内，常有一家十几口被拉出以连环枪杀。以致横尸满地，人皆踏尸而行的惨景。在皇城以外，屠戮情状更为凄惨，百家之中，保全的不过十室。当时有人用诗句记下这些惨状：“京内尸积遍地，腐肉白骨路横”。这是对八国联军在北京所施暴行的真实记录。

在侵略军的血腥屠杀下，无数中国人被逼上了自殒的绝路。有的闭门自焚，有的全家自殉，有的被逐走投无路自尽。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王公职官阵亡将校 640 人，阖家引火自焚、仰药以殉、投井而殁者 1798 人。普通百姓死难人数之多，便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八国联军还对北京的官邸府院、寺庙民宅、城垣宫苑、乃至档案图书等进行焚烧和破坏，以致把殿宇巍峨、金碧辉煌的北京城变为处处颓垣断壁的荒城。

在烧杀破坏的同时，八国联军还大肆进行劫掠。八国联军总司令部下令，特许侵略军在北京抢劫 3 日，实际上公开抢劫了 8 天。参与抢劫的除侵略军的军官、士兵外，外交官、传教士，甚至部分侨民也加入了抢劫的行列之中。直到八国联军撤出北京，这种野蛮行为才终止。皇宫、颐和园、三海、坛庙、陵寝、王公府第、各部衙署，直至店铺民房，无一例外地遭到侵略者的抢劫。典章册籍、珍本图籍、稀世文物、字画碑帖等珍奇国宝，甚至妇女的簪花、耳佩首饰，无一不遭到抢劫。事后，经内务府清点，仅在宫内丢失秘籍、古版善本图书就有 20 多种，丢失宝物 2000 余件。其实宫内被劫的各种宝物珍藏的数目，是无法查实的；至于宫外以至民居、商号、店铺所受的损失，其

详细数字永远也不能查清。

各国侵略者通过对北京的大洗劫，掠夺了无数赃物。除了一部分上交本国政府（如日本仅银两一项，交给中央金库的就有 192.8571 万两，占总数的 66%；英军抢劫了北京喇嘛庙中的最好的古钟以及数十尊精美的古铜佛像，寄给英国女王；德军和法军把瓜分古观象台的古天文仪，给自己国家博物馆保存）外，其余赃物都归掠夺者所私有。他们将其中的一部分或自己带回，或托别人带回，或者寄回。俄军司令利涅维奇从北京带走 10 大箱贵重物品；法军司令福里将 40 箱贵重物品寄回本国；日本联队长栗屋大佐从中国带走的行李有 31 件之多。1902 年 2 月，在他家还搜查出应该上交而未上交政府的 500 两、100 两、50 两及 1 两的银元宝共 80 个，银块大小 27 块，还有许多珍贵文物。其余无法带走的赃物，侵略强盗竟然厚颜无耻地到处公开设摊兜售。据目击说，在市场上拍卖之物以瓷器、玉石、古玩、古铜器为最多；其次则为丝货、绣货、皮货、铜瓶、红漆物品及银器、元宝等。上等精美物品，无所不有，而且价钱低廉。这些物品都落入各国商人手中，辗转流往国外。

1901 年 9 月 7 日　为“结与国之欢心”，与 11 国签订《辛丑条约》

早在北京陷落之前，慈禧太后为了勾结帝国主义以对付义和团，就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从广东进京与列强谈判。8 月 24 日，慈禧发布上谕，命李鸿章会同庆亲王奕劻迅速办理“和局”。慈禧太后为求得帝国主义列强对她的“宽恕”，于 9 月 7 日发布“剿匪”上谕，正式宣布“痛剿”义和团。9 月 25 日，又宣布惩办放任义和团的载漪、载勋、刚毅、赵舒翘等亲贵重臣，并加派亲英国和日本的刘坤一、张之洞参与谈判。12 月 24 日，11 个国家（除武装入侵八国外，还有比利时、西班牙、荷兰）联合提出《议和大纲》12 条。逃亡在西安的慈禧太后见“大纲”并未把自己当作“祸首”惩办，喜出望外，马上表示“立即照准”。慈禧太后这一系列作法，就是向帝国主义列强表示“悔过”。帝国主义各国终于决定，仍然让她继续维持这个“懦弱”的清朝政府。

实际上，议和谈判活动不是在奕劻、李鸿章与列强代表之间，而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进行的。仅就“惩凶”、“赔款”等问题，列强之间就争吵了近 1 年，直到基本上满足了各自利益要求之后，在 1901 年 9 月 7 日，奕劻和李鸿章才代表清政府与英、法、日、俄、德、美、意、奥、西、比、荷十一国的代表在最后议定书上签字。因为这一年是农历辛丑年，所以议定书被称为《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正约 12 款，附件 19 个。主要内容包括：

一、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 4.5 亿两，分 39 年付清，加上年息 4 厘，共达 9.8200 亿两。此外，还有地方赔款 2000 万两，总数超过 10 亿两。这项赔款史称“庚子赔款”。条约规定，清政府以“关余”、“盐余”和“常关税”作为担保。

二、准许各国在北京以及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沿线的 12 个战略要地派兵驻扎；大沽炮台以及从大沽到北京沿线的炮台，一律削平；天津周围 20 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帝国主义侵略军由此完全控制了京津地区。

三、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辟为“使馆区”、各国可在使馆区内驻兵，而中国人一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使馆区成为事实上的“国中之国”。

四、清政府惩办“首祸诸臣”。最后被认定要判罪的共 96 人，分别被判处死刑、终身监禁、革职抄家到永不叙用等刑罚。今后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具有反帝性质的组织。“违者皆斩”。清朝地方官吏所属境内如再有所谓“违约行为”，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五、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六、清政府派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谢罪”，并为被杀德国公使克林德建立牌坊，对被杀日本外交官杉山彬“用优荣之典”。

《辛丑条约》的订立，使帝国主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大大加强了对中国的统治。第一，设置特殊性质的使馆区，使外国公使团完全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第二，清政府担保严禁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第三，巨额赔款，加上以海关、常关税、盐税等重要税收作为支付赔款手段，使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了中国财政、第四，允许外国军队驻扎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战略要地，使清政府完全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刺刀监护之下。第五，提高清政府外交机构的地位，使其更加适合帝国主义向中国勒索权益、发号施令的需要。对于这个使中国主权丧失殆尽的卖国屈辱的条约，清政府全盘接受下来。慈禧太后还在批准《议和大纲》时，不知羞耻地说：今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决心充当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奴才。这一切表明，清政府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变成了“洋人的朝廷”。因此，《辛丑条约》的订立，标志着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04 年 2 月 6 日　日俄在中国开战，东北人民惨遭横祸

《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争夺远东问题上的矛盾加剧了，其中特别是日俄间矛盾日趋尖锐。当时俄国认定“满洲完全归俄，朝鲜不全归日”。而日本则坚持“朝鲜归日，满洲基本归俄”，各不相让，谈判决裂，最后只有用武力来解决。

日本为了取得对俄国的军事胜利，与沙俄的大敌英国结盟，美国也公开发出备忘录，反对俄国独占东北。在此情况下，沙俄不得不做出姿态，表示接受中方提案，并于 1902 年 4 月 8 日与中国签订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条约规定，从订约日起，俄军分 3 期撤出东三省，一年半撤完。然而沙俄并不甘心放弃它的“黄俄罗斯”计划，仍在东北三省攫取产业租让权，控制经济资源，扩展以东省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势力，在东北实行赤裸裸的军事殖民地统治。因此，对沙俄是否撤军，就成为当时举世关注的焦点。第 1 期撤军如约完成，但到第 2 期撤军期限满 10 天后，沙俄变卦，并向中国外交部提出 7 点照会：强调中国不得将所还地区让与或租给他国，中国政府不能在东北三省增开商埠，增设领事等，实质上是不容别国插足，所排斥的对象明显地指向日、英、美三国。这是沙俄政府准备单方面毁约的信号，中国方面断然拒绝俄方照会。

5 月 20 日，沙皇政府提出其在远东的“新方针”：停止撤军，关闭满洲门户，插足朝鲜。8 月 12 日，又下令设立远东总督府。这就促使日、英、美结成反俄阵线。9 月 6 日，沙俄驻华公使提出延期撤兵，日本警告中国政府不能接受。9 月 8 日，第 3 期撤军期满，沙俄不但没撤军，反而增兵东北，强化旅顺的军事设施。

此后，日俄从 1903 年 7 月至 1904 年 2 月，进行了多次谈判，均无结果。2 月 6 日，日本突然袭击旅顺口的俄国舰队，日俄战争正式在中国领土上爆发。日俄无理要求中国必须严守“中立”，不准中国人民反抗。清政府置国家主权与东北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竟于 12 日宣布严守“中立”，并把辽河以东地区划为交战区。

日俄战争分海战和陆战两大战场。海战主要集中在旅顺口及其附近海面上进行；陆战主要集中在旅顺、辽阳、奉天 3 处进行。战争进行长达 19 个月，最后以俄国失败而告终。

这场以中国领土为主要战场的日俄战争，使东北三省的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主权惨遭蹂躏。战争爆发后，沙俄侵略者以东三省的最高统治者姿态出现。俄国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要求盛京将军增祺：地方政务应守俄国训令，俄国有撤换中国地方官之权，捐税等项须缴俄国政府，所留中国军队应受俄国调度。日军战胜俄军后，同样以征服者的姿态凌驾于中国人民之上，对其任意摆布和驱使。第二，使东北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涂炭。在战争中无辜百姓伤亡无计其数，仅辽阳战役中就伤亡 4 万人，与日俄伤亡人数相等。财产损失更加难以统计。第三，东北富饶的自然资源惨遭侵略者劫掠，受到严重破坏。总之，日俄战争给东三省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据盛京将军粗略统计，东北人民死于战火约 2 万人，财产损失 6900 万两。显然这是个大大缩小了的估计数字，不是东北人民的全部损失，其实际损失当远远超过这个估计数字。

更为严重的是，1905 年 9 月 5 日，日俄帝国主义还背着中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严重践踏和侵犯了中朝两国的领土和主权。条约规定，我国东北北部由沙俄继续霸占，南部则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这再一次说明，日俄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是中国，受害最严重的是中国人民。

1904 年 8 月 3 日　英军侵占拉萨，逼签《拉萨条约》

英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日俄交恶的机会，控制我国西藏地区。1903 年 8 月，英国派遣麦克唐纳指挥一支侵略军，“护送”使节荣赫鹏等入藏“谈判”。侵略军从亚东入境，打退藏军阻击，占领帕里，随即进驻干坝。12 月，英军大举进攻，西藏地区军民英勇抵抗。1904 年 5 月，英军占领江孜宗（县）政府。西藏军民主动出击，夺回宗政府，并坚守宗政府所在的山头。在武器落后及弹药不足的情况下，西藏军民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坚持战斗达 1 月之久。8 月 3 日，英军侵入拉萨，烧杀淫掠，极为残酷，大批珍贵文物被劫走。

拉萨失陷后第二天，接替裕钢为驻藏大臣的有泰，竟丧失民族气节，卑躬屈膝地到英军驻地慰劳英军，息兵求和。8 月 12 日，英方代表团团长荣赫鹏向有泰提出 8 项议和条件。当时达赖十三世出逃，接收印章的罗桑坚赞以及噶伦等西藏官员，由于对英国侵略者十分痛恨，不肯承担责任，拒绝与其交涉。英方一方面害怕冬季将至，大雪封山，交通困难，给养断绝；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在没有取得条约文据的情况下撤离西藏。于是再次向西藏地方官员施加压力。9 月 1 日，荣赫鹏恫吓罗桑坚赞等人，声称再不允从，便每日增加赔款 5 万卢比。9 月 7 日，罗桑坚赞等人被迫与荣赫鹏在布达拉宫签订了《拉萨条约》。

《拉萨条约》共 10 款，主要内容是：

一、除亚东开埠外，增汗江孜、噶大克为商埠，英国在商埠派官员监管。

二、向英国赔款 50 万英镑，分 75 年付清，赔款未付清前，英国以驻兵春丕作质。

三、自印度边界至江孜、拉萨的炮台、山寨一律削平，并将有碍交通的军事设施全部撤去。

四、非经英国同意，西藏土地不得让卖、租与他国；西藏一切事宜无论何国皆不得干涉；无论何国皆不得派员或代理人进入西藏；铁路、道路、电线、矿产等项利权均不许外国享受；西藏各进款、货物、钱币等，不许给予外国抵押拨兑。

所谓《拉萨条约》，是英帝国主义撇开清政府，而直接强迫西藏地方当局非法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它企图把西藏地方从中国版图里分裂出去，使之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帝国主义这种分裂中国领土，破坏中国主权的罪恶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全国人民特别是西藏人民的坚决反对。清政府感到，所谓《拉萨条约》“有损主权”，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命令驻藏大臣有泰坚决拒绝签字，要他“切勿画押”，并指斥英国侵略者不应无视中国主权而径直与西藏地方当局“立约”。英国则急于迫使清政府承认《拉萨条约》，要求清政府进行谈判。1905 年初，清政府派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为钦差全权大臣，率参赞张荫棠、梁士诒等赴印度谈判。唐绍仪指出，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订立条约是侵犯中国的主权，因此这个所谓的“条约”根本无效，而应由中英二国政府重新议约。英国代表辞穷，不得不接受以重新议约作为双方进行谈判的先决条件。但在谈判中，英方代表却故意制造出所谓“宗主权”的谬论，企图否认中国对西藏地方的领土主权。唐绍仪等严辞驳斥了英方的谣言和诡辩，坚持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干涉和侵犯。双方谈判达 10 次之多，仍无结果。唐等返回北京。1906 年 4 月，清政府再派唐绍仪等与英国驻华全权公使萨道义在北京继续谈判，并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6 款，将原来的《拉萨条约》10 款作为附件。英国虽然将《拉萨条约》中的许多侵略权益保留下来，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规定：英国不占并藏境和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但中国亦应允不准他国干涉。除中国享受西藏领土主权以外，其它国家不得享受。

英国终于在事实上确认了中国对西藏的领士主权，使它企图分割中国领土西藏的阴谋没有得逞。

1905 年 9 月 5 日　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日俄强行分割东北三省

1904 年 2 月 6 日俄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得到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使得俄国在陆战和海战中均告败北，日本遂在这场战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由于日本缺乏资源，经济基础薄弱，同样也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于是，在日俄两国彼此付出高昂战争费用、双方都厮杀得精疲力尽之后，不得不又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在美国总统罗斯福出面“调停”下，日本任命小村寿太郎、高平小五郎，俄国任命维特、罗森为全权代表，于 1905 年 8 月，在美国的朴茨茅斯开始议和谈判。

在日俄正式谈判之前的 7 月初，清政府曾分别向日俄及其他各国声明，日俄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涉中国之事件，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承认。清政府还一度想参加和议，因遭到日俄双方反对而被排斥在和谈之外。日俄

在议和期间，无视中国的主权和中国的存在，根本不同中国商议。在近一个月的谈判中，背着中国政府随意分割中国东北的领土和利权，大肆侵略中国。最后，日俄双方达成协议，于 1905 年 9 月 5 日，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

日俄《朴茨茅斯条约》正约 15 款，附约 2 款，其中涉及破坏中国主权的有：

一、沙俄承认日本在朝鲜（原与中国存在“宗藩”关系）享有政治、经济及军事特权，俄国不得干涉。

二、俄国将从中国取得的旅顺、大连湾（包括附近海面）的租界权及其附属特权，无偿地转让给日本。

三、俄国将库页岛（本来属中国，后被俄国侵占）北纬 50 度以南割让给日本，并同意日本人可在俄国沿岸的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经营渔业。

四、俄国将其所获之中国的长春（宽城子）至旅顺间的铁路（后来称为南满铁路）及其支路、利权、煤矿等，无偿地转让给日本。

五、日俄双方在各自的铁路沿线驻扎护路军警，每公里不超过 15 名。

日俄《朴茨茅斯条约》是完全背着中国签订的，严重践踏和侵犯了中朝两国的领土和主权。中国的东北北部为沙俄继续霸占，南部则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使中国东北三省由沙皇俄国独霸而变成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分别霸占的局面。美国原想收买日本夺取南满铁路，将其侵略势力伸入东北，由于日本坚决反对，它的侵略企图未能实现。

自日俄签订《朴茨茅斯条约》以后，日俄两国由武装对抗逐渐变成互相利用、共同侵华的协调关系。沙俄由于在日俄战争中遭到惨败，对在远东与英日争雄已感力不从心，而且担心日本趁战胜之机重新挑起战争，完全取代俄国在远东的霸权地位，因此被迫谋求暂与英日妥协，及时调整与日本的关系。日本虽然获胜，但也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无力再战。为了实现其控制中国东三省南部和朝鲜的目的，也谋求与俄国妥协。所以此后，在 1907 年、1910 年、1912 年、1916 年经过多次谈判，签订了 4 次日俄联合宰割中国的《日俄密约》，使中国主权受到严重侵犯，带来无穷祸害。

1905 年 12 月 22 日　日本独占东三省南部，逼签有关“东三省事宜”条约

日俄《朴茨茅斯条约》签订后，日本为了使清政府能够完全接受该条约中的有关条款，并乘势攫取新的侵略权益，派小村寿太郎和驻华公使内田康哉为代表，从 1905 年 11 月 17 日开始，与清政府代表奕䜣、瞿鸿　、袁世凯进行谈判。这次谈判历时 35 天，共举行 22 次会谈，最后于 12 月 22 日，在北京正式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

该约正约 3 款，附约 12 款，两约的主要内容有：

一、清政府承认日俄《朴茨茅斯条约》中给予日本的各项权利。

二、允许开放奉天的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吉林的长春（即宽城子）、吉林省城、哈尔滨、宁古塔（今宁安）、珲春、三姓、黑龙江的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共 16 处为商埠。

三、设立“中日木植公司”，允许日本在鸭绿江右岸地方采伐森林。

四、日本得继续经营战时擅自铺设的安东（今丹东）至奉天的军用铁路，至 1923 年届期估价卖给中国；吉长铁路由中国自行筹款建造，但资金中的一

半要向日本国借贷。

五、日本得在营口、安东和奉天划定租界。

这就不难看出，日本通过《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从中国获得了远比《朴茨茅斯条约》所规定的更多的特权，进一步扩大了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权益，进而将东三省南部视为其独占的势力范围。

此后，日本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其在东三省南部的侵略势力，又依据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在中国领土上成立“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设置关东都督府，作为它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满铁公司成立于 1906 年 11 月 26 日，总公司先设在东京，后改设在大连，东京改为分公司。该公司的主要人事和业务活动都要听命于日本政府，日本政府规定其主要职能为：第一，经营东三省南部的所有铁路；第二，在满铁经营的铁路各大站兴办旅客食宿、贮存货物等各种事业，在铁路所及的各个港湾兴办水陆联运事业，并经营附属事业，包括开矿、水路运输、电气事业，代销铁路运货、铁路附属地上的土地及建筑事业等；第三，对上述各铁路及附属事业地界内拥有行政管理权，经日本政府许可可以兴办土木工程、教育、卫生事业，以及向这些地界内居民征收捐费。

关东都督府是效仿俄国远东总督府而设立的。关东都督府设在旅顺，成立于 1906 年 10 月 18 日，由日陆军大将大岛义昌任都督，“满铁”公司总裁兼任都督府顾问。都督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和军事权，并有“保护和监督南满路线”、监督“满铁公司各项事务”之权。

关东都督府和满铁公司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直接侵略和掠夺的重要机构。关东都督府是日本对旅大租界地实行殖民统治的最高统治机构；满铁公司则是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全面侵略扩张的一个有力工具。

1911 年 5 月 20 日　列强争向中国铁路借款，逼签《粤汉川铁路借款合同》

铁路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重要工具，因此，争向中国铁路借款成为他们矛盾斗争的焦点之一。自 1896 年英德对津芦铁路借款起，帝国主义列强迫使清政府向铁路借款便接连不断。

粤汉、川汉铁路是中国西南和华南两大干线，英、法、美、德等列强窥伺这两条铁路，要求承办已非一日。但是，湘、鄂、粤 3 省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主权异常强烈。1905 年 8 月，清政府不顾绅商反对，强行收回了粤汉铁路原有 3 省绅商筹款自办权。于是，收回路权的斗争达到高潮。但是清政府为了偿付美国合兴公司勒索的“赎款”，一时又筹措不及，只得向英国汇丰银行暂时借款。这样，又给外国资本再次渗透在中国铁路借款打开了缺口。不久，德国财团首先与清政府代表，在 1909 年 3 月 9 日，签订了 300 万镑的借款草合同。英国和法国遂之加入，于同年 7 月 6 日，由德华银行、英商汇丰银行、法商东方汇理银行组成的三国银行团，在北京与清政府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借款草合同》（简称《湖广路借款草合同》）。借款总数达 550 万英镑，其中 250 万英镑作为建造湘鄂境内粤汉路资本，250 万镑作为建造鄂境川汉路资本，另外 50 万镑，则作为赎回前美国合兴公司代清政府所发售、而未赎回的修筑粤汉铁路金元债票之

用。

美帝国主义对粤汉铁路和鄂境川汉铁路落入英、法、德三国银行团之手，很不甘心。它抓住 1903 年与奕䜣交涉中的片言只语，以当年清政府曾答应中国修筑川汉铁路“如资金不足时”，“当向英美两国公司商借”为根据，先后照会英国政府和清朝政府，要求遵守“诺言”，允许美国资本家参加此项即将成立的借款。当时张之洞比较倾向维护英国利益。不让美国插手粤汉路。为此，美国总统塔虎脱便亲自致电摄政王载沣，对张之洞等人的态度“深表不安”；同日，美国国务卿诺克斯也向清政府发出严重警告。在美帝国主义压力下，清政府被迫答应借款增加到 600 万镑，美国可占川汉路借款额的半数，即 150 万镑。但美国坚决不同意，便派遣银行代表积极与英、德、法三国银行代表进行会商。后来，由于英国有意削弱德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转而决定与美国合作，同意了美国的原则。但就在这时，张之洞病死（1909 年 10 月），交涉一度中止。到 1910 年 5 月，四国银行团代表聚集巴黎，达成四国向清政府均分借款正式协定。这个协定，是照美国的主张，投资于川汉路部分不限于鄂境路段，也包括从宜昌到成都的 1600 公里的川汉线。

四国银行团达成协议以后，便三番五次地催促清政府从速签订包括四川境内川汉路段前议的湖广路借款合同。由于中外反动派早已取得一致，于是清政府不得不于 1911 年 1 月补授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让这个滥借外债和出卖路权的老手，与四国公使就借款合同的细节，进行最后一轮磋商。清政府为了出卖路权，仍坚持借款筑路。于 5 月 18 日，宣布粤汉、川汉两条干路“收归国有”。5 月 20 日，清政府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代表，在北京正式签定《粤汉川铁路借款合同》，全称为《湖北、湖南两省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简称《湖广铁路借款合同》。

该合同共 25 款，主要规定有：

一、借款 600 万英镑，95 折付款，年息 5 厘，40 年还清。

二、以铁路收入和湘、鄂厘金、盐税、赈粜（tiào）捐作抵押。

三、四国银行团享有湘、鄂境内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以后铁路延长，四国银行团有继续借款修筑的优先权。

清政府以铁路国有为名，出卖川、鄂、湘、粤四省已集股兴工的粤汉、川汉铁路权利的行为，激起强烈民愤，四省人民纷纷反对，掀起了保路运动，促成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1912 年 1 月 30 日　列强趁中国内战，完全窃夺关税权

武昌起义爆发后，当时的清海关代理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乘混乱之机，借口中国关税已经作为庚子赔款作了抵押，将爆发革命的各口岸关税置于其统辖之下，使之专用于偿还外债。同时，又提出要将未爆发革命的各口岸关税全部由其保管经营，企图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安格联的主张得到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即将被推翻的清政府也被迫同意。安格联很快拟定了 4 条办法，主要是：将各关税款一律交各关税务司转寄上海汇丰银行总税务司帐下；各国公使选派人员组成外国银行委员会，商定各项外债偿还次序，由总税务司按顺序付还。

1911 年底和正 912 年初，上海各国银行总董会和驻华外交团分别进行了讨论。安格联又综合各方意见，拟定了关于中国关税 8 条办法，其主要内容

是：由与 1900 年以前以关税为担保而尚未付清的借款有关的各银行和庚子赔款有关的各银行总董，组成各国驻沪银行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决定并编列各项外债付还之先后次序单；海关总税务司应使各处将净存税款每周汇交上海 1 次，并尽可能使其平均分存于汇丰、德华、道胜三家银行；上海税务司负责按银行委员会所决定的付还次序单依次偿还；银行委员会每 3 个月就所收关税的拨付情况提出报告给北京外交团等。外交团和清政府分别于 1 月 30 日和 2 月 3 日，向组成驻沪银行委员会的九家外国银行和安格联发出指示：将上述办法付诸实施。

由于此办法的实施，使总税务司获得统辖全部关税的大权，故使外交团对中国关税的干预合法化。从此，中国关税从征收到付出均脱离中国人之手，而归于总税务司、三家外国在华银行和驻沪银行委员会掌握，致使中国关税权完全落入列强之手，成为帝国主义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个新枷锁；而列强则利用其对中国关税的控制权，操纵了此后的北京政府的财政，进而左右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

1913 年 4 月 26 日　列强“善后大借款”，进一步控制中国财政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成立以后，国库空虚，而整顿秩序、遣散军队、偿还积欠外债和赔款、兑现对清室优待条件等善后问题，都亟需支付大量款项。然而，在当时要筹措大量款项，除向帝国主义列强举借外债之外，别无办法。向帝国主义银行团借款之议，始于唐绍仪内阁时期。但帝国主义银行团提出的借款条件过于苛刻，未能达成协议。到了赵秉钧内阁时期，财政总长周学熙继续与五国银行团进行借款交涉。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袁世凯为建立独裁统治，筹备战争经费，竟然出卖国家权益，于 1913 年 4 月 26 日指派赵秉钧、陆征祥、周学熙等人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二十一款”，借款数目为 2500 万英镑。借款的担保有三项：

一、中国盐务收入的全数。

二、关税中除应付款项外的余款。

三、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税款。

借款合同的附件还规定：该款用于中国政府偿还到期外债、裁遣军队、整顿盐务和行政费等项。这项借款还附有政治性的压迫条件，这就是：

一、将来以盐税担保而借款，或与此款相同用途的借款，银行团有优先权。

二、在审计处设洋稽核员，凡关于借款款项的领款凭单，须由洋稽核员会同签押。

三、在盐务署内设稽核总所，除中国总办外，有洋会办一员，共同主管所有发给引票，汇编各项收入的报告及表册各事。凡稽核总所系统的华、洋人员的任免，由华、洋总、会办定夺。盐务进款存于指定银行，非有稽核总所、总、会办会同签字的凭据，不能提用。

这项借款年息 4 厘，47 年还清。47 年的利息共合 4285 万英镑，本利合计 6785 万英镑。这就是说，袁世凯政府借款 2500 万英镑，要付还 6785 万英镑，且附有上述苛刻的政治性条件，以及将中国盐务出卖给帝国主义。不难看出，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是完全卖国的借款。实际上袁世凯政府并没有拿到 2500 万英镑借款，因为当时发行价格为 9 扣，实收 85 扣，这样袁

世凯政府仅得到借款 2100 万英镑。如果再扣所借给的其它款项 600 万英镑，加上各省向五国银行团所借的 280 万英镑，以及赔偿革命期间各国“损失”款 200 万英镑，那么袁世凯政府最后真正拿到手的借款只不过 1000 万英镑，为借款的 40%。

“善后大借款”未经国会议决，因而激起国会参、众两院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参议院正副议长张继、王正廷通电反对这项借款，表示“惟有死力抵抗，誓不承认”。参议院还正式咨文袁世凯，声明“对于政府所定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认为未经临时参议院议决，违法签字，当然无效”。国民党参、众议员也通电宣布：众议院“特开会议，对于五国银行团善后借款案多数否决，……绝不承认”。孙中山致电各国，指出：袁世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与五国银行团缔结 2500 万镑之借款，以破坏约法”，“请求各国政府、人民设法禁阻银行团，俾不得以巨款供给北京政府。”黄兴及湘、赣、皖、粤四省都督联名通电，指斥这项借款的违法，抨击袁世凯政府“私借巨金，弁髦议会，附件内容，均未宣布”；“私借外债，许外人以监督财政等”。但是，财政部通电否认大借款违法。黎元洪副总统也为大借款辩解。袁世凯还亲自出马威吓反对借款者，训斥湘、赣、皖、粤四省都督，并指使北洋军阀头目斥责国会反对借款是“不顾大体，无理取闹”。这样，在反动势力的压迫下，反借款浪潮被平息下去。

“善后大借款”，是辛亥革命后最大的丧权辱国条约。通过这个条约，帝国主义列强继完全控制中国海关权之后，又控制了中国重要税收之一的盐税，使中国的财政进一步置于列强控制之下，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受到空前的损害，也给中国人民带来极沉重的经济负担。而袁世凯利用这笔借款，扩充了自己的军事力量，用于镇压“二次革命”，以巩固其专制独裁统治，把中国社会进一步推入灾难的深渊。

1913 年 11 月 5 日　沙俄策划外蒙“独立”，逼签《中俄声明文件》

沙俄趁清末政局动荡之际，加紧了对我国外蒙古地区的侵略活动。它利用各种手段收买、培植亲俄势力，颠覆外蒙古的中国地方政权。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竟公开策划外蒙“独立”，企图将其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1911 年 11 月，沙俄与外蒙库伦当局非法签订了变外蒙为其殖民地的《俄蒙协约》，引起中国强烈反对。此后，北京政府向俄国提出抗议，要求废除这个条约。1912 年 11 月 26 日，中俄就外蒙古问题，由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奇与中国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正式进行谈判。由于沙俄无理要求中国政府接受《俄蒙协约》及附约，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因而谈判进行了达半年之久，直到 1913 年 5 月 20 日，才达成 6 条协议：

一、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尊重中国历来所有的各种权利。

二、中国同意不改变外蒙古自治制度，并许其有权成立军队和设警察，非蒙古人不得向外蒙移民。

三、俄国允许除领署及其卫队外，不向外蒙派官、殖民。

四、中国声明接受俄国调处。

五、中国同意俄人享有俄蒙商务专条所规定的权利。

六、今后俄国与外蒙古之间订约，须先经中国政府许可。

该协议，实际上使本属中国内政问题国际化了，为沙俄干涉对中国内政提供了条约依据。协议第 6 条中的“今后”二字，是对《俄蒙协约》的默认。因此，该协议在交付参议院审议时，遭到占参议院议员多数的国民党议员的坚决否决，陆征祥因此被迫辞职，中俄交涉一度中断。

在袁世凯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之后，9 月 18 日，中俄继续谈判。经过袁世凯政府外交总长孙宝琦与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的谈判，11 月 5 日，中俄双方代表正式签订了《中俄声明》及《声明另件》。

《中俄声明》规定的主要内容有：

一、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

二、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

三、中国承认外蒙古有自行办理其内政及一切工商事宜的专权，中俄均不在外蒙古驻军及移民。

四、中国接受俄国的调处。

五、按照本声明和《俄蒙商务专条》明定中国与外蒙古的关系。

《声明另件》的规定是：

一、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二、关于外蒙古的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同意与俄国政府协商，外蒙古当局亦得参与，另议地点召开中、俄、蒙三方会议。

三、外蒙古自治区域，以前清驻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的辖境为限。

由于袁世凯宣布解散国民党，取消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资格，致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行使否决权。名为《中俄声明文件》，实为中俄签订的正式条约。它使中国在外蒙古的主权受到严重损害，只剩下一个名义上的宗主权；而沙俄以扶植外蒙古傀儡政权来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并为此后其进一步侵略外蒙古提供了条约根据。也为其它帝国主义采取类似方式侵略中国，开创厂一个恶例。

1914 年 3 月 24 日　英即擅划“麦克马洪线”，肆意侵吞我国大片领土

英帝国主义妄图把我国西藏变为它独占的殖民 地，可说是蓄谋已久。1911 年春，在英国引诱下，达赖叛逃印度，投入英帝国主义的怀抱。为此，清政府下令革除达赖的名号，但英帝国主义公然对革除达赖名号和清军驻藏提出“抗议”，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武昌起义后，英国唆使达赖派亲信达桑占东等潜回西藏，组织军队发动叛乱，围攻拉萨、日喀则、江孜的川军，并叫嚣“西藏独立、西藏自治、不驻汉官、不驻汉兵”，破坏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1912 年 4 月，中国政府声明：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拒绝承认英帝国主义策划的所谓“西藏的独立”，并于 6 月 14 日派四川督军尹昌衡率领川军入藏平乱。接着，又增派蔡锷所部滇军入藏增援。川、滇两军在川边地区大败叛军，克复数地，达赖叛军纷纷西逃。在达赖傀儡政权即将覆灭时，英帝国主义以“调停”为名进行干涉。8 月 17 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向中国提出 5 项无理要求，主要内容是：

一、不许中国干涉“西藏的内政”。

二、不许中国在拉萨或西藏保持无限制的军队。

三、要求根据以上各点订立协议，作为承认中华民国的条件。

四、协议订立前将对中国人封闭一切经往西藏的交通。

英帝国主义还提出，将西藏代表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参与对西藏问题的谈判。中国政府认为这等于“承认西藏是有主约之权”的“自由之国”，因此不同意西藏有“全权”代表资格，提出可“随同商议”，或中英、中藏分别会谈，分别签约。但英国坚持“无更改之理”，并于 1913 年 8 月 25 日通知中国，无论有无中国代表参加，会议都将在 10 月 6 日举行。

袁世凯政府为了急于得到列强的承认，并在大借款问题的压力下，屈服于英帝国主义，下令川滇两军停止向西藏进军。1913 年 10 月，又明令恢复了达赖的名号，并同意派代表出席在印度西姆拉召开的由中、英、藏三方代表参加的会议，即所谓的“西姆拉会议”，讨论西藏问题。英印外交部长麦克马洪为英方代表，他虽名为居中“调停”，实际一手把持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上他抢先抛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西姆拉条约》草稿和所谓的“西藏地图”，公然把西藏、西康、青海全部地区和云南、四川、新疆、甘肃的藏区都划入“西藏范围”。以金沙江为界把西藏分为“外藏”与“内藏”，江以西地区为“外藏”，完全独立；江以东地区为“内藏”，由“中藏共管”。这个条约草稿还包括以下内容：中国不得驻兵藏境；中国政府与西藏有争议时，由印度政府判决；英人在西藏自由经营商业，中国不得加以限制；西藏内政暂由印度政府监督等等。中国政府拒绝接受这个条约草稿，并正式声明，凡英国同西藏当局本日或他日签订的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予承认。1914 年 3 月 24 日和 25 日，英国代表和西藏地方代表以秘密换文的形式办理了互相承认的手续。

在“西姆拉会议”期间，从来没有公开讨论中印边界问题。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事先或事后均未向中国政府宣布，而且英、藏双方多年未敢公布此事。麦克马洪背着中国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代表在会外秘密换文，划定了一条所谓中印东段边界线，把 9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该边界线以英方代表麦克马洪的名字命名，故称“麦克马洪线”。中国政府当然不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也从未承认过。所以，1959 年 12 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中说：“中国政府认为，所谓麦克马洪线是完全非法的”，“《西姆拉条约》本身就没有法律效力”，“所谓‘麦克马洪线’是一个比《西姆拉条约》更肮脏，更不能见人的东西”。

但印度政府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竟把中印两国传统习惯边界和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的中国领土，作为印度的“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并于 1987 年宣布正式成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对此，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于同年 2 月 21 日发表谈话说：“中国方面已多次严正声明，绝不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和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印度方面企图把殖民主义者炮制的非法‘麦克马洪线’强加给中国人民，那是行不通的。”

1914 年 7 月 17 日　沙俄趁中国政治紊乱，强占唐努乌梁海地区

唐努乌梁海位于外蒙西北部，北枕萨彦岭，南临唐努山，面积 17 万平方公里，盛产金、煤、盐及珍贵的毛皮。在历史上，唐努乌梁海一向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从唐朝起，中国历届政府都在那里设立

行政区。驻扎军队，派官员进行管辖。1727 年中俄签订的《布连斯奇条约》和 1728 年中俄签订的《恰克图条约》，均规定萨彦岭以南的唐努乌梁海为中国领土。清末，这一地区隶属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1860 年以后，中俄签订的《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科布多界约》以及《乌里雅苏台界约》等，都确认唐努乌梁海是中国的领土，并承认唐努乌梁海北端的沙宾达巴哈界碑为中俄的正式国界。

由于唐努乌梁海地区土地肥沃，物产富足，因此沙俄对该地区垂涎已久。从 1862 年起，它就屡借商业活动之名，长期对该地区进行掠夺性贸易，并且擅自开采金矿，进行经济渗透和非法移民。与此同时，还不断派遣“考察队”、“探险队”，到唐努乌梁海进行全面调查，实地测绘，并绘制出具有军事价值的唐努乌梁海地图，作好武装占领该地区的准备。1910 年，莫斯科“远征队”有一部分人在沙俄总参谋部军官波波夫的率领下，曾闯进唐努乌梁海地区进行非法活动。1911 年初，沙俄《新时代》发表文章，公然宣称唐努乌梁海“当属俄境”。沙皇政府外交部还煞有介事地下令“搜集”唐努乌梁海应属俄国的“凭证”。

1911 年武昌起义后，沙俄政府一方面制造外蒙“独立”，另一方面制定了“和平兼并”唐努乌梁海的侵略方针。中华民国成立后，沙俄政府一改“和平兼并”的方针，决定采用武装占领的侵略政策，并加快吞并唐努乌梁海的步伐。1912 年 2 月末，在沙俄指使下，唐努旗总管兼唐努乌梁海大总管贡布多尔济宣布“独立”，并请求沙俄出兵。由于遭到其余各旗的反对，沙俄没有立即强行出兵，而是设立“乌梁海地区边境专号”，在该地区各旗总管等上层人物中大搞威逼利诱活动。1912 年夏，沙俄指挥库伦傀儡政府的军队开进唐努乌梁海，强迫这个地区各旗追随库伦傀儡当局“独立”，脱离中国。沙俄还派出“边疆特使”窜入唐努乌梁海发号施令，阻拦中国政府派官员进入这个地区行使主权。1914 年，袁世凯加紧进行复辟帝制活动，中国政治紊乱。沙俄政府认为时机已到，遂奏请沙皇将唐努乌梁海全部置于俄国的“保护”之下，这一奏请立即得到沙皇的批准。6 月，沙俄政府突然派遣大批俄国侵略军开进唐努乌梁海，强行占领了这块 17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任命格里哥列夫为乌梁海事务长官，兴建贝洛柴尔斯克（今克孜尔）作为行政中心。7 月 17 日，沙俄还无耻地导演了一幕唐努乌梁海“自愿归顺”的丑剧。1915 年，中、俄蒙恰克图会议时，中国代表提出了唐努乌梁海问题，沙俄代表却拒绝讨论。

由于唐努乌梁海在外蒙古以北，北京政府无力跨越蒙古对唐努乌梁海进行干预，致使该地区被沙俄在“保护”的名义下强行侵占了。但是，沙俄侵占我国唐努乌梁海地区，不仅当时的北京政府未予许可，以后历届中国政府也从未声明放弃中国对这一地区的主权。

1914 年 11 月 7 日　日本入侵山东，强行霸占青岛

1914 年，爆发了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双方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一方是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等组成的同盟国；另一方是英、法、俄以及比利时、塞尔维亚等组成的协约国。后来，日、意、美等国陆续加入了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于 8 月 6 日宣告中立，

并宣布“各交战国在中国领土、领海不得有占据和交战行为”，“各交战国之军队军械及辎重品，均不得由中国领土、领海经过”等等。然而，中国政府的中立态度以及上述声明，丝毫未能阻止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早就对中国怀有极大侵略野心的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欧洲列强卷入大战而无暇东顾之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并首先把侵略矛头指向山东。

这次日本侵略山东，是打着对德作战的幌子进行的。在中国政府宣告中立后第3天，日本军舰就出现在青岛海面上。8月15日，日本对德国发出最后通碟，要求“德国军舰立即从日本和中国海上撤退，不能撤退的解除武装”；还要求在“9月15日以前，德国将全部胶州湾租借地无偿无条件交付日本帝国官宪，以备将来交还中国”。以上要求，限8月23日正午前答复。

由于德国对日本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日本便高唱所谓“保卫东亚和平”高调，宣布对德宣战。英国在无法阻止日本进攻山东德军时，为维护其在华侵略权益，也象征性地派遣部分英军参加进攻青岛的军事行动。随即日舰炮轰青岛要塞，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军2万多人从龙口登陆，先占领莱州半岛，接着又强占了潍县车站，并以胶济铁路系德国政府的财产为借口继续沿胶济铁路西进，强占青州、济南车站。11月7日，日军攻占了青岛，驻青岛德军向日军投降。至此，日军在中国境内的对德作战宣告结束，日军完全占领了整个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铁路沿线。

日军对山东的侵略，不但破坏了中国的中立状态，而且在它所过之地任意妄为。日军在占领平度县张贴的布告中，狂妄宣称：“妨碍日军一切行动者处斩。”日军在沿胶济路西进中，威胁中国军队从胶济路撤开，无理宣称：“若有冲突，日本将认为助德敌日之举”。日军对所经过的中国地区肆意蹂躏，在其经过的潍县、高密、即墨、平度、黄县、掖县、招远、昌邑、安邱、昌乐、益都、临淄、历城等14个县就发生了35起日军暴行事件，其中以人命案居多。

对于日军在中国领土上的侵略行径，袁世凯政府逆来顺受，不敢马上要求日本撤军。直到1915年1月7日，北京政府才正式照会日、英驻华公使，声明战事平定，中国取消中立区域，要求两国撤走这一区域内的军队。9日，日本复照，断然拒绝中国的要求。此后，日本长期霸占青岛和胶济铁路；而且它在青岛驻屯军还成立了市政机构，控制海关，实行殖民统治，并以此为据点，在北伐战争时期还两次出兵干涉中国内部事务。此后日本还不断提出侵华的无理要求，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

1915年5月9日　日本抛出“二十一条”，妄图灭亡中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朝野上下无不认为是“天赐良机”，决心实现其独霸中国的野心。同时，日本也看出袁世凯急于称帝的野心，便以支持帝制为诱饵，使袁世凯成为其妄图灭亡中国的工具。所以在它入侵山东、占领青岛以后，不但拒绝中国政府提出的撤军要求，而且还抛出了灭亡中国、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当面递交了一份日文本的“二十一条”，并逐条加以说明，表示如能答应这些要求，日本对袁世凯“亦可遇事相助”。“二十一条”分为5号，主要内容为：

一、关于山东4条：要求中国承认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山东

省内及沿海岛屿不得让予或租与他国；同意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线的铁路；开辟若干城市为商埠。

二、关于南满和东部内蒙 7 条：中国承认日本在该地区的优越地位；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南满、安奉两铁路经营管理期延长到 99 年；日本人在南满、东蒙享有居住、经营工商业及耕种自由和土地租借权、所有权；非经日本同意，不得允许他国人在此地区建造或贷款建造铁路；非经日本同意，不得以该地区税课作向他国借款的抵押；非经日本同意，不得聘请政治、经济、军事顾问及教习；吉林至长春铁路委托日本管理 99 年。总之要将南满、东蒙地区彻底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三、关于汉冶萍公司 2 条：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未经日本允许，中国政府不得开采附近矿山和开办影响该公司的企业。其实质就是要吞并中国这个最大的钢铁企业，垄断华中、华南的钢铁工矿业。

四、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与或让与他国。日本欲以此限制其他列强的争夺，以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

五、“日本愿望”7 条：中国北京政府聘请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内地的日本医院、寺院、学校享有土地所有权；若干地方警务由中日合办或多聘日人承担之；中国所需军械半数以上由日本购进，或聘日本技师，购买日本材料，中日合办军械厂；将武昌经九江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铁路的建造权让与日本；中国在福建省内筑路、开矿、修港（包括船厂），日本有借款优先权；日本有在内地布教权。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一方面恫吓袁世凯，并嘱咐他保守秘密；一方面又示意日本支持袁世凯实行帝制，以换取他承认“二十一条”。袁世凯为得到日本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派出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与日本代表日置益秘密谈判。在谈判期间，日本以“换防”为名增兵东三省、山东、天津等地，实行武力威胁。5 月 7 日下午 3 时，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袁世凯政府“至 5 月 9 日下午 6 时止，为满意之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之手段”。北京政府被迫做出让步，于 5 月 9 日晚 11 时，复文日本驻华使馆，表示除第 5 号“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全部接受。

5 月 25 日，中日在北京签订了 2 个条约，互换了 13 件照会。这些文件总称为《中日新约》。据此，日本为其在中国山东、东北、福建及长江流域乃至全部中国沿海的侵略行为取得了条约依据，使中国南满地区的殖民化进一步加深，也使山东和东蒙地区向殖民地化迈进了一大步。

日本对华“二十一条”是中国的奇耻大辱，故从一开始就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全国教育联合会，还因此将 5 月 9 日定为“国耻纪念日”。北京各校学生亦议决：每日课余诵读最后通碟一遍，以示不忘国耻。北京政府迫于人民的压力，事后也声明此条约系因日本最后通蝶而被迫同意的。“二十一条”当时未经国会批准，所以此后历届中国政府均不承认这个卖国条约。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却以“二十一条”为借口，不断在南满、东蒙和山东等地进行扩大其权益的活动，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危害。

1916 年 7 月 3 日　签订《日俄秘密协定》，日俄联合宰割中国

1905 年日俄战争后，两国由武装对抗变为逐渐接近、相互利用，在共同侵华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协调和勾结的关系。通过 1907 年、1910 年、1912 年

3 次秘密协定，两国确定了各自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相互承认日本在朝鲜和俄国在蒙古的特殊利益，并保证尊重对方在华特权，以至最后达成瓜分我国内蒙古的罪恶勾当。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出现新的政治格局。沙俄为了能够集中力量在欧洲与列强进行争夺，同时又能保障并扩大其侵华权益，得到日本的支持和援助，便与日本进一步建立同盟关系。为此，沙俄就以出卖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来满足日本为条件，换取日本对他的支持和援助。这也是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肆在中国扩张侵略势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1916 年 2 月，在日俄双方的谈判中，双方都以中国的主权作交易，完全把中国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日本提出，如果俄国能将长春至哈尔滨的铁路让给日本，它愿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向俄国提供武器的要求；俄国政府则一面保证支持日本在中国的扩张，一面又力图巩固其在东北北部（北满）的阵地，因而只答应将位于日本利益范围内的长春至松花江路段售给日本，以作为对日本向其提供武器的回报。接着，日本又提出俄国在适当的条件下将长春至松花江岸陶赖昭车站的铁路让予日本的要求，并进一步要求将松花江至哈尔滨路段交给日本经营，而俄国则承认日本船只在松花江上有航行权，但对日本企图染指中国东三省北部的俄国势力范围的要求，予以断然拒绝。不过为了达成妥协，沙皇政府又以中国的主权私相授受，答应除准备转让长春至松花江岸的铁路外，还愿意放弃俄国船只在松花江上的航行权，将其转让给日本。俄国甚至表示，倘若中国政府不准许其转让，俄国政府绝不支持中国政府。就此，日俄双方取得一致意见。

7 月 3 日，沙俄外交大臣沙佐诺夫和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在圣彼得堡正式签订日俄秘密协定 6 条，其主要内容为：

一、日俄两国不容许中国处于敌视俄日的第三国控制之下，必要时应商定办法，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二、若因上述原因一国对第三国宣战，另一国一经宣战国请求，即给予援助。

三、日俄两国在未得到彼此同意下，不得单独媾和。

四、日俄两国的一方向另一方提供军事合作的条件和办法，由两国政府决定。

这次《日俄秘密协定》，又称第 4 次日俄密约。这次密约与前 3 次密约的不同之处是，由以前的瓜分满蒙、划分和巩固两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范围，而一变为将这种掠夺进一步扩大到全中国。日俄两国企图凭借对中国的军事、地理上的优势，与西方列强中的任何一个“第三国”（当时主要是美国）争夺在中国的霸权，这完全是一个赤裸裸的富于极大的侵略性、掠夺性的军事同盟条约，因而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和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

1917 年 9 月 28 日　接受日本“西原借款”，段祺瑞出卖国家主权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隈内阁出兵侵占山东，强迫北京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这些露骨的侵略中国的行径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促使中国各地反日爱国运动日益高涨，同时也加深了日本与列强之间的矛盾。面对这一形势，日本统治集团对侵华的政策出现了分歧，特别是有影响的元老重臣要求改变对华政策。1916 年 10 月，日本大隈内阁倒台，由寺内正毅继任内阁

首相。为了适应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寺内内阁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决定采取更加隐蔽的侵略方法。他们打着“中日亲善”的旗号，给段祺瑞政府以贷款和军火援助，取代过去强硬的政策。企图通过借款扶持皖系军阀北京政权控制中国，以实现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的目的。

当时国内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以“再造民国”的“功臣”自居入京，继续充当国务总理。黎元洪通电辞去总统，由副总统冯国漳继任总统，“中华民国”的政权又重落到北洋军阀手中。段祺瑞政府对外积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1917 年 8 月，段祺瑞对德宣战。从此段祺瑞政府以参战为名，向日本乞求借款。这样，从 1917 年至 1918 年，日本寺内内阁与皖系军阀段祺瑞签订了一系列公开或秘密的借款合同。其中：

1917 年 1 月 20 日，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 500 万日元；

1917 年 9 月 28 日，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 2000 万日元；

1918 年 4 月 30 日，有线电信借款 2000 万日元；

1918 年 6 月 18 日，吉（林）会（宁）铁路借款 1000 万日元；

1918 年 8 月 2 日，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 3000 万日元；

而在 1918 年 9 月 28 日，一天之内就向日本借了三笔巨款，即满蒙四铁路借款 2000 万日元；山东两铁路借款 2000 万日元；参战借款 2000 万日元。以上合计 1.4500 亿日元。因以上一系列的借款都是经段祺瑞政府顾问、寺内亲信西原龟三办理的，故将这一时期日本对华借款笼统称为“西原借款”。

在寺内内阁时期，日本对华各项借款总额达 3.8645 亿日元，其中给予段祺瑞政府的借款即达 2.7986 亿日元。经西原之手所借的款项不仅数额大，而且最能体现寺内内阁对华新政策的特点。日本通过借款，获得了包括铁路、森林、矿山、训练中国军队、霸占中国领土等种种特权。段祺瑞向日本所借的款项，主要用于扩充皖系军阀军事力量和发动内战。

因此，段祺瑞为换得日本的支持和援助，只要给钱给军火武器，就不管什么国家主权、民族权益，都可以廉价拍卖。从铁路、矿山、工厂、森林、电报电话到各种税收，都被段棋瑞政府作为对日本的具有各种目的的借款的抵押和担保，简直到了当尽押绝的地步，从而也就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前所未有的更多的侵略权益。

1917 年 11 月 2 日　签订《蓝辛——石井协定》，日美私相授受中国主权

1917 年，帝国主义相互厮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方酣，日本帝国主义趁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之机，凭借它在远东拥有的实力，极力扩充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企图通过扶护亲日的段祺瑞皖系军阀，建立起在中国的殖民统治。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急剧增长，加深了与当时在远东能与其抗衡的美国的矛盾，因此日美两国加强各自在华地位并打击对方的斗争日趋激化。

1917 年 4 月，美国因对德宣战而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此也就无力在远东与日本展开竞争。为维护其在华根本利益，美国不得不采取谋求与日本暂时妥协的政策。同年 5 月 12 日，美国国务卿蓝辛向日本表示，希望通过日本派特使赴美，以便就日美间有关问题进行会商。8 月，日本政府特使、前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抵达华盛顿。9 月 6 日，日美双方代表开始谈判，经过多次磋商，双方于 11 月 2 日就有关中国问题达成协议，并正式签署了《日本

和美国关于中国的换文》，即通称的《蓝辛——石井协定》。接着，该协定于 6 日、7 日在华盛顿、东京同时公布。该协定声明：

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尤其是在与日本领土接壤的地方；日本则尊重美国的中国“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政策继续有效。

这个协定，是日美背着中国私下以中国领土主权作为交易的筹码，完全是对中国主权的无视和侵犯。协定公布以后，中国舆论鼎沸。为此，1917 年 11 月 9 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故作姿态地照会美日两国公使，声明中国立场，表示不受他们交换文书的影响。照会说：“中国政府对于各友邦皆取公平平等之主义，故于各友邦基于条约所得之利益无下一律尊重。即因领上接壤发生国家间特殊关系，亦专以中国条约所规定者为限”。“中国政府不因他国文书互认，有所拘束。”

《蓝辛——石井协定》，使日美两国在中国问题上暂时达成妥协，日本利用这一协定更进一步疯狂地侵略了中国。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美对中国的争夺再度激烈，这个妥协的协定也随之被双方抛弃。到 1923 年 4 月 14 日，双方正式声明废除这个协定。

1918 年 9 月 28 日　中国《山东问题换文》，日本取代德国霸占山东

1898 年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使胶州湾 550 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德国的殖民地，并使山东全省变为德国的势力范围。1914 年，帝国主义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打着对德作战的幌子，企图取代德国霸占山东。8 月，便派军舰到青岛海口，向德国发出必须将全部胶州湾租地无偿交给日本的最后通牒。但德国不予理睬。11 月 7 日，日本攻占了青岛，接着占领了整个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铁路沿线，这就是所谓山东问题的由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因此，如何使日本在山东所攫取的特权利益合法化，是战后日本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从而也就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新目标。

为诱使中国政府接受日本对山东问题的解决方案，以便为在即将召开的战后议和会议上，取得永久侵略山东的特权作准备。本来继袁世凯之后的北京段祺瑞政府，于 1917 年 8 月 14 日向德奥正式宣战，并宣布中德、中奥之间所有条约及其它国际条约中涉及中德、中奥关系者一概无效。这样，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在法律上已被宣告废止。但段祺瑞为了建立独裁统治，急于筹措军费进行内战，迫切希望得到日本借款。日本寺内内阁正好利用段祺瑞这一心理，于 1918 年 9 月 28 日与北京段祺瑞政府缔结了山东济顺、高徐两铁路的借款合同，并立即提供了 2000 万日元借款，就这样，北京段祺瑞政府为了取得日本的支持，不惜出卖中国主权，把山东权益陆续奉送给日本，最后与日本就解决山东问题达成了正式换文的协议。

早在借款合同签定之前的 9 月 24 日，日本外相后藤新平曾致函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就山东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胶州铁路沿线的日军，除济南留一部分外，全部调集青岛。

二、胶济路的警备由中国政府组成巡警队担任。

三、巡警队经费由胶济铁路提供。

四、巡警队本部及枢要驿和巡警养成所内须聘用日本人。

五、胶济路由中国人管理。

六、胶济路由中日合办经营。

七、将日本现在山东施行的民政撤销。

同日，章宗祥复文表示“欣然同意”上述提议。这样就形成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

“换文”实际上等于承认了日本过去在山东的侵略行为及强行夺取的权利合法化，使日本完全取代了德国的权利，甚至还超过了德国旧有的权利。这一“换文”，就成了日本长期霸占山东青岛与胶济铁路的口实，也是使 1919 年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陷于被动的一个重要文件。

1919 年 4 月 30 日　堂堂一个战胜国，“巴黎和会”受宰割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结束。中国作为协约国的成员成为战胜国之一，所以，1919 年 1 月，中国政府代表出席了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和平会议，史称“巴黎和会”，又称“凡尔赛会议”。

出席和会的共有 27 个国家的 70 名代表。列强部派出总统、总理或首相为团长的代表团。列强各国的具体目标虽不完全相同，但其根本目的都是想利用这次会议，重新对世界划分势力范围。其中，日本的主要目标是要争取列强承认它能继在大战期间所夺取的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使其对山东的占领合法化、水久化，而它这一图谋暗中已取得了英、法、意等国的支持。中国代表则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能以战胜国的身份一举废除列强数十年间强加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以维护国家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和民族尊严。然而出席巴黎和会的北洋军阀所控制的北京政府代表，由于各自依靠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同，出席和会所持的态度和要达到的目的也不相同，因此步调不一：一部分人希望通过美国的帮助，能在和会上收复中国丧失的主权：而以段祺瑞为首的亲日派则仅想以履行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来讨好日本，以换取收回青岛的“美名”。

当时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是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由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及南方军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廷为主要成员组成的。中国代表团一开始就受到和会的侮辱性的待遇。本来协约国在 1917 年竭力拉拢中国参战的时候，曾保证战后给中国以大国待遇，并以照会的形式正式确认，但是在和会上，中国却被排斥在会议的最高决策机构“十人会”之外，只有被邀请时，才可列席陈述意见。

日本代表利用“十人会”成员国之一（有 2 名代表参加）的特殊条件，在 1 月 27 日抢先提出胶州湾租借地以及铁路和德国在山东所有其他一切权利，德国应无条件让与日本的要求。还强词夺理地声称，此问题属德日之间的事，中国无权参加讨论。但是，由于山东无可争辩地属于中国领土这一事实，会议不得不邀请中国代表列席发言。中国代表顾维钧强烈要求将德国所强占的胶州湾租借地及其它权利完全归还中国；日本则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益全部由其接收。虽然中国代表在会上据理力争，但英法等国对日本百般偏袒，对中国的意见不予理睬。美国为削弱日本在中国独占地位，开始对日本占领山东不肯承认。然而，日本以退出和会和不参加国际联盟相威胁。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把成立国际联盟视为和会的最终目的，因此便转而对日本妥协，向中国代表表示他无能为力，还质问中国为何在 1918 年 9 月 24 日与日本订有“欣然同意”的协约。最后，和会拒绝了中国的要求，而按照日

本的侵略意愿做出牺牲中国的无理决定，即在对德和约中关于中国山东的各条（156 至 158 条）规定：由日本政府完全继承胶州湾租借地及德国在山东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完全让予日本，日本仅声明保证“将山东半岛主权完全归还中国”。

5 月 1 日，英国外相将会议解决中国山东问题的方案正式口头通知中国代表，北京政府竟决定在和约上签字。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北京学生首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游行群众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等口号，强烈要求严惩曹汝霖（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时任交通总长）、陆宗舆（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时任币制局总裁）、章宗祥（经手向日本借款，时任驻日公使）3 个卖国贼。愤怒的群众火烧赵家楼胡同曹宅，痛打躲在曹宅的章宗祥。运动很快波及到上海、天津等全国 20 多个省 150 多个大中小城市。运动中工人阶级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在工人罢工和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6 月 10 日，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曹、章、陆 3 个卖国贼的职务。

6 月 28 日，是规定和约签字的最后一天，各国代表聚集在凡尔赛宫。北京政府电令代表签字。但是，北京政府代表不仅受到国内人民的强大压力，收到抗议的电报达 7000 多封，而且还直接受到留法学生和华工的牵制，他们包围了代表团的住处。声称：谁出去签字，就打死谁！打死一个代表，我们用 3 个人来偿命，并且都准备好了。在此情况下，北京政府代表未敢出去签字。中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消息公布后，使帝国主义国家大为震惊。当时外国报刊评沦说，不是中国政府代表不签字，而是中国人民、中国学生不计签字。总之，在巴黎和会上，中国虽为战胜国之一，但战胜国的地位并没有给中国带来荣誉和尊严，相反，却受到与战败国一样的对待，成为帝国主义各国间政治交易的牺牲品，给中国耻辱的史册中又增加了一页。

1919 年 11 月 16 日　抵制日货运动高涨，日本制造福州惨案

“五·四”运动后，全国各地反对日本侵略、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更大规模开展起来。在这一运动中，虽然并未直接伤害在华日本人，但日本对此有着刻骨仇恨。被日本强行划为其势力范围的福建省，因受日本压迫最深，反日爱国运动尤为轰轰烈烈。所以，日本驻福州领事馆积极寻机在福州进行破坏，制造事端。

11 月 16 日，由日本领事馆策动、日本侨民组成的“敢死队”，在领事馆警察署长江口善海的亲自指挥下，暗带凶器，在福州安乐桥、大义桥、新桥头、安乐铺等地，向宣传抵制日货的中国学生寻衅闹事。日本人明火执仗地冲入顺记番菜馆，将价值数千元的物品砸毁。当中国警察赶来制止时，日本人竟然开枪抗拒，当时打伤中国警察及学生、市民 10 余名，制造了一起流血事件。

惨案发生以后，福州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全国各地也纷纷召开国民大会，游行示威，抗议日本暴行。中国当局为了避免势态扩大，本着息事宁人的原则，将有关情况通知了日本领事，并交还当场捕获的几名日本暴徒。但日本人仍不断攻击中国学生，并向日本政府请求派军舰“保护”。11 月 26 日，日本驱逐舰“樱”号、“橘”号开至福州，日本军队登岸示威。中国北京政府外交部就此向日方提出严重抗议，日本政府则以中国政府保护日侨不

力为由，坚持派兵对抗。后经交涉，两国决定共同派员联合调查福州事件。虽然有充分的事实证明事端由日方挑起，而且日本因此撤换了驻福州领事，但日本仍拒不承认肇事责任。1920 年 3 月，中国向日本提出赔偿中方受伤人员，惩办日方肇事凶手的要求。但日本却强词夺理，否认责任全在日方，并提出要互相道歉、赔偿和惩凶。由于日本一再拖延，直到 11 月 11 日才达成协议：中日双方对此案互表惋惜之意，日方对中国负伤较重者给予抚慰金 1200 日元。另赔偿顺记番菜馆 800 日元。12 日，双方换文，便草草了结此案。

1922 年 3 月 4 日　镇压香港工人罢工，英国制造沙田惨案

香港中国海员工人因要求加薪遭到英国资本家拒绝，于 1922 年 1 月 12 日，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开始时罢工人数约 1500 人，所有香港开往广东内地轮船及到港的英、荷、法、日、“ 美各国轮船华工均采取一致行动。香港英国当局极为恐慌，于 16 日发布戒严令，17 日又发出一通告，其中提出船主允诺的条件，以期缓和罢工斗争，但均告失败。一星期内罢工人数激增至 6500 人，沿海航务几乎全部陷于停顿。罢工海员自 13 日起，分批抵达广州，至 19 日已达 5000 余人。广州工人热情接待，组织游行，以示声援。在省总工会倡议下，全省 27 万工人每人捐赠一日工资，供罢工海员使用。23 日，汕头海员全体罢工声援。27 日，上海工人组成香港海员后援会。同日，香港运输工人举行罢工支援海员，罢工总人数超过 3 万人。2 月 1 日，香港当局下令封闭海员工会，并将工会招牌拆去，企图以强力把罢工镇压下去。然而，香港当局的镇压行动更加激发了香港各行业工人的义愤。3 月 1 日，全市工人（包括邮局职员、银行职员、仆役、厨师、轿夫等）举行总同盟罢工，掀起更大规模的罢工浪潮，参加罢工的人数达 10 万人以上。接着，香港饮食、运输、印刷、电讯等各行业工人，为支援海员也相继罢工。3 日，香港英国总督下令戒严，不许香港居民出境，也不许香港以外的人入境，渡船禁驶。但是，4 日，香港罢工工人不顾香港当局的戒严令，有 2000 余人步行回广州。当走到九龙港附近的沙田时，英国军警向香港工人开枪射击，当场打死 6 人，打伤数百人。

这一流血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纷纷对香港罢工工人表示声援，抗议港英当局残杀中国同胞的野蛮行径，从而使香港工人罢工的决心更加坚定。香港海员罢工经过 56 天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完全胜利。6 日，港英当局在香港工人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取消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释放被捕工人，同意增加工资 15%至 30%，对遇难者家属给予每家 1000 元抚恤金。3 月 8 日，广州各工团约 10 万人集会东校场欢送香港海员，散会后举行大游行，人数达 30 余万人。

1923 年 8 月 10 日　借山东临城劫车案，列强趁机大肆勒索

民国初年，匪患流行，山东峄县抱犊崮山区（今枣庄市、费县一带），就是土匪聚集之地。1923 年春，北洋政府派遣 3 个旅前去围剿。土匪们为打破官军的围剿，决定拦劫火车逼使官军撤围。5 月 6 日凌晨，津浦铁路北上特别快车行驶至山东临城、沙沟间，被山东土匪孙美瑶部毁轨拦劫，旅客 300 余人被绑架至抱犊崮山匪巢扣为人质，其中有外籍旅客 19 人（或 22 人？），

一英国人被打死，其余为中国旅客。

次日，各国公使推举公使团领袖、葡萄牙公使符礼德趋访北京政府国务院，提出抗议。8 日，公使团做出决议：

一、列国共同向中国质问临城事件责任；

二、限期放回被掳人员；

三、保证今后津浦路安全，必要时联军得采取应急措施。

同一天，北京政府总统黎元洪立即下令将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秉琦着交陆军部、内务部议处，所有肇事地区文武官吏均先行撤任，听候查办，并责成田中玉、熊秉琦迅速将被掳人员营救出来。6 月 12 日，北京政府与土匪就劫车案达成协议，土匪被收编为“山东新编旅”，匪首孙美瑶被委任为旅长，被掳外国人全部获释，被掳中国人也于 24 日获释。

但是列强们并不甘心就此罢休，他们继续对北京政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扬言要对华武力干涉、共管中国铁路。8 月 10 日，驻华公使团向北京政府外交部递交所谓十六国就临城事件对中国的照会，通称“十六国通碟”。其中要求：

一、对被杀英国人赔偿 2 万元；对其他被掳外国人，按每星期累进加偿办法每人赔偿 8500 元；接济被掳者的一切费用均须赔偿。

二、改组中国特别护路警察，由外国军官进行监督。

三、山东督军田中玉立即免职，永不叙用；兖州镇守使兼山东第 6 混成旅旅长何锋玉立即免职，不得再任军职；免去津浦路警务处长、随车巡警队长职务，不得再任警务之职。

四、如中国政府不能自动速行戢灭土匪以致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外交团除将采取更加严厉的办法保护外人在华的生命财产外，各该管督军、文武大吏及地方有司各宫，一概革职永不叙用，不许再投效他省。

此外还提出，如外交团觉察某督军、某司令或官吏从前或现在不能尽其职务，除处以相当惩罚金或其他处分外，还得处以《辛丑条约》所规定的惩罚，并令租界不得保护此种文武官员，等等。

“十六国通碟”提出后，国内各方面反映强烈，特别反对列强提出的保护铁路的办法，认为这势必造成共管中国铁路，丧失路权。9 月 24 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被迫复照，表示将加强军事力量以强固对铁路的保护，对各国照会中干涉中国内政的要求难以接受。10 月 4 日，外交使团仍照会中国政府坚持前议。最后，除共管中国铁路的目的没有达到外，帝国主义列强的要求都得到满足。列强借临城劫车案对中国大肆勒索，干涉中国内政，致使中国近代屈辱史中又增添一项新内容。

1925 年 4 月 21 日　法国制造“金佛郎案”，对华进行经济讹诈

金佛郎，现译称法郎。“金佛郎案”是由支付《辛丑条约》赔款而发生的。按照八国联军强迫清政府于 1901 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八国赔款 4.5 亿两白银，以海关银两市价折换成各国货币。其标准是：1 两海关银为 3.75 法郎，英镑为 3 先令，日元则为 1.41 元，本息均用金付给，或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1901 年以后，清政府均按条约规定，分别拨付各国所指定的银行。但从 1905 年开始，海关银两汇兑率下跌，海关银 1 两已不能兑换 3.75 法郎。中国于是在 1905 年 7 月 2 日，付给各国总计 800 万两

白银，作为对各国的弥补，并重新与各国签订了汇兑办法换文。因列强皆为金本位制国家，故依照新办法按当时市价以银两折合成各国金币，或按伦敦市面银价用银支付，或以金币期票支付，或以电汇票支付，均由各国自愿择其中一种支付办法；按照换文，择定办法后，就照新法执行，直到赔款付清时为止。法国当时选择以电汇办法支付，因此清政府按电汇行市逐期支付赔款及利息。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郎贬值，白银升值，因而银两与法郎的比价幅度上升，按电汇价 1 法郎只值银元 1 角 3 分 4 厘，这样中国尚欠法国赔款只用原来的一半即可付清。当时中国还欠法国赔款 4 亿法郎，中国只需付银元 5300 多万元即可。但是，法国却于 1922 年 6 月向北京政府强行提出改用金计算。若照此办理，l 法郎值银元 3 角 4 分，中国需支付 1.36 亿元，要多支付 1 倍多。如果与法国同属拉丁币制的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均照此例要求中国，那么损失会更大。7 月，北京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协定》，议定以法国庚子赔款维持将破产的中法实业银行，而赔款改以金法郎换算。1922 年 11 月 21 日和 1923 年 1 月 9 日，法国国会上、下两院均通过此案。但在 1922 年 12 月 28 日的北京政府国务会议上，对《中法协定》却予以驳斥并加以否定。法国政府随即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式的咨文，要求中国政府于 1923 年 2 月 10 日中午 12 时以前，做出批准协定的决定。北京政府屈服于法国政府的压力，最终承认了以金计算付款。此案一经公布，全国哗然。10 月，国会对政府议案做出否决，并咨行总统请仍按照 1905 年的换文办理付款。法国为了进一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便串通《辛丑条约》有关各国，决定自 1922 年 12 月 1 日起强行将中国关余、盐余按金佛郎折算的赔款，由中国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尽数扣留。即便如此，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仍未敢接受法国的要求。

1924 年，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成立，财政极端困难。截至 1925 年春，总税务司所扣留的关余、盐余款已达 2360 多万元。段祺瑞政府为获得这笔扣留款，并能尽快召开有关国家参加的讨论中国海关加税的关税会议，以图摆脱财政困境，从而维持其反动统治，便派出财政总长李思浩和外交总长沈瑞麟与法国公使进行秘密谈判。最后，北京政府在法国压迫之下，接受了法方的要求。1925 年 4 月 21 日，段祺瑞正式向外界公布了中国金佛郎案协定，并通电全国进行辩解。财政总长李思浩也公布说明书，强调此案如此解决，对于中国“利大于弊”等等。

北京政府接受金佛郎案公布后，各界纷纷通电。学生们举行游行，声讨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总检察厅指控财政总长李思浩、外交总长沈瑞麟触犯刑律，应予起诉；司法总长章士钊表示要审理此案，以肃法律。但结果，被告无一人到庭。1926 年 3 月 6 日，北京高等检察厅宣布不予起诉，此案也就不了了之。

1925 年 5 月 29 日　日本镇压青岛工人罢工，制造“五·二九”惨案

1925 年 4 月 19 日，山东青岛日商大康纱厂工人，因日本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代表而举行罢工。25 日，日商内外纱厂、隆兴纱厂万余工人也罢工响应。接着，青岛许多工厂工人也加入罢工行列。此外，青岛工人的罢工斗争，还得到上海工人和胶（青岛）济（济南）铁路工人及青岛大学生的声援。日

本资本家在强大的罢工浪潮面前，被迫答应罢工工人的部分条件。5 月 10 日，青岛罢工工人手执写着“罢工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字的小旗，集会庆祝罢工胜利，到会者达万余人。工人们纷纷登台演说，高呼“工人团结万岁！”的口号。会后，工人举行游行，工会宣布当晚复工。不料，日本资本家随即撕毁与罢工工人达成的协议，并暗中用金钱收买了中国官厅，准备用武力强迫青岛日商内外、大康、隆兴三厂罢工工人复工。愤怒的青岛工人，于当天再度宣布罢工。日本公使则狂叫这是中国的排外行为，还公然于 27 日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同时调动日本军舰开赴青岛。28 日，日本驱逐舰抵达青岛，日本水兵上岸示威。29 日凌晨 3 时许，张宗昌派陆军 3000 余人也到达青岛配合日本行动。随即宣布戒严，包围工厂所在地，勒令工人出厂。当工人退出工厂之际，张宗昌的军队和日本人一齐向工人猛烈射击，随后又到各厂疯狂屠杀，工人死伤无数（由于许多尸体被当即抛入海中，所以死亡的确切数字无法统计）。这就是通称的青岛“五·二九”惨案。青岛工人的罢工斗争，最后在帝国主义和军阀联合镇压下而惨遭失败。

1925 年 5 月 30 日　血腥屠杀上海群众，列强制造“五卅”惨案

1925 年 2 月，上海内外棉 11 家纺纱厂 1.7 万余中国工人，为抗议日本厂方对他们的殴打和虐待举行罢工。不久，罢工浪潮波及上海整个日资企业。罢工发生后，日本资本家百般破坏，企图使工人复工。租界当局也派出巡捕搜捕工人领袖和罢工工人。淞沪警察厅也顺从帝国主义的意志，派出警察干涉工人集会，逮捕集会工人。但是工人们毫不屈服，继续坚持罢工。不久，上海、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一度取得胜利，帝国主义者惴惴不安，伺机反攻。5 月 7 日，上海日本纺织同业会做出 3 项决定：拒绝承认工人的工会组织，并要求租界当局及中国政府取缔工会。14 日，内外棉十二厂的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几名工人代表。同日，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借口存纱不多而宣布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不许工人上班。15 日，该厂夜班工人数百名进厂与资本家交涉，要求发放工资，双方随即发生冲突。日本大班竟率领打手开枪射击。工人代表顾正红（中共党员）身中 4 弹，同时受伤的有 10 余人。

16 日，内外棉第五东西二厂及七、八、十二等五厂罢工工人约 2 万余人，在潭子口三德里工会开会，提出必须承认工会有代表权、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 8 项条件，以及惩办凶手、赔偿受伤工人损失、恢复被开除工人的工作等 8 项条件。上海的广大学生也纷纷走向街头，宣传演讲，支持工人的斗争，号召反抗帝国主义暴行。17 日，顾正红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顾正红中弹牺牲，更加激起广大工人和各界群众的愤怒。21 日，上海文治大学为救济死伤工人募捐，有数人被捕房逮捕。次日，上海大学学生在赴顾正红追悼会的途中，又有数人被捕。租界当局还要在 30 日开庭审判被捕学生，并决定 6 月 2 日将通过威胁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增加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和所谓的“取缔童工法案”4 项提案。

30 日，上海大、中学校 2000 余学生在公共租界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揭露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租界当局拘捕中国工人和学生的罪行，又有数十人被拘捕。下午，约 1 万名学生和市民聚集在公共租界南京路的老闸捕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租界当局命令巡捕开枪驱赶，造成学生死 5 人，市民死 11 人，重伤 8 人，轻伤 10 余人的严重惨案。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卅”惨

案。次日，英国巡捕及万国商团再次枪杀示威群众 3 人，伤 18 人。6 月 2 日，日本巡捕在十丰镇摆渡口打死渡江工人 2 名，重伤 3 名。同日，巡捕和义勇队在新世界游戏场附近击毙华人 1 名。6 月 3 日，杨树浦恒丰纱厂的日本人又枪杀了号召罢工的工人 1 名，伤 2 人，并打死过路学生 1 人。

帝国主义的一系列残杀中国人民的暴行，进一步激起上海各界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共产党中央号召上海人民实行总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6 月 1 日，实现了“三罢”斗争，20 多万工人罢工，5 万多学生罢课，部分商人罢市。6 月 5 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随即汉口、长沙、青岛、天津、广州等数十个城市群众纷纷罢工、罢市、罢课，声援上海工人，掀起了巨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此情况下，北京政府也先后向外国驻华使团 3 次提出抗议，并派代表与英日等国在上海和北京进行谈判，租界当局被迫释放被捕人员，将公共租界总巡捕和捕头免职，中国收回上海公审公廨，才算了结。

1925 年 6 月 23 日　枪杀广州各界群众，列强制造沙基惨案

1925 年 6 月 23 日，广州 7 万余群众和黄埔军校学生，为声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东校场举行“五卅”惨案追悼大会，会后进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至广州沙面租界对岸沙基西桥口时，租界内英法巡警竟向游行队伍开枪，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葡等国军舰同时开炮轰击，83 人当即被打死，还有 500 余人受伤，这就是著名的沙基惨案。

惨案发生后，广东革命政府立即以广东省长胡汉民的名义向英、法、葡驻广州总领事提出抗议。英法领事贼喊捉贼，胡说沙基惨案是由中国游行群众开枪引起的。胡汉民于 26 日第 2 次提出严重抗议，根据事实驳斥了英法领事对游行群众的诬蔑，并严正提出：

一、与沙基惨案有关各国必须派出大员向广东革命政府谢罪；

二、严惩制造惨案的长官；

三、除两艘通讯舰外，其余驻粤各有关国的兵舰一律撤走；

四、沙面租界交广东革命政府接管；

五、必须对死伤人员进行抚恤。

与此同时，香港、广州的工人、商人也纷纷组织罢工委员会，号召工人罢工、市民罢市。29 日，广州各团体要求对英实行经济绝交。同日，香港 25 万工人举行总罢工，并有 13 万工人返回广州。7 月 1 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任命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和广东省省长。9 日，广州各界 370 多个团体在广东大学公祭沙基惨案死难烈士，人数达 20 万。11 日，广州工人 2 万余人赴国民政府请愿，提出 4 项要求。14 日，广州国民政府就沙基惨案向英法等国驻广州领事提出第 3 次严重抗议，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恐吓决不屈服，坚决要求英、法、葡答复此前所提出的 5 项条件。英法各国却对广东政府的要求采取故意拖延态度。广东国民政府眼见通过外交途径无法解决问题，便采取强硬措施，组织了 2000 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纠察队协同群众，严密封锁香港及沙面租界，分驻各海口码头，截留出口粮食，扣押走私货物，厉行抵制英货。这些措施使香港交通运输中断，肉食蔬菜供应断绝，商店货源枯竭，街道垃圾粪便横溢，蚊蝇成群，臭气熏天。香港成为一个死港、臭港。这次省港大罢工，在全国人民支援下，一直持续到 1926 年 10 月，历时

16 个月，是世界罢工史上罕见的。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锻炼了工人阶级，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战争起了重大作用。

1926 年 3 月 18 日　北京民众反对“八国通牒”，列强制造“三·一八”惨案

1926 年 3 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在与张作霖的奉军作战中，为防止奉军从海上登陆，在天津大沽口一带放置水雷封锁海口，并通告一切商船不得出入港口。3 月 10 日，驻京外交团以国民军的行动违反《辛丑条约》为借口，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国民军被迫作出让步，宣布开放大沽口岸，但要求外交团担保外轮不得代为奉军运送兵员和军械，外船入口不得有奉军军舰混入等条件。12 日下午，日本在事先未与国民军约定信号和时间的情况下，将“藤”字 15 号驱逐舰驶入大沽口，另一“薄”字号驱逐舰也要进入大沽口。国民军鸣枪示警，令其停止侵略行动。而日本军舰竟开炮轰击大沽口，国民军因猝不及防而使数十人受伤。

大沽口事件发生后的 3 月 16 日，日本乘机策动原《辛丑条约》八个签约国的驻华公使，就大沽口事件联名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史称“八国通碟”。在通碟中，帝国主义列强借口《辛丑条约》所规定的，北京至海滨间自由交通的特权，要求中国政府于 3 日内接受以下 5 项条件：

一、必须停止大沽口至天津一带的军事行动。

二、所有水雷及其障碍即行撤除。

三、必须恢复所有航标并保证不再发生妨碍行为。

四、所有作战船舰，必须驻泊大沽口外，不准干涉外国航船。

五、除海关当局外，不许擅自对外国船只进行搜查。列强限中国政府 3 月 18 日正午以前答复。最后，通牒还蛮横提出，如果以上各点得不到保障，外国海军将采取严厉措施，排除天津至海口自由安全航行的障碍。

事实上，在“八国通碟”发出的同时，帝国主义就向天津增调军舰，在大沽口海面麇集的外国军舰达 20 艘之多。发出通牒的八国政府还向本国驻华公使和在华驻兵发出训令，必要时可配合行动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英国扬言要用 10 万军队对付国民军，日本也声称在上海、南京、汉口、长沙、重庆等地的 15 艘日本军舰，随时可以出动。帝国主义列强的举动，大有重演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势。

在帝国主义武力恐吓下，北京政府虽然表示“八国通牒”的要求超出了《辛丑条约》的范围，但仍屈辱地接受了通牒的要求，宣布恢复交通自由。国民军也表示让步。同时，奉系渤海舰队也向外国军舰指挥官表示完全承认帝国主义所提 5 项条件。这样帝国主义列强采取的高压政策，再一次获得“成功”。

“八国通牒”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3 月 18 日，在国民党中央北京执行部和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北京各界人士万余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示威大会，李大钊在会上作了演讲。大会通过了驳复八国通牒、宣布《辛丑条约》无效、电勉国民党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等决议。会后 2000 多名群众赴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当请愿队伍行至国务院东辕内时，执政府秉承帝国主义旨意，命令卫队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 47 人，伤 200 余人，李大钊、陈乔年等为掩护群众

而负伤。

段祺瑞反动政府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运动，反帝反段的呼声响彻全国。4 月 10 日，国民军将领鹿钟麟派兵包围执政府，用武力推翻了段祺瑞执政府，段祺瑞被迫逃入法国使馆。4 月 20 日，段祺瑞宣布下台，并逃亡天津。当时流传这样一首诗：“ 踏着三 · 一八血迹兮，雪国耻以敌强邦。系后死之责任兮，誓尝胆而卧薪。 ”表达了中国人民洗刷耻辱的坚强决心。

1926 年 9 月 5 日 “ 万流 ”轮川江肇祸，英国制造万县惨案

自长江上游的宜昌、重庆、万县等地先后开辟为通商口岸后，帝国主义的兵舰、商船在川江江面上恣意妄为，横行霸道，撞沉浪沉中国船只的事件经常发生，严重危及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926 年 8 月 29 日，英国太古公司“ 万流 ”号轮船上驶万县。它行至云阳时，放慢速度，准备在那里停泊，等候旅客上下船。当时驻万县的杨森司令部解晌宫兵，正巧从云阳提款返回路过那儿，见“ 万流 ”轮放慢速度，以为是要停泊载客，便分乘两只舢板驶向该轮，准备乘该轮返回万县。不料该轮存心肇事，当舢板行至江心将要靠近它时，故意猛将轮船开快，把两只舢板浪沉，官兵 58 人全部溺死江中。川军损失枪 65 支、子弹 5500 发、款项 5.8 万元（一说 8.5 万元）。“ 万流 ”轮肇事后，不顾中国官兵死活，仓皇逃窜。杨森得到报告后，立即派员前往出事地点调查。此时停泊在万县的英舰“ 柯克捷夫 ”号却派兵前来干涉，并强缴了前来调查的中国官员的枪支，开枪击伤 2 名士兵。同时，该舰将大炮对准万县，企图再造事端。无比激愤的当地军民，扣留了从重庆下驶的太古公司的“ 万县 ”、“ 万通 ”两轮，要求太古公司赔偿掼失。不料英帝国主义不但不赔偿，反而调集军舰以武力相威胁。

万县各界人民成立“ 万县英轮惨毙同胞雪耻会 ”，开展反英斗争。9 月 4 日，雪耻会在万县西校场召开有数万人民群众参加的抗英大会。会上发出宣言，历数英帝国主义在长江上游所犯种种暴行，表示誓做政府后盾，共同救亡。并通电全国，提出：不供给英人油盐米炭；不做英军买办水手领江及一切雇工；不与英人贸易往来；不装运英人货物及接送英轮客货；不买英人输出口货物，也不卖货物与英人，不搭英国商船。同时提出如下强烈要求：废除中英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内河不许行驶英国军舰并取消英国在华内河航行权；惩办肇事各英轮祸首；抚恤历年英轮溺沉同胞家属；为死难者立纪念碑；英国政府必须向中国政府道歉等。

此时狡猾的英帝国主义，一方面表示谈判“ 和平处理 ”，一方面却秘密通知驻汉口的英国海军副司令，将停泊在宜昌的商轮“ 嘉禾 ”号密装钢板，安设大炮，并由英舰“ 德石巴奇 ”号舰长达尔札率海军从宜昌驶至万县。9 月 4 日，驻重庆领事卢思德向杨森发出最后通牒，限 24 小时内将“ 万县 ”、“ 万通 ”两轮放行。但杨森不予理睬。5 日下午 5 时左右，“ 嘉禾 ”号在停留万县江面的英舰“ 柯克捷夫 ”号、“ 威警 ”号掩护下，向被扣英轮逼近，达尔札指挥 63 名海军陆战队员冲向两轮，企图用武力劫走。英国士兵登上“ 万县 ”轮后即向中国士兵开枪，当场打死 2 人。中国士兵奋起还击，击毙包括达尔札在内的英国官兵 10 余人。英舰“ 柯克捷夫 ”号、“ 威警 ”号使用 12

厘米口径大炮疯狂地向万县南北两岸猛烈轰击，发射炮弹 300 余发，持续 3 小时之久。

经过英军炮火轰击，万县县城四处起火，房屋被毁，瓦砾遍地，无辜居民惨遭杀祸，哀声震天。据万县县志记载，在万县“九·五”惨案中，受到英舰炮击的有 33 处，致使万县县城大半被毁，死伤军民达 4000 余人，毁民房、商店数千间。财产损失 2000 万元、这是英帝国主义长期以来蔑视中国主权、虐杀中国人民的侵华政策的一个新表现和犯下的又一新的罪行。

惨案发生后，万县民众举行罢工、示威，抗议帝国主义野蛮无理的侵略行径。重庆、上海、汉口、北京等地爱国群众也纷纷集会抗议，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强大的反英浪潮。

1927 年 3 月 24 日　英美军炮轰南京，制造“南京事件”

1927 年 3 月 23 日，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攻进原来北洋军阀盘踞的南京城。城内的反革命分子乘市内混乱之机，煽动一些流氓和北洋军溃兵装扮成国民革命军袭击了英、日、美驻南京领事馆，并抢劫了一些外国人开办的商店、学校、医院和外国人的住宅，使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受到一些损失。英美两国即以此为借口，无视中国主权，擅自动用其停泊在南京下关江面的军舰，于 24 日下午 3 时半至 5 时之间向南京萨家湾一带进行炮击。据当时初步调查，在英美军舰炮击中，致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官兵 24 人被打死，受伤士兵 7 名；城内居民百姓中弹死亡的有 27 人，受重伤的有 39 人。这就是历史上的“南京事件”。

这一惨案发生后，英美为首的列强各国仍不肯罢休，继续以武力相威胁，纷纷派兵集结上海、南京一带，仅军舰就达 90 余艘。3 月 31 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就英美炮击南京制造惨案的侵略行径，提出严重抗议，同时也对南京外国侨民受到的伤亡和财产损失表示深切歉意。4 月 11 日，英、美、法、日、意五国向武汉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和声明，并提出中国惩凶、道歉和赔款 3 条要求。同时还威胁说，如中国不做出满意的答复，将不得不采取“适当手段”。13、14 日两天，武汉国民政府分别向五国做出答复，表示对外国侨民的损失将给予合理赔偿，至于惩凶和道歉之事将在事件调查清楚后再做出决定。同时也要求组织国际调查委员会，调查外国侨民和领事馆的损失，以及英国海军炮击南京的情形、英国在华历次暴行等。

由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致使“南京事件”的交涉暂告停止。直到 1928 年 3 月 30 日和 8 月 9 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才与美英先后就所谓‘宁案”达成协议。国民党诬陷此案系由共产党煽动所致，然后南京政府屈辱地向英美做出道歉、赔偿和惩办所谓“肇事者”的媚态，而英美则仅对其兵舰为保护其侨民而不得已采取的此种“手段”表示了一下遗憾就算了结。“南京事件”，使充满耻辱的中国近代史再添上了一桩新的耻辱。

1927 年 4 月 3 日　枪杀汉口反暴群众，日军制造“四·三”惨案

1927 年 4 月 3 日，停泊在汉口长江水面的日本军舰上的水兵，在汉口乘人力车时，与中国车夫发生争执，水兵竟将人力车夫当场打死。事件发生后，武汉三镇的群众无比愤恨，许多群众自发到日本租界抗议，一怒之下捕捉了

6 名日本水兵和 4 名日本商人。日本驻汉口总领事立即调集日本水兵 200 名，携带机关枪登岸，向抗议群众大肆扫射，当场打死群众 9 人，伤数十人，并将群众驱逐出日本租界，再次制造了流血事件，即汉口“四·三”惨案。

惨案发生后，武汉国民政府立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驻汉口领事对武汉国民政府的抗议不但置之不理，还造谣说中国政府要对外国人采取报复行为，并令日本侨民全部转移到日本军舰上，故意制造紧张气氛。武汉国民政府在帝国主义压力下，反帝态度发生动摇，终于被迫对日本屈辱求和。4 月 25 日，武汉政府与日本领事订立了非正式的解决“四·三”事件的条件，主要是：

一、日方撤兵，并撤去各种防御武器。

二、日商复业开工，发给华人工资。

三、国民政府撤退驻防华界的军警和纠察队。

四、中国工人绝对服从政府命令，不得仇视日本人。

五、国民政府保护在华日本人的生命财产。

六、“四·三”案待适当时机再行谈判。

此后，武汉政府还派唐生智亲自向日本总领事赔礼道歉，并表示将尽力维护秩序。同时，武汉总工会也下令释放拘捕的日军士兵和商人。27 日，汉口当局设立武汉保安委员会，取缔一切排外行动；武汉总工会也对工人严加管束，并下令严禁工人与外国人争执或开衅。国民党市党部也发出通知，命令在日本租界有党籍的华捕复岗。汉口“四·三”惨案，就这样马马虎虎了结了。

1928 年 5 月 3 日　日军武装入侵济南，制造“五·三”大惨案

1928 年 4 月，亲英美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打着“统一”的旗号，开始了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英美势力向中国北方发展，借口保护侨民，于 4 月下旬出兵侵占济南。5 月 1 日，国民党北伐军开进济南。日军侵占济南后，肆意寻衅闹事，残杀中国百姓事件不断发生。到 5 月 3 日，日军向中国军队和人民开始了有预谋、有准备的进攻和大屠杀。

首当其冲遭到日军攻击的，是离日军驻地较近的国民党第 40 军第 3 师第 7 团。该团官兵毫无警惕，猝遭不测，陷于一片混乱。不少官兵被日军刺死，或被俘虏。日军得手后，鸣炮南行，又将国民党军一个炮兵团的两个步兵排包围缴械。

随后，日军兽性大发，视济南城里的一切中国军人和百姓为其屠杀对象。日本侵略军沿经字（济南街道分经路和纬路）路前进，将纬字路口夹断，用机关枪从马路两端扫射，一时间尸体满街，儿童、妇女、工人、商贩、学生、士兵死伤惨重。死者东倒西躺，伤者伏地呻吟，枪声与哭声混在一起，目不忍睹。到下午 5 时，人们开始出来活动，街上行人渐多。不料，有一伙像野兽一般的日本士兵，突然从普利门里吼叫而来，双手挥动战刀，不问青红皂白，或往人的头上直劈，将人劈作两半，脑浆、鲜血、五腑淋漓满地；或从人的头顶上斜劈，使大半个头颅带着一条臂膀掉下来；或从人腰中横砍，将人截为两段，真是惨绝人寰。他们端着枪，上着刺刀，追着人刺。有的日军士兵用刺刀将小孩子挑起，甩到空中，摔在商店瓦屋上，摔在马路旁，摔得脑浆迸裂……鲜血染红了普利门大街，尸体阻塞了交通。更为凄惨的一幕，

是对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人的残杀。就在这一天的深夜，日军士兵闯入交涉署内，强行搜缴枪械、文件、割断电灯、电话线路，并把蔡公时等全部捆绑起来。蔡以外交人员身份用日语提出抗议，残忍的日军士兵竟用刺刀在他们的脑袋上乱砍乱削，蔡公时耳、鼻、舌被割掉，眼被剜下，最后与其他人一起被分批拖出去枪杀。这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犯罪，也是对国际公法的野蛮践踏。

5 月 11 日，济南全部为日军占领。日军进城，再次大施淫威，杀人放火，连续数日不止。据世界红十字会济南分会查明：在济南惨案中，共死亡 6123 人，伤 1700 余人。

1928 年 5 月 13 日　逼签《满豪新五路协约》，日本妄图独占东北三省

1927 年 6 月至 7 月间，日本内阁召开了决定日本侵华新策略的秘密会议，通称“东方会议”。经过 5 次讨论，确定的对华新策略是：为确保日本在满蒙特殊的地位和权益，必须以武力侵占东北，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加紧满蒙地区铁路建设；以武力保护日本在华侨民等。显然，日本的所谓“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完全视东北为日本殖民地，无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它标志着日本对华侵略进入一个新阶段。

“东方会议”后，日本立即加紧对中国满蒙地区的侵略步伐，第一个目标就是攫取在东北的铁路修筑权。1927 年 10 月，日本“铁路株式会社”总裁山本条太郎亲到北京与张作霖会晤，要求将“满蒙铁路建设问题从速解决”。经过多次秘密谈判，日本以 500 万日元相贿赂，很快在 15 日与张作霖达成“满蒙新五路协约”。所谓“新五路”，是针对 1913 年的中日“满蒙五路”借款秘密换文而言的。当时北京政府同意向日本借款修造以下铁路：由四平街经郑家屯至洮南府；由开原至海龙城；由长春贯越南满铁路至洮南府。而“新五路”则是完全由日本政府承包修建，这五条铁路是：自敦化经老头沟至图们江岸；自长春至大■；自吉林至五常；自洮南至索伦；自延吉至海林。

《满蒙新五路协约》还规定，中国不能将打虎山至通辽的铁路延长至通辽以北，不能修建开通至扶余的铁路。不久，日方又进一步要求将双方谅解改为政府间的正式协约。1928 年 5 月 13 日，在日本的压力下，张作霖与山本条太郎正式签订了出卖东北路权的《满蒙新五路协约》。15 日，北京安国军政府交通部次长赵镇又与山本条太郎签订了敦老（敦化至老头沟）、老图（老头沟至图们江）、长大（长春至大■）三线的筑路承包合同。这就为日后日本武装占领我国东北三省，创造了条件。

1931 年 9 月 18 日　“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三省

日本武装占领我东北三省的罪恶方针，早在 1927 年的“东方会议”上就已经确定了。为此，日本帝国主义加紧策划和准备。1929 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同样也很快波及到日本。日本统治集团为摆脱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危机，采取向外扩张夺取新的殖民地的政策，东北三省就成为其第一个侵略目标。

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目的，首先大肆制造侵华舆论。他们叫嚣所谓日本

的“满蒙生命线”受到威胁，在国内煽动民众并大规模扩军备战。1931 年 4 月，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经长时间研究，得出一个所谓《1931 年形势判断》，决定建立“亲日政权”、“成立独立国家”、“占领满蒙”3 个步骤，以实现其妄图独霸满蒙的战略。6 月 19 日，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骨干分子共同组成的核心委员会，草拟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方策大纲》，计划在 1932 年春采取军事行动，并暗示要以东北的反日斗争为启衅口实。日本关东军与陆军省、参谋本部紧密配合，于 1931 年春制定出《满蒙问题处理方案》，认为当时已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军事占领阶段。主张用“谋略”制造关东军行使武力的机会，要求在 1931 年秋天采取军事行动。随后在陆军部的支持下，关东军参谋部为武装侵略中国东北作了详细规划和部署，决定在沈阳北郊柳条湖炸毁南满铁路路轨，再以此为口实出兵占领沈阳，进而占领整个东北。为了达到这一阴谋目的，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调兵遣将，关东军在东北不断挑起事端，通过 7、8 月间相继发生的“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将武力侵华的战争狂热地推向高潮。

1931 年 9 月 18 日晚 10 时许，日本关东军驻南满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按照关东军司令部预定计划，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一段铁轨，制造了所谓“柳条湖事件”。然后，日军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军队。11 时左右，日军便大举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守军奉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命令不战而退。日军在占领东北军营地后，于 19 日凌晨向沈阳发动进攻，中午占领了沈阳城及郊区的重要军事机关和设施。同日，日军以闪电般速度攻占了辽阳、营口、盖平、开源、海城、鞍山、铁岭、四平街、公主岭、安东、长春、凤凰城、本溪、抚顺等 20 余座城市，掠地 1000 余里。9 月 21 日，日本又调驻朝鲜的一个旅团渡过鸭绿江进攻吉林、辽宁。吉林省代主席、吉林边防公署参谋长熙洽令驻军撤出城区，率部投降日军，吉林城失陷。22 日，洮南镇守使张海鹏降日，洮南被占。一周内，辽宁、吉林两省几乎全为日军所占。日军原计划在攻占吉林后北犯哈尔滨，但由于哈尔滨为东省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那里华人与洋人杂居，又有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总枢纽，日本政府怕引起国际纠纷，才暂时停止北犯哈尔滨的计划，而改由洮昂路北犯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日军在进攻齐齐哈尔的过程中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损失不小。19 日晨，黑龙江代理省主席、军队总指挥马占山率军政人员退出齐齐哈尔，当日齐齐哈尔失陷。日军占领齐齐哈尔之后，已无北顾之忧，于是调头南下转向辽西进攻锦州。日军准备实施出动飞机轰炸毁灭锦州的计划，但未得逞。11 月 31 日，日军又准备对锦州发动总攻，但中国军队奉命撤出锦州。1932 年 1 月 3 日，日军占领锦州。日军占领辽西后，又回过头北上进攻哈尔滨。27 日，日军借口哈尔滨有 4 名日本人被杀，开始发动进攻。经过几天激战，中国军队于 2 月 2 日撤退，哈尔滨沦于敌人之手。从“九·一八”事变到哈尔滨失陷，仅 4 个月零 18 天的时间，东北全境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 3000 万同胞都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中国驻守东北的军队近 20 万人，而日本关东军连援军在内总共不过 2 万多人。中日兵力对比如此悬殊，而日本侵略军却能轻易地在一夜内占领东北重镇沈阳城，一日内攻城 20 余座，4 个多月占领东北全境，除了日本帝国主义事先做了周密计划，事变中搞突然袭击外，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政府实行卖国的不抵抗政策所致。正是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以致在“九·一八”事变后断

送了我东北大好河山。

日本侵略军在攻占东北三省过程中，烧杀抢掠，为所欲为，无数东北同胞惨死在日军屠刀下，无数妇女惨遭日本侵略者蹂躏，富饶的东北大地成为日军施暴的场所。据《每日新闻》报道，自“九·一八”事变到 1932 年底，共有 2.3662 万名中国军民被屠杀；事变中官方损失达 178 亿元，公、私损失共达 200 亿元。大量完好的飞机、战车、枪支弹药落入日军手中，成为日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屠杀中国民众的武器。

但是，“九·一八”事变，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从此蓬勃兴起。

1932 年 1 月 28 日　“一·二八”事变——日本扩大侵华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为了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又把矛头指向上海，并想以此为跳板侵入中国内陆地区。为达到这一目的，诡计多端的日本帝国主义再次策划了一个大阴谋。

1932 年 1 月 18 日，日本公使馆派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勾结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唆使日本僧人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及其信徒 5 人，向上海三友实业社总厂工人义勇军抛掷石块，挑衅生事，致使日本僧人与中国工人相互殴打起来。事后，日本侵略者以一名日本僧人受伤过重死于日本医院为借口，由田中隆吉策动几十名日本浪人焚烧了上海三友实业社，杀死、打伤中国警察多人；同时，又煽动 1000 多名上海日本侨民捣毁中国许多商店，拦截公共汽车和电车，叫嚣“要杀中国人”。20 日，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颠倒是非，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提出所谓“抗议”，要求赔礼道歉、惩凶、赔偿和取缔“排日每日之非法行动”，还特别提出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及各种抗日团体即行解散。22 日，日本驻沪舰队司令部进一步在上海各报发表恫吓性声明，要求解散抗日团体和取缔抗日活动。与此同时，日本内阁议决派大批军舰开往上海，以示威胁。24 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公馆，然后反诬是中国人干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此为借口紧急调兵遣将，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26 日，村井向上海市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对 21 日所提出的解散抗日团体等 4 项要求限 48 小时内答复，否则将采取自由行动。在日本武力威慑下，国民党政府被迫妥协退让，授意上海市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28 日晨，上海市政府下令封闭各界抗日救国会办事处，并通令不许民众组织义勇军，答应“惩凶”和赔偿损失。

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本的妥协退让并不能阻止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动，反而更加助长了他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气焰。1932 年 1 月 28 日夜 11 时 25 分，日本领事馆将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信一的“公告”送交上海市政府和市公官局。“公告”无理地要求在闸北的所有中国军队及敌对设施“从速撤除”。其实，这个“公告”送达 15 分钟左右，日军便已分三路向闸北中国驻军突然发动进攻。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蒋光鼐和蔡廷锴的指挥下奋起抗击。在作战中，中国将士舍生忘死，奋勇杀敌，爱国的学生军、义勇军、女子救护队，配合十九路军官兵英勇作战，搬运子弹，救护伤兵，表现出不甘屈服的英勇献身精神。

日本侵略军攻入上海后，蓄意焚烧轰炸居民住宅及公共设施，造成了上海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劫和苦难。29 日上午，日军飞机轰炸闸北，其主要目

标是上海的铁路枢纽北站和商务印书馆。经过敌机的狂轰滥炸，铁路北站、管理大楼及货栈全部被毁，仅货栈一处就损失在 100 万元以上。10 时许，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遭敌机轰炸，变成一片火海，厂房和所有印刷设备全部被毁。2 月 1 日上午，附属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也突起大火，30 年来苦心搜集的中外图书杂志，包括大量的孤本、珍本、善本图书全部化为灰烬，这是日寇犯下的毁灭人类文化的严重罪行。

此外，在“一·二八”事变中，中国官兵受伤 8584 人，阵亡 4086 人；上海居民死亡 6.0084 万人，受伤 2 万人，另有 1.0400 万人失踪。在作战区内的工厂、学校、商店遭到严重破坏，居民财产损失 7/ 10，房屋损失 8/10。总之，上海军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全市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等遭到巨大破坏，日本帝国主义对这座远东最著名最繁华的大都市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

1932 年 3 月 1 日　日本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建立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为了在东北三省及热河和内蒙古建立其殖民统治，先后炮制出《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满蒙自由国建设大纲》等方案，确定在东北建立“独立国家”。为此，选中已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其傀儡，充当“元首”，建立伪“满洲国”。1932 年 1 月 6 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根据关东军的提案，共同制定了《中国问题的处理方针纲要》，对要建立的满蒙“国家”做了周密策划。

为此，关东军在东北指使汉奸大搞“独立”运动。9 月 24 日，汉奸袁金铠在日军羽翼下成立了“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后改为辽宁省地方维持会)，袁自任“委员长”。27 日，原东省特别区长官张景惠在哈尔滨成立“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委员会”。旧军阀阚朝玺在沈阳组织“四民临时维持会”，发表独立宣言，宣布脱离张学良政权。11 月，汉奸李维周在齐齐哈尔也建立了“齐齐哈尔地方维持会”。

关东军在指使和操纵各地方成立伪“维持会”的基础上，又在各省扶持组建伪政权。1931 年 9 月 26 日，在日本军国主义策划下，吉林省府召开地方士绅会议，宣布解散吉林省府，另组长官公署，以熙洽为长官，日本坪井大佐为警备司令。公署下设民政厅和军务厅，职官中、日各半，而实权完全掌握在日本顾问手中。该伪政权还发布宣言和通电，声明与南京国民政府及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宣布独立。12 月 16 日，关东军强行解散辽宁地方维持会，正式成立伪奉大省政府，汉奸臧式毅为省长。1932 年 1 月 1 日，张景惠在日军操纵下发表“独立宣言”，组织伪黑龙江省政府，并自任省长。在县级组织中，关东军利用汉奸积极制造所谓“地方自治”，进而夺取县政权。1931 年 11 月 1 日，关东军制定了《地方自治指导部条例草案》；10 日，在沈阳成立了伪奉天省地方自治指导部，任用汉奸于冲汉为“部长”，然后派“自治指导员”到各县扶持地方傀儡政权，组织地方武装。

1932 年，关东军根据《中国问题的处理方针纲要》，决定将各省伪政权联合起来，建立起在日本控制下的“新的统一政权”。2 月 16 日，在关东军操纵下，张景惠、熙洽、臧式毅等在沈阳召开“建国会议”，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张景惠任“委员长”，臧式毅、熙洽、汤玉麟、齐默特色木丕勒、凌升与张景惠 6 人为“委员”，并决定 3 月 1 日成立“新国家”。18 日，

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宣言，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25 日，又发表“新国家体制”规定，规定“新国家”的“国名”为伪“满洲国”，“元首”叫做“执政”，国旗为红、蓝、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年号”为“大同”，定都长春并改称“新京”。29 日，“全满建国促进运动大会”通过宣言和决议，并派代表去旅顺“敦请”溥仪出任“执政”。3 月 1 日，发表《建国宣言》，宣告伪满洲国成立。6 日下午，在关东军严密护卫下，溥仪前往“新京”。9 日，溥仪就任“执政”。10 日，溥仪以“执政”名义公布了由关东军内定的伪官员名单。同一天，溥仪便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个可耻的卖国密约——《日满协定书》，将“满洲国”的主权拱手交给日本。这个卖国密约规定：

一、“满洲国”的“国防及维持治安”全部由日本管理。

二、伪满的铁路、港湾、水路、空路，包括增加修筑均由日本管理。

三、日本军队所需“各种设施”，伪满须“竭力援助”。

四、日本人得充任伪满官吏，“保荐”或“解职”均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决定。

不难看出，伪满洲国的主权完全操纵在日本帝国主义手里，伪满政权是个实足的傀儡政权。

9 月 15 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1934 年 3 月，伪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年号”由“大同”改为“康德”。实际上，博仪这个傀儡“皇帝”，一切都得听任日本帝国主义摆布，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1932 年 9 月 16 日　日寇制造平顶山大惨案，惨无人道屠杀无辜百姓

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不甘当亡国奴的东北爱国民众纷纷自发组织成立了各种抗日自卫军，广泛地开展抗日斗争。就在日本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的 9 月 15 日这天，以梁聚夫为首的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约 1200 人途经平顶山攻打抚顺，在平顶山烧毁了日军的配给店，然后向东岗、老虎台、杨柏堡、东乡和古城子进发，途中又袭击了日军杨柏堡采炭所，处死了采炭所所长渡边宽一，打死了自卫团长平岛善作等七八个日本人，并放火烧毁了采炭所。

第二大上午，日本宪兵抚顺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和守备队中队长川上精一，率领大批日本兵进袭平顶山图谋报复。日军首先控制了东西两个大山头，包围了全镇，然后以照相为名用刺刀威逼百姓和矿工，将他们驱赶到平顶山南面的洼地里。午后 1 点多钟，全镇 3000 多人全部被包围在草坪之中。草坪西面是断崖陡壁，北面是奶牛饲养场的铁丝网，日军在东面和南面架设着用布掩盖着的机枪。无辜百姓正在惊慌不定之时，日军便露出狰狞面目，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机枪扫射之处立刻血肉横飞，老幼妇孺的惨叫声不绝于耳。接着，日军又在村内纵火烧房。屠杀持续了 1 个小时。当日军准备乘车返回时，发现遍地尸体中还有呻吟蠕动者，于是又进行第二轮屠杀：逐个检查，下论死活，都再刺几军刀，妇孺婴儿无一幸免。随后，日军又到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和千金堡屠杀了 200 多百姓。

日本强盗为了掩盖其罪行，在大屠杀后的第 2 天，雇用一帮人到平顶山将尸首用铁钩挑掷到山崖下，再浇上汽油焚烧，然后用炸药将山崖崩塌，使

乱石将尸体掩埋，以销毁罪证。此后又在屠杀场四周拉上铁丝网，抓来劳工在那里铺设铁路。他们还命令充当抚顺伪县长的汉奸夏宜在平顶山、栗家沟和千金堡的废墟上建造假房，拍成照片掩人视听。同时，川上精一亲自到抚顺县署借款 5 万元贿买当时在沈阳的国联调查团新闻记者，让他们保持缄默。事后，日军向抚顺全县发出布告，不准收留在平顶山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百姓，违者以“通匪”论处，并株连全家。

在这场震惊中外的平顶山大惨案中，中国无辜百姓横遭杀害的达 3000 多人，其中 2/3 是妇女和儿童，有 400 多户人家几乎被杀绝，800 多间民房被烧毁，整个平顶山的居民仅有二三十人死里逃生。这是日寇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也是日军侵略者在中国制造的无数惨案中的一个典型。

1933 年 5 月 31 日　被迫签订《塘沽协定》，丧失东北、华北主权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拼凑起伪满洲国之后，便把侵略矛头进一步指向热河和关内。1933 年 2 月下旬，日军兵分三路进攻热河，热河守军弃地逃走。3 月 4 日，日军攻陷承德，进而占领热河全境，并继续向长城各要塞进犯。中国驻守长城沿线的军队在冀东喜峰口、古北口、冷口等要塞奋起抵抗，与日寇血战数十日。最后，由于蒋介石集团坚持对日妥协政策，致使长城地区的抗日战争失败。4 月下旬，河北东部长城的各要隘关口全部陷入日寇手中。5 月下旬，日军长驱直入，连陷秦皇岛、北戴河、迁安、卢龙、唐山等河北境内 22 个市、县，并向平津逼近，形成了对北平三面包围之势。同时，日军又出动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示威，华北情势十分危急。

面对日寇的凶猛来势，国民政府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惊恐万状，决定向日本求和。便于 5 月 22 日，紧急约见日本驻北平大使馆代办中山。中山态度十分傲慢，声称要谈判和解必须派出合适人选。何应钦急令新上任的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于当晚去日本海军武官在北平的官邸与中山代办连夜会晤。24 日，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通知北平当局：如果中国方面肯派军使直接向关东军要求停战，日军便可停止对北平的进攻，而用外交的方式结束此次战争；中方务必于次日凌晨 2 时前给日方以答复，否则关东军即向北平进攻。南京国民政府驻北平要员们慌作一团，不知所措。当晚，何应钦在西便门外跑马场火车站，紧急召集北平军分会和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主要官员黄郛、张群、黄绍竑等密商对策。经过一番激烈争论，直到次日凌晨 1 点钟，才作出派军使向关东军请求停战的决定，同时让黄郛急驰使馆答复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

当日早晨 5 时，北平当局紧急任命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作战处处长徐祖诒（即徐燕谋）为军使。徐急奔密云县关东军第 8 师团司令部驻地，请求停战，并当场签署了向日军请求停战书。关东军第 8 师团长西义一当即出示他早已拟定好的 3 项暂时停战办法。其要点是：

一、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芦台一线以西以南一带，以表示停战的决心，并请求日军不再前进。

二、于 5 日内日方（指关东军）派遣代表与中方军事当局（指北平军分会）讨论停战条款。

三、正式谈判地点须在日军占领地内。

何应钦完全接受日军停战条件，并立即电令前方部队按日方指定方向撤

退。

5 月 27 日，北平军分会参谋长黄绍竑火速赶到庐山，向蒋介石、汪精卫、孙科报告了与日方谈判情况，蒋介石表示同意和赞赏。28 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名发出“救国必先剿共”的通电，顽固坚持对日妥协，一心“剿共”的反动战略方针。

5 月 30 日，何应钦派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茨在天津塘沽仓库楼上正式谈判，31 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其主要内容有：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低、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和以南地区，以后不得越过该线，并不得有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队为证实第一项执行情况，可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以保护，并给予提供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队如证实中国军队已经按第 1 项规定执行，则不再越过中国军队的上述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和以东地区内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担任；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塘沽协定》，是继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之后的又一个大量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卖国条约。按照这一协定的规定，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已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四省的占领，承认了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是以长城以北为其国界，承认了中国军队今后永不能越过所谓“停战线”以收复中国东北四省失地的无理要求，还承认了长城以南、中国军队撤退线以北的河北东部 22 县市为所谓“中立区”，以及日军有权随时越过“中立区”对中国军队进行侦察、监视，而中国军队却不得进入上述地区从事必要的防务的规定。这就等于将长城以北及河北东部 22 县、市的主权拱手交给日本，以致华北地区门户洞开，屏障尽撤。

1935 年 6 月 27 日　被迫签订《秦土协定》，丧失察哈尔省主权

1935 年 6 月初，正当国民党当局穷于应付“河北事件”的交涉时，日军又在察哈尔制造了“张北事件”。1935 年 5 月 31 日，日本关东军派犬■桂等 4 名特务乘车前往张家口，以旅行为名潜入察哈尔省境内偷绘地图。6 月 5 日，犬■（音 kuī）桂等到察哈尔省张北县城北门时，因无护照被当地中国驻军扣留。经向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请示，宋哲元生怕触怒日方，急忙下令放行。然而犬■桂等到张家口后便打电报向关东军报告，诡称在张北受到中国军方“虐待”。日本侵略者借机大肆渲染，并向国民党察哈尔省府民政厅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抗议”，要求“道歉”、处罚责任者、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并扬言如 5 日之内中方不做答复，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这说明日军蓄意要借这次“张北事件”挑起事端，借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张北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总部非常重视，立即派日本的著名特务、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面负责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并指令他要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和驻北平武官辅佐官协商，要求宋哲元军撤退至黄河以南。国民党当局唯恐事态扩大，于 1935 年 6 月 16 日派察哈尔省民政厅长、

二十九路军副军长秦德纯与日方代表土肥原贤二、松井源之助等，在天津开始就“张北事件”进行初步交涉。17 日，日本关东军己令南次郎奉命进行周密策划，第二天制定出《对宋哲元交涉要领》，作为日本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的基本要求。当双方尚未正式谈判之前，秦德纯向国民党当局透露：关东军的最高要求是要给宋哲元去职、132 师调开及惩办“ 肇事”人员。国民党当局为了顺应日军要求，便做出了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而由秦德纯代理的决定。日本趁机进一步逼迫国民党当局做出更大的让步。6 月 23 日晚，日方代表土肥原肾二等与国民党当局秦德纯等进行一次正式谈判。日方提出 4 点要求，大意是：将宋哲元军撤退至停战协定线（昌平至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以西；将宪兵队、国民党党部及蓝衣社撤出察哈尔省，禁止排日行为；以上两点在两周内办理完毕：对“张北事件”要道歉，对直接负责人要处罚。次日夜，国民党中央对秦、土初步谈判下达训令，其中有“不妨碍我国领土主权范围”的冠冕堂皇之辞，使国民党代表感到十分为难，虽于 25 日与日本代表进一步谈判，但不欢而散。土肥原贤二为逼迫国民党当局尽快就范，以 26 日晚离开北平去长春相要挟。秦德纯急电南京，请国民党中央做出具体指示。26 日夜 11 时，南京国民党当局电令秦德纯除有一两点须稍加修改外，其余均按日方要求办理。

6 月 27 日上午 11 时，秦德纯等国民党当局代表，赴日本使馆与土肥原贤二等日本代表正式交换文件，签订《秦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其主要内容为：

一、中方就“张北事件”向日军道歉，并撤换与该事件有关之中国军官，担保日本人在察哈尔省境内自由行动。

二、取消察哈尔省境内的一切国民党机关，取缔一切抗日组织。

三、成立察东非武装区，中国军队等二十九军全部从该地区撤退。

四、将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职。

五、聘请日本人为顾问。

《秦土协定》使中国丧失了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丧失该省疆土 70—80%。这个协定与紧随其后签订的《何梅协定》，都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华北大开了方便之门。

1935 年 7 月 6 日　被迫签订《何梅协定》，再次丧失华北主权

《塘沽协定》签订后，从 1935 年初起，日本帝国主义便开始实施其侵占中国华北的侵略计划。l 月 8 日，关东军即以步、骑、炮、空军多军种联合部队向驻察哈尔省东部沽源县的中国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大举进攻，首先制造了“察东事件”，揭开了侵占中国华北的序幕。接着，又借口天津两家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是国民党蓝衣社“所干”（当时国民党就断然否定，据台湾当今史学家了解，实为当时驻天津的支那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所设的圈套），同时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县“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由日本天津驻屯参谋长酒井于 5 月 29 日向国民党当局“抗议”，并从东北调遣日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

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却正忙于集中力量围追堵截长征途中的红军，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主导下，决定对日军在华北的挑衅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5 月 31 日，国民党政府决定撤退驻北平宪兵

第 3 团和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停止国民党党部在河北的活动和宣传；6 月 1 日，又决定把蒋孝先、曾扩情等免职；蒋介石、何应钦还分别征询张学良、于学忠对改组河北省政府和于学忠免职的意见。6 月初，国民党基本上答应了日本的要求。但日本军方并不以此为满足。6 月 4 日，他们再次向何应钦提出 3 点新要求，即：

一、于学忠、张廷谔（天津市长）必须罢免。

二、从天津撤走国民党河北省党部。

三、调走驻天津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

对此，国民党政府也一一屈从，并立即召开行政院会议，决定按日本的 3 点要求办理。

国民党政府在“河北事件”交涉中一再妥协退让，使日本侵略者更加看清了其软弱无能的本质，便得寸进尺，决计加快侵略华北的计划。6 月 5 日，日本军部针对“河北事件”提出了一个《华北交涉问题处理纲要》。7 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召开扩大的军事会议。会后做了紧急战略部署，造成对平津大兵压境之势。9 日，酒井隆、高桥坦第 3 次晤见何应钦，又传达了日本军部进一步提出的新要求：

一、河北省境内国民党党部一律取消。

二、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国民党中央军必须离开河北省境。

三、禁止全中国的排外、排日行为。

他们还威胁说：以上要求绝无让步余地，限 6 月 12 日上午前答复，否则，将采取自由行动。

国民党中央得知这一情形后，便于次日在汪精卫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全部答应并实施日方上述要求。在当天还发布了禁止反日排日活动的所谓《敦睦邻邦令》。6 月 10 日，何应钦第 4 次晤见高桥坦，表示全部答应日方 6 月 9 日所提要求。但日本军部并未就此罢休。11 日，高桥坦突然交给北平军分会一份由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 署的“备忘录”，要中方据此照抄一份并须由何应钦签章，然后送交梅津美治郎。该“备忘录”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把何应钦 6 月 4 日、9 日、10 日国民党政府历次答应的日方各项要求全部记录在案；第二部分是对 6 月 9 日酒井隆、高桥坦交给何应钦的 3 页文件中的第 2 页上的 3 条附加条件，又作了 3 条补充。由此不难看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用这种办法逼迫国民党政府与其签订一个正式协定。15 日，北平军分会将国民党国防会议议决的“现日方意见已完全达到，实无文字规定之必要，故我方难以照办”的内容通知日方。7 月 1 日，日方则拟定出一份通告文稿，全文是：“6 月 9 日酒井参谋长提出之各事项，悉数承诺，期以自动方式实施之，特此通知。梅津司令阁下。何应钦。”7 月 6 日，何应钦在征得汪精卫的同意后，在屈辱的通告上签了字，然后转送给梅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何梅协定》。

《何梅协定》的签定，使中国丧失了在河北及平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为日本吞并华北铺平了道路。

1937 年 7 月 7 日　“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不遗余力地推行它的所谓“大陆政策”，蓄谋扩大侵华战争，以达到最后灭亡中国的罪恶目的。为此，日本帝国主义在 1936 年底，

就连续在其国内和中国平津地区大搞军事演习，做好具体的战略部署；同时，大造扩大侵华战争的舆论，进行战争动员。1937 年春，将其中国驻屯军（即华北驻屯军）增加到 6000 人，并加紧调集军队，大力扩充军事设施，强占山海关至丰台铁路沿线的战略要地，从华北、东北、西北三面形成对北平的包围。6 月 28 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要员，在大连举行侵华战争的军事会议，战争狂们公然叫嚣 3 个月内就可以占领全中国。他们在北平郊区丰台附近频繁举行大规模挑衅性的军事演习，甚至明火执杖地以中国军队驻地为目标，发动攻击演习。他们在演习中无理要求通过中国军队驻地，甚至还在北平城内东单牌楼和长安街附近东交民巷使馆区一带演习巷战。这些军事演习从白昼发展到黑夜，从虚弹发展到实弹，无有休止。7 月初，关东军司令官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提出，“进攻中国的时机业已成熟”，准备立即点起战火。

当时驻守在平津一带的中国军队是二十九军，总共有兵力 10 万人左右。这支部队曾受过日本欺凌和侮辱，又目睹了日寇在河北、察哈尔嚣张的侵略气焰，因此全体官兵再也无法按捺对日军的愤怒和仇恨，早已下定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决心。1937 年 7 月 7 日夜 10 时，驻丰台日军河边旅团第 1 联队第 3 大队第 8 中队，在卢沟桥以北地区举行以攻取卢沟桥为假想目标的军事演习。11 时许，日军诡称演习时一士兵离队失踪，还编造“仿佛”听到宛平城内有炮声”的谎言，要强行进城搜查，但遭到中国驻军二十九军 37 师 219 团团长吉星文的严辞拒绝。日军于是迅速包围宛平城。7 月 7 日夜，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的长松井获悉失踪日兵已经归队，但日军蓄意寻衅，仍然无理要求入城查明失踪情形。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为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定，双方共派官员前往调查。中方以河北省第三区行政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冀察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等为调查员，日方则以松井及中国第二十九军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等为调查员。但日军毫无诚意，乘交涉之际，日夜向宛平县城发动猛烈攻击，强占宛平东北沙岗，打响了罪恶的第一枪。中国守军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迎头痛击日本侵略军。这样，以卢沟桥事变为导火线而爆发的中日战争，便从此开始。

日本侵略军虽连续进攻宛平城 3 次，但由于中国驻军的英勇抵抗，均未能得逞，便转而以谈判为缓兵之计，暗地里却加紧部署。8 日深夜，松井等人与秦德纯等达成口头协议，双方立即停止射击，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至卢沟桥以西地带，宛平县城由保安队接防。但是，日本政府得知事变详情后，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增兵华北，包围北平，决意扩大侵华战争。7 月 12 日，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到达天津，立即指挥日军强占天津东站并在丰台、通州故意寻衅。14 日，香月向宋哲元蛮横地提出所谓反共，取缔排日言论、排日团体和民众抗日运动，中国军队撤出北平，改由保安队担任警备等 7 项要求。18 日，宋哲元亲赴天津向香月表示歉意，并答应 7 项要求。因为日本的侵略目的是要占领平津，控制华北进而灭亡中国，自然对宋哲元的退让和答复也不以为然。19 日，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华北大量增兵，要在 20 日采取行动。21 日，日军再次炮击宛平县城，同时炮击长辛店，轰炸廊坊，并于 25 日占领廊坊。26 日晚 7 时，丰台日军 500 名企图强行由广安门进入北平，遭到中国守军刘汝珍团的拼死阻击。香月遂借“广安门事件”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强迫中国撤军。但是，日军不待中国答复，即于 27 日派兵攻占团河、通州，进犯南苑、北苑、黄寺及沙河等处。中国守军

虽经浴血奋战，付出重大代价，但终因仓促应战难以抵抗，致使北平在 29 日陷落。30 日，天津也失陷。

“七·七”卢沟桥事变，是日本扩大侵华战争，企图灭亡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

1937 年 8 月 13 日　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制造“八·一三”惨案

1937 年 7 月 29 日及 30 日，日军相继占领了北平及天津后，为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以达到所谓 3 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目的，在全面侵占华北的同时，又开辟了华东战场，图谋占领中国最大的经济金融中心和贸易港口——上海。

为了发动侵略上海的战争，8 月初，日本海军就迅速地、有计划地组织长江沿岸各城市的日本侨民迁移到日本租界内。然后不断在上海寻衅肇事，制造事端。8 月 9 日下午，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率士兵驾车闯入虹桥中国军用机场，刺探军事情报。机场哨兵当即制止，大山勇夫等竟开枪向中国士兵射击。当中国保安队闻讯赶来时，大山勇夫等又向保安队员开枪。保安队被迫自卫还击，在互射中，1 名保安队员中弹身亡，大山勇夫等 2 人也被当场击毙。这就是“虹桥机场事件”。事件发生当晚 10 时，上海市长俞鸿钧就亲赴日驻沪领事馆交涉，谋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日方却逞强逞凶，决计扩大事态。11 日，日方要求中国遵守 1932 年 5 月 5 日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撤退驻上海的保安队和撤除所有防御工事。如果日本的无理要求得逞，上海将成为一个不设防城市，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中方断然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于是，日本军舰 30 余艘游弋吴淞，日本内阁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增派陆军赴中国参战。8 月 13 日上午 9 时，日军挑起“八·一三”事件，对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侵略。上海这座闻名世界的东方大都市，又一次遭到日寇铁蹄的蹂躏。战争一爆发，侵华日军立即出动大批飞机，有计划地对上海进行轰炸，无论是军事设施，还是民宅，甚至大学校园都成为轰炸目标，炸死炸伤市民无数。这座昔日美丽而繁华的都市，顷刻间变成了残垣断壁、满目疮痍。

11 月 12 日，上海陷于敌手。日军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我无辜同胞成批成批被杀戮，仅在宝山县罗泾乡就有无辜群众 2244 人被屠杀，烧毁民房 1.0908 万间。在金山卫，大火整整烧了 3 天，金山卫城北一口赤旱塘内就被杀死农民 60 多名，整个金山卫被日军杀害的有 1000 多人。在山阴一带，有 350 余名无辜农民遭杀害，被烧毁的房屋有 4177 间，被杀死的耕牛有 708 头，5300 多亩稻田和棉花地被烧为灰烬。

遭受战争涂炭的上海同胞被迫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在徐家汇慈云桥，难民密密麻麻聚集在一起，痛苦万状。在老北门附近的民国路上，拥满了 2 万多难民，他们扶老携幼，忍受着寒冷和饥饿的折磨，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饱受“八·一三”战火摧残的上海，到处是废墟焦土，横尸卧野，饿■载道，满目凄凉，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宝山县罗泾乡民众在当年侵华日军登陆的池塘边，立了一块刻有“永志不忘”4 个大字的石碑，反映了上海人民“勿忘国耻”的心声。

1937 年 12 月 13 日　文明史上最黑暗一幕——日寇制造南京大屠杀

1937 年淞沪会战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紧接着，日本侵略军在松井石根的指挥下，分三路迅速向南京进犯。当时防守南京的是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指挥的第二军团、第六十六、七十一、七十二、七十四、七十八及八十三军等，共计 15 万官兵。12 月 7 日，日军发动对南京城的全面进攻。8 日，日军攻破南京外围防线。10 日，进攻城郭。12 日午后，日军突入城内，唐生智仓皇下令总撤退。由于缺乏周密的突围计划，10 多万军队迅速溃败。13 日，南京几乎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失陷了。

在未占领南京之前，松井石根就对其部属主要军官提出，南京是中国的首都，进犯南京必须做周详的研究，要大张“武威”，使中国“畏服”，妄图迫使中国政府投降，中国人民停止抗日。后来的事实证明，日本在南京所要大张的“武威”，只不过是大屠杀的代名词而已。12 月 13 日晨，日军谷寿夫师团首先从中华门进入南京，血洗了聚集在中山北路、中央路的难民区。由此，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便开始了。

13 日，约有 10 余万难民和溃散的中国士兵，被日军围逼到燕子矶江边沙滩上，遭到数十挺机枪的疯狂扫射。顿时，尸体蔽江，水为不流，至少有 5 万多人惨遭杀害。

14 日，日军在汉西门外集体屠杀难民和非武装军警 7000 余人，江岸之上，尸体纵横，血流成河。

15 日，日军在司法院难民区搜捕 2000 余人，押至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又用木柴、汽油焚烧。同日下午 2 时，在挹江门姜家园南头，日军将居民 300 余人或用机枪扫射，或纵火烧死；夜里又将所俘军民 9000 余人押往海军鱼雷营，用机枪密集扫射杀死。

16 日上午 10 时，在中山北路前法官训练所旧址，日军将 100 余人拖至 4 条巷塘边，用机枪全部射杀；在鼓楼 5 条巷 4 号难民区，日军俘虏军民数百人，驱集他们到大方巷广场上，用机枪射杀；同日，日军还将华侨招待所难民 5000 余人，押至中山码头，用步枪、机枪射死，并把尸体推入江中灭迹。

17 日，日军在下关上元门屠杀我同胞 3000 余人，又在三叉河杀害四五百人。在煤炭港，将 2000 多人衣服脱光，先用机枪扫射，再把未杀死的人关在机房里连人带房一起火烧。

18 日，日军在下关草鞋峡，将我男女老幼同胞 5.7 万人集体残杀，然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骸骨投入江中。

这一段时间内，日军还在上新河一带残杀我国被俘军人及难民 2.8730 万余人。

总之，正如当时目睹者、南京同善堂掩埋尸体组组长刘德才，在 1947 年向南京军事法庭提供的证词中所说：“12 月，日本进城时的大屠杀惨极了。各街各巷都能看到被杀的人，有的是刀刺的，有的是刀砍的，有的是枪杀的，有的是火烧的，有的是奸后又杀的。东一堆西一堆，左一个右一个，不忍看不忍见，还有许多人衣服被脱光，关在制造局的楼上用火烧死了。”南京城里尸骸遍野，人血染地，简直成了一座血腥的人间地狱。日本强盗杀人不眨眼的罪恶行径，必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兽兵以杀人为乐，甚至开展“杀人比赛”。中岛部队的两名少尉，在侵占江苏句容时，就开始进行“杀人比赛”。他们无耻地约定：谁先杀满 100 人，谁就夺取锦标。一路杀来，到汤山时，一人杀 89

人，另一人杀了 78 人。攻陷南京后，二人继续“比赛”，很快，一个杀死 106 人，一个杀死 105 人。但究竟谁先杀死 100 人，无法判明，又改为以杀死 150 人为标准继续进行“比赛”。一个日军中队长用一把“助广”大军刀，一口气杀死 300 多人。灭绝人性的日本强盗，还将难民吊在树上当活靶子取乐。有的在难民身上浇汽油然后射击，被弹击火烧的难民满地翻滚，日寇鼓掌狂笑。有的逼着难民脱光衣服破冰摸鱼，难民们受冻难忍，而日寇却手舞足蹈。有的将人头挑在枪上，在街上嘻笑取乐。有的把人捆在电线杆上然后用火烘烤，待人被烧焦后，狂呼而去。至于刺鼻挖眼，开肚扒肠，刺穿喉咙的，更是随处可见。

根据战后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中国军事法庭的调查裁定，在南京大屠杀中，我国死亡人数在 30 万以上。其中被集体屠杀的有 19 万余人，零散被杀的有 15 万余人。但据近几年发掘的新材料证实，被杀害的人数达 38.5 万，比原裁定数字还要多。

日寇在灭绝人性地屠杀中国无辜同胞的同时，又犯下奸淫无数中国妇女的滔天罪行。被日寇奸淫的南京女同胞，上至 80 老妪，下至七八岁幼女，景状之惨，难以言诉。日军发完兽性后，还灭绝人性地将她们剖腹、刺胸、割乳，施以种种下流手段。据事后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国际人士粗略统计，当时南京城受辱妇女达 8 万人之多。其中一部分在遭奸污后又被杀害。日军中将谷寿夫本人，不仅亲自持刀杀人，还像禽兽一样在大街上强奸妇女达 10 人之多。

日军还在南京城内疯狂地焚烧劫掠。沿中华门至下关江边，到处浓烟滚滚。日军对繁华街区的店铺、仓库和一般民宅大肆掠抢，然后付之一炬。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街道太平路被烧成一片焦土，市内其它各商业区也遭同样浩劫。全市约有 1/3 的地方化为灰烬。

由上所述，日寇在占领南京后的一个半月内，对中国人民犯下了弥天大罪。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可耻的暴行记录。战后，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凶犯松井石根、谷寿夫等都分别受到绞死或处死的惩罚。但是，这一沉痛的国耻，是永远难以从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记忆中消失的。

1940 年 11 月 29 日　签订《汪日基本关系条约》，汪精卫大肆拍卖中国主权

20 世纪初以来，曾经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的汪精卫，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经不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威慑和政治诱降，最后竟堕落为“国人皆曰可杀”的中国头号大汉奸。汪精卫于 1938 年带着他的亲信逃离重庆，叛国投敌。随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下，于 1940 年 3 月，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傀儡政权，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汪精卫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不是偶然的。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他已成为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亲日派头子。“七·七”事变后，面对全民族抗战的巨大潮流，他仍顽固坚持对日本“只应为友，不应为敌”的反动立场。大肆鼓吹“战必大败”的亡国论调。他一直把抗战视为“牺牲”，宣布“坚持抵抗不如投降”的谬论。甚至公开说，要不愿牺牲，“就只有做傀儡”。他果然在王克敏建立的伪“华北临时政府”、梁鸿志建立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德穆楚克栋鲁普建立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及溥仪建立的

伪“满洲国”之后，建立了又一个日本傀儡政权。

1939 年 5 月，汪精卫在日本掩护下，由河内秘密潜回上海。5 月底，他携周佛海、梅恩平等大汉奸赴日，向日本内阁提出“改组国民政府”。日本内阁允许在适当时候，由汪精卫与伪“华北临时政府”和南京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组成伪中央政权。6 月中旬，汪精卫从日本回国，先后与南北伪政权头目王克敏、梁鸿志等人以及侵华日军首脑进行会晤。8 月 28 日，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汪精卫自任中央执监委员和伪中央主席，建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随后便加紧筹建伪政权。要建立汪伪政权，自然离不开日本主子的支持。为了表示甘愿充当走狗，1939 年 12 月 30 日，汪精卫与日本签署由日方一手炮制的《日支（支那，日本人对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蔑称。）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对中国领土和主权进行公开大拍卖。其主要内容为：

一、中国承认“满洲国”。

二、确保日本在中国中央政府外交、教育、文化以及军事等方面的权力和合作关系。

三、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的政治、经济以及地下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力，承认上述地区为“日支强度结合地带”，由日本长期驻军并控制其铁路、航空、通讯、海港和水陆的使用权。

四、须在中央政府以及各级机构中聘请日本军事、财政、经济、技术顾问，以确保上述条款的执行。

五、新成立的汪伪中央政府，须赔偿日本在中日战争期间的“损失”。

这一“要纲”的签订，使日本帝国主义获得了几十年梦寐以求而在战场上得不到的特权。

经过筹备，拼凑起来的伪“国民政府”，于 1940 年 3 月 30 日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自任主席及行政院长。汪伪政权成立后，在 1940 年 11 月 29 日，又与日本签订了《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和《日满华共同宣言》及附属秘密协定。汪、日“基本关系条约”的主要内容有：汪、日共同“防共”；日本有在中国本土和沿海岛屿驻军和泊舰的权力；中国的各项资源有“满足日本国国防上需要”的义务；中国应赔偿日本国民在“七·七”事变后所受的全部“损失”等。“汪日基本关系条约”，实际上是汪精卫的一纸卖身契，它确定了日、汪的主仆关系。同时，这个条约也是汪精卫对中国主权的再一次大拍卖。此后，汪伪政权配合日军在华中、华南沦陷区进行了残酷的“清乡”运动，对中国人民施行大规模屠杀和“三光”政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权追随日本向英美等国宣战，把自己的命运完全拴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上。汪伪政权存在的 5 年多时间里，一直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对国家和民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46 年 11 月 4 日　美蒋签订《中美商约》，美帝图谋独霸中国

中国人民经过 8 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饱尝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的中国人民，渴望有一个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的和平环境。但他们万万没想到，南京国民党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双十阶定》，公然挑起全面内战。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了发动内战，急于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在当时世界帝国主义国家中，

德、意、日三国已经被打垮，而战胜国英、法等国，正在从经济发展巅峰滑向衰落的低谷，唯有美国在大战中发了横财，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因此南京国民党政府立即依靠美帝国主义，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以换取美国的支持。而此时的美国正想利用大战后的形势，垄断中国的投资市场，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这样一拍即合，美、蒋便正式勾结起来。随即，南京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协定，将许多国家主权包括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和内河航运权等拱手相送。其中最具有侵略性和奴役性的，就是 1946 年 11 月 4 日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

《中美商约》共 30 条及 1 个议定书。其主要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美国人可以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及经商”，其经营范围包括“商务、制造、加工、金融、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并可以在中国开发矿产资源、购置产业、建筑房屋和租借、保有土地。美国的“法人及其团体”，在经济权利上与中国的“法人及团体之待遇相同”，凡依美国法律组成的“法人及团体”在中国也要“承认其法律地位”。

二、美国商品在中国“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现在或将来所给予”中国“国民、法人、团体之待遇”，美国“任何种植物、生产物或制造品之输入”，以及运往美国任何物品之输出，“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

三、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可以无限制地一只船停泊几处口岸，其人员货物可以经由“最便捷之途径”，有通过中国“领土之自由”，“不得课以任何过境税或予以任何不必要之迟延或限制”，而且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只要在遇到“任何危难”的借口下，就可以开入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

四、美国人在中国的住宅、货栈、工厂、商店及其他业务场所以及一切附属房地，中国人概不得进入察看或搜查，其中所有书册文件或帐簿亦不得查阅。

以上 4 个方面，仅是该条约中最主要的内容，也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出卖国家和中华民族利益最为突出的几个方面。《中美商约》从内容上说，比 30 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更狠毒，在范围上比 8 年前“日汪密约”更广泛。所以，当这个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上海各界名流马叙伦、马寅初、茅盾、千家驹等纷纷发表意见，抨击、谴责美国灭亡中国的《中美商约》，愤怒地将此条约称为“新二十一条”。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声明，严正指出：“中美商约是绝对不利于中国，片面独惠的丧权辱国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评蒋美商约》，尖锐地指出：“它是蒋政府把中国作为美国附属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中华民族又一新的大国耻。”经延安各界人士建议，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同意，正式将 11 月 4 日定为“新的国耻纪念日”。

“中美商约”签订后，美蒋又陆续签订了一系列协定，达成了若干密约，其中有：1946 年 12 月订立的出卖中国全部领空权的中美《空中运输协定》；1947 年 1 月订立的承认美国海军侵驻青岛的《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7 月订立的出卖铁路主权的《滇越铁路管理与川滇铁路修筑协定》；12 月订立的由美国直接控制中国海军的中美《海军协定》；1948 年 7 月订立的允许美

国在中国取得各项经济特权的《关于经济援助协定》；8 月订立的美国得以控制中国农村经济的中美《农业协定》；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协定等等。通过这些条约、协定，美国帝国主义畅行无阻地将其侵略势力渗透到中国各个角落，包括从地上到天空，从陆地到海洋，从工业到农业，从金融到商业，从文化到教育，等等。美帝国主义依据这些条约，不仅独占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及投资市场，而且垄断了中国的工业和农业，以及对外贸易和交通运输业，并控制了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实际上也成为美国的殖民地。

1946 年 12 月 20 日　美蒋签订《空中运输协定》，出卖我国领空权和制空权

随着运输工具航空器在各国的广泛使用，维护本国的领空权和制空权便与维护内河航运权、领海权同样重要起来。中国的内河航运权、领海权早已被帝国主义攫取，而中国的全部领空权则是首先由美帝国主义取得的。1946 年 12 月 20 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代表各自政府在南京签定了《空中运输协定》，该协定正文 13 条，主要内容是：

一、依本协定，中国给与美国航空组织通过中国领土及在中国领土内有非营业性的降落的权利。

二、美国有在上海、天津、广州各航线，及随时商定而增开的各航线，沿线来往装卸国际客、货及邮件的权利，并在各航线上任何地点作不着落之飞行，而免在各航线上其他地点之一处或数处着落。

三、中国对美国所设航空站及其它设备，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航空站和其它设备的税收。美国飞机使用的一切燃料、润滑油和其它航空配件，享有一切中国国民待遇及最惠国待遇。

四、飞进或离开中国国土的美国飞机，享有与中国飞机的同等待遇。

这就是说，依据这个协定规定，美国飞机（包括军用飞机）在中国领空飞行可以不受任何时间及地点的限制，享有在中国的一切航空特权及优待。尽管该协定用了“缔约双方”的字样，表示双方享有同等的权利。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的航空事业极端落后，既无飞机制造业，又无良好的通讯设施，甚至连有限的航空人员都要依赖美国训练，试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怎么能有许多飞机在美国领空作“非营业性的降落”呢？所以对中国来说，享有同等权利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受到实惠的则是美国，深受其害的是中国。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签订这一协定，出卖了中国航空权和制空权，而美国则完全攫取了中国的航空权和制空权。

1946 年 12 月 24 日　美军士兵在北平施暴行，北大女学生沈崇遭奸污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美帝国主义为了帮助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将大批军队和军舰开进中国。截止至 1945 年年底，进驻中国的美军人数已达 11.3 万多人。这些驻华美军充满了浓厚的殖民主义思想，俨然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人民的面前，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制造出无数暴行和惨案，1946 年 12 月 24 日，发生的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而这一暴行的发生绝非偶然的、单独的事件。

1946 年 12 月 24 日晚（圣诞节前夜）北京大学先修班女学生沈崇（为清两江总督沈葆帧的后裔），去东单平安戏院看电影。看完电影后，当她徒步走进东单一条胡同时，发现有两个美国士兵尾追不放。沈崇见势急忙奔逃，并大声呼救，但无人前来营救，美国士兵便强行将其拖到东单广场小树林里施暴。沈崇虽竭力反抗，终难逃脱魔掌，最后还是被美军士兵奸污了。美军施暴时，被路过的人发现，急报警察局。当巡警赶到现场，这两个美国士兵仍有恃无恐，竟要夺取巡警枪支，并挥拳相击，随后向北逃窜，最后被捉住。

美军士兵强奸沈崇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局企图将它遮掩下来，不许被害人声张，不许新闻界披露案情真相，甚至还逮捕率先伸张正义的《亚光报》记者，以钳制舆论。继而散布“强奸未遂”，被害者“未必是良家女子”的谣言，对肇事凶犯百般庇护，为其开脱罪责。然而新闻界决心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冒着被迫害的危险为受害者伸冤，把美军士兵强奸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沈崇事件犹如一个火星掷进了火药库，早已对美军暴行深恶痛绝的中国人民，立即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抗暴运动。

最先得知美军暴行的北京大学女生冲破当局阻挠，全体集会，一致提出严惩凶犯等 8 项要求。北大学生在校园内贴满了抗议美军暴行的传单和檄文，组织了抗暴联合会，并举行游行示威。接着，北平各校学生为声援北大学生的正义行动，也纷纷罢课、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各校学生还在北平大街小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在街头讲演，呼唤民众起来，参加抗美斗争。各校学生还自制担架，准备为同胞姐妹兄弟、为洗刷国耻而流血，表现出高尚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北京抗暴斗争的消息很快发展到上海。复旦、交通、同济等大学学生纷纷举行抗议、宣传活动，并在黄浦江畔举行抗暴大游行，声援北平抗暴斗争。与此同时，天津、南京、武汉、重庆、杭州、郑州、福州、广州、济南、桂林、台北、香港等地学生、爱国群众，也投入了抗暴运动。

在沈崇事件为导火线的全国人民抗暴斗争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美国军事法庭（按 1943 年“中美协定”规定，美国有在中国设立军事法庭处理在华人员刑事案件的权利）被迫开庭审讯。但在审讯时，原告沈崇仅能以证人身份出席，其律师也不能代沈崇申诉。国民党政府不仅未能保护自己的国民，不能为同胞申冤雪耻，反而助纣为虐，这是何等的耻辱！

但是不甘受辱的中国人民，决定掀起更大规模的抗暴斗争。中共中央于 1946 年 12 月 31 日，向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组织发出指示，号召各界人民大力声援北平抗暴斗争，各解放区数千万男女青年也誓做后盾，使抗暴斗争迅速席卷全国。爱国教授和文化界及其他知名人士，纷纷加入这个斗争行列，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侨胞，纷纷起来声讨美军暴行，高呼：“美国佬滚出去！”的口号。

这场以学生为先导的抗暴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反美、反蒋的爱国民主运动。这次运动持续了 3 个月，卷入这场斗争的全国学生达 50 万人。最后迫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于 1947 年 1 月 29 日，宣布撤走一部分驻华美军，美国军事法庭也不得不做出判处强奸主犯皮尔逊 10 年徒刑、帮凶普利查特 10 个月徒刑（实际上他们被送回美国后就无罪释放）的判决。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民抗暴斗争取得的一个胜利。抗议美军暴行运动说明：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对美军暴行一味助纣为虐，不可能为人民伸冤昭雪。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人民的革命斗争，才能为人民伸冤昭雪，彻底洗刷国耻。

1948 年 7 月 3 日　美蒋签订《双边协定》，美帝全面控制中国经济

1947 年 7 月，鉴于国民党在战场上连连失利，人民解放军正在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形势，国民党统治发生了全面危机。为此，美国决定派魏德迈为特使来华进行所谓“调查”。魏德迈经过“调查”后，认为国民党打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是不可能的，国民党要想挽回危机，只有“立即改进政治及经济的状况”，才能收买人心，稳定局面。同时要求美国政府应该“继续并扩大其援助国民党的政策”，从而为美帝国主义制定出一个“侵华新政策”。

1948 年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已濒临全面崩溃。为了维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3 月，美国国会通过“援外议案”，决定继续供给蒋记国民党政府 4.63 亿美元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其中 2.75 亿美元用于经济援助。7 月 3 日，蒋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订了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又称中美《双边协定》，或《关于美国协助中国之双边协定》。这个协定实际上是进一步把《中美商约》扩大化和具体化了。该协定共 12 条及 1 个附件。其主要内容有：

一、美国政府承允依照 1948 年援华法案的规定，对中国政府予以经济援助；中国政府承允从事一切可行的努力，以改善与美国间商务关系。

二、中国政府对美国因其资源缺乏所需要的中国物资运往美国，无论系为储备或其它目的，将予以便利。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的特殊措施，以实施本项之规定，并进一步与美国谈判关于实施本项规定所必要的详细办法。

三、中国政府同意接待美国派到中国的经济合作特别代表团；该代表团及所属职员将被视为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一部分，享受该大使馆及其同等职员所享受的优例及豁免；中国政府将与该代表团及所属职员予以充分合作等。

四、美国实际上取得对中国货币的最高监督权与决定权。

根据上述内容不难看出，美国借“援助”之名，行侵犯中国主权之实，这是一个蒋介石为取得美国“援助”而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十分耻辱的条约。作为经济补偿的代价，美国取得了对中国货币的最高监督权与决策权；获取了搜刮它所缺乏而又需要的中国所有矿产和物资，以及方便它在中国倾销剩余商品的权利。美国派出的所谓“经济合作特别代表团”，实际是个凌驾于南京国民党政府之上，控制中国政治、经济的殖民统治机构。至此，美国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1949 年 11 月 28 日　黎明前的黑暗，美蒋特务惨杀革命志士

美国帝国主义除了扶持蒋家王朝，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侵略，攫取政治、经济特权之外，还特别注重文化科学技术方面的侵略。披着“科学”外衣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打着“特种技术”的幌子，在中国开办所谓“特种技术合作所”。按照 1941 年美、蒋签订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1942 年成立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实际上是美帝国主义分子帮助国民党秘密训练特务，专事迫害和屠杀中国人民的大本营，也是美、蒋反动派囚禁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的集中营。在陕西西安、贵州息烽、浙江瑞安、江西

茅家岭、安徽雄村等全国 10 多个地方，都建有这种集中营，其中重庆的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最为典型。

“中美合作所”成立后，名义上由蒋介石派特务头子戴笠任主任，而实权却操在美国海军少将梅乐斯手中，由他负责该所的全盘事务。在寻找建所地址时，梅乐斯看中了歌乐山一带有隐蔽的山地的优势，于是圈定了 6000 多亩良田和许多山头，世代居住在那里的农民被全部赶至他乡。从此，这个方圆 40 余里的山野电网密布，碉堡林立，成了一个秘密的恐怖的世界。

在这个中美合作所里，一方面设有豪华的梅园宾馆、敞亮的办公楼房、电台、餐厅、舞厅、医院、图书馆、银行以及军火库、射击场、阅兵场等多种场所，犹如一个繁华的世界。而另一方面又设立了集中营，其中最大的两个集中营就是著名的白公馆和渣滓洞。在那里囚禁了成百上千的革命志士，纯粹是一个惨无人道、暗无天日的黑暗世界。这里备有各种酷刑达 130 多种，从古老的刑具到美国制造的最新式的刑具样样俱全。其中经常采用的有“抽大烟”、“擦汗”、“拷人油”、“狼狗嘶叫’、“穿乳头”、“烧下部”、“电刑”、“撬腰”、“活埋”、“沉河”、“钉指尖”、“吊鸭浮水”、“坐老虎凳”、“披麻戴孝”等等，手段残酷毒辣、暴虐狠毒，不少革命志士被活活整死。由于居住拥挤，终年不见阳光，加上吃的是霉米或老鼠咬过的粮食，因此集中营内疾病流行，患病者又得不到治疗，不少被折磨致死。

1949 年 8 月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挺进大西南。在重庆解放前夜，“中美合作所”里的军警和特务，从 10 月开始，便对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的爱国志士进行血腥大屠杀。先将“重犯”“要犯”处决，接着一般“犯人”也一批批被拉出去枪决。11 月 28 日，在解放军逼近重庆之际，穷凶极恶的特务们在逃窜之前谎称办移交，把牢房里的人统统赶出来，随即就地用机枪扫射。唯恐没有杀绝，又逐屋检查，一个不漏。大屠杀持续了 3 个小时。为销毁罪证，他们纵火焚烧了渣滓洞。在重庆解放的时候，仅发现的骨骸和被烧得发黑发焦的尸体就有 300 多具。

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特务在“中美合作所”里究竟杀害了多少革命志士和人民群众，无法知晓。据有关材料证实，仅在白公馆，从 1939 年关押爱国者开始到 1949 年解放为止的 10 年间，就有大约 2000 多人被杀害；渣滓洞集中营比白公馆集中营关的人要多 3 倍，这说明在那里被杀害的人更多。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这笔血债，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后记**

本书是在我们编著的《百年国耻》一书（农村读物出版社 1992 年 8 月出版，曾获第四届全国青年读物二等奖）基础上，参阅不少有关书籍，经过提炼编撰而成。羊劼、小叶写了部分稿子。王宗荣同志审阅了部分稿件，提出一些宝贵意见。特别是李晓丽同志细心地对全稿做了文字加工，并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在此，谨致谢意。

编者

1994 年 6 月